

何春蕙 主編

性 別／研究的 新視野

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

上

性／别研究的新视野

——第一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上）

何春蕤 编着

Visionary Essays in Sexuality/Gender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 Sexology, Gender Studies and LesBiGay Studies

出版缘起

王荣文

1988年，远流「小说馆」成立。1996年夏天，也就是8年之后，我们推出「风格馆」。在这整整8年间，我们恰可借着「馆」的建筑暗喻、馆名的更迭，反省「馆」所蕴含的收藏、秘存、经典化及市民性格的空间思维，与阅读背后挟显的文化氛围，又遭遇了哪些变形和迷思。

一、由「馆」的文类思维→「走廊式」的文类思维：1990年以前「小说」「散文」「诗」「评论」等区块式的文学分类已界限模糊。甚至如1950年代「反共文学」、1960年代「现代文学」、1970年代「乡土文学」，这种由文学史或文学论战所暗示的文学版图在1990年代后轮廓尽失。阅读的消费性格强迫出版者更多元地替作品搭架更细腻的阅读情调。

二、由「馆」的阅读习惯→「街道式」的阅读习惯：「馆」所暗示的、「私房书」式的私密阅读空间，成为公众的、网路连线的符号传递和重组。阅读不再是一完整稳定的线性时间经验；可能是任意切换、在对话中跳跃的即兴空间。

三、由「馆」的大师期待→「橱窗式」的极度风格化：创作者不再苦苦排队挤进大师的祭坛，而是更自由、真诚地与当代文化情调、进行一场符号的舞蹈。极度风格化使僵化的阅读口味在精微的味蕾刺激中复苏；流行一小众，通俗一严肃的对峙僵局被打破；「风格」成为符号泛滥中唯一能确定的价值。

文类交媾的结果使得我们无法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文学」成为更多陌生孤立、无法况描的感性迷宫。孤寂、华丽、身体政治、性别扮串、符号爆炸下的死灰经验、历史的荒原……太多无法以古典修辞勾勒的边缘情境、在遗失图标的书写芜廊和断脐的文学记忆里漂浮。我们的作家早已离席，在文字的化妆舞会后台挑拣着杂堆在一起的野战服、芭蕾舞鞋、外穿内衣、塑胶材质婚纱和湘绣拳击手套——而我们仍粗暴呆滞地枯候在标示着「小说」、「散文」、「诗」、「评论」的剧院出口等待献花？

当强调文本厚度与多重层架的百货公司型大师不再，作家更常成为自己文字小型精品店的主人时，元尊文化「风格馆」的开馆，或不仅仅意味着为错愕在斑驳错置柔肠寸断的文学废墟前的读者重绘地图，或是替扮像扑朔的作者量身打造戏服与脸谱；更多一些的心情是：当文学经典的权威性开始松动、公私场域的语言策略即兴地交替、挪借；当我们意会到「严肃—通俗」、「大众—小众」的边界接缝，开始冒出一些更幽微异魅的奇花异卉，我们愿意把书的阅读，视为一种空间的闯入和停留——在这里，可以有一些记忆的迷途；有一些自街道转角或城市角落讶然出现的，你久已羞赧好面对的细致感动；一些窸窣有声，在黯黑中轻轻抽长的灵魂藤须。

彷彿踟蹰默立在风格回廊的琳琅橱窗前，无法决定该推哪一扇门进去。

目 录

出版缘起

性／别研究的诞生 何春蕤 7

——序

性学的性逻辑 傅大为 13

——一个「性史」的讨论

性革命 何春蕤 33

——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百年美国性史

性、性意识及身体建构 赵彦宁 101

——形塑台湾女同性恋的身体美学

九〇年代同性恋论述与运动主体在台湾 倪家珍 125

情欲的文化资本与身体驯训 古明君 149

——技职教育体系中青少年的性／情欲

反性骚扰运动的骚动主体 王 莘 169

「同性恋政治」座谈会 189

性／别研究的诞生

——序

何春蕤（1997年10月）

作为台湾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一个指标与面向，性与性别文化中的各种骚动不但经常引发激烈对立的公众讨论，更不断受到国家机器及保守人士的关注。但是短短两、三年之内，配合着台湾社会妇女解放运动而风起云涌的女性情欲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已使得相关议题再也不能被主流的医学和公卫人士所垄断，同时也使得妇女解放运动在面对这些议题时增添了新的厚实内容。一个揉合性、性别、以及其他社会差异的跨领域批判研究于焉形成，我们钟爱的称呼它为「性／别」研究。

中央大学的一些人文学者于是在 1995 年 10 月成立「性／别研究室」。我们不但关注性和女性方面的议题和研究，也以阶级、族群、年龄、性别（gender）等社会「差异」或「别」（differences），来结合同性恋等「性（态）」（sexualities）议题，以关照这些轴线之错综复杂纠葛。因此「性／别」之间的斜线不但表明了人类情欲的多元差异（性中有别），也展现了「性」与「别」与「性别」之间的重迭共生，同时点出了它们之间的区隔和鸿沟。

针对台湾的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与性学（sexology）亟需结合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暨同性恋研究（lesbigay studies），进行从跨领域视野出发的学术研究，也为了提出和 1996 年 7 月主流性学人士要举办的亚洲性学会议截然不同的批判视野，我们筹划了第

一届「性教育、性学、性别暨同性恋研究」学术研讨会（被我们昵称为「四性研讨会」），并且邀请了清华大学两性与社会研究室以及台湾大学城乡所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室共同协办，算是同一类型研究室的一次历史性集结，也是主流与边缘的另一次捉对厮杀。虽然我们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几乎被教育部封杀，但是我们还是热热闹闹的在 1996 年 6 月 29 至 30 日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中成功的召开了四性研讨会。

这次的会议除了有国际视野的理论探讨外，也探究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学术研究在本土社会所关怀的现实议题中所可能产生的渗透和效应，希望能更进一步深化本地「性／别」（gender/sexuality）研究学术社群之论述眼界。除了在思考上具有突破性的学术论文之外，为了引进第一线的性别及性议题工作者的实际田野工作心得来与学术研究者对话，我们特别在议程中包含了性／别运动团体的实务工作者，从工作及运动经验出发，就妇女团体反性骚扰运动的策略，以及同性恋运动所面对的文化政治，提出论文，刺激运动思考。另外，为提供对话的机会，我们还安排了两场座谈，邀请台湾及香港地区知名之性／别运动人士和性／别学者，就台湾同性恋政治的运动脉络以及发展多元差异的性教育等通盘问题，进行深刻的意见交换。两天会期参加者计五百余人，造成社会运动及人文社会学界极大的震动与激荡，后续效应持续至今日。

另外，第一届四性研讨会也激发出对「性（态）」（sexuality）及身体（body）的连串探讨热潮，在其后短短一年之内就出现了以这个领域为主要耕耘目标的多场学术会议。例如：

- ◆「拓边／扣边：社会学研讨会」中【性别与性】议程（1996年11月9、10日，东海大学社会系、台湾社会学社主办）；
- ◆「性／身体／现象学」的学术座谈会（1996年11月2日，Mereau-Ponty Circle 主办）；
- ◆「性批判研讨会」（1996年12月14日，女性学学会、东吴大学社会系主办，思与言杂志社、台湾社会学社协办）；
- ◆「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别、文本、身体政治」学术研讨会（1997年5月24、25日举行，清华大学两性研究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主办）
- ◆「第二届四性研讨会（1997年5月31日、6月1日，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再度主办，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协办）。

这些会议的召开以及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众多批判论述，显示台湾人文社会学界近来对身体、性／别的高度关怀；更重要的是，它将性与阶级、族群、性别、年龄、国族等并列为重要的社会范畴，将性／别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家庭、法律等并列为重要的学术主题。

同时，这两三年中，西方学界在性领域的成长变化也益发明显和惊人。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于社会的分析，或对文化、科学、文学、媒体、国家、经济……的分析，必须包括「性如何构成或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组织、科学知识、文化……等等」的考量。学术研究若没有性的视野，就像过去没有性别、阶级等视野一样，缺乏学术批判的可信度。

有别于医学、公共卫生、生物学等处理「性」（sex）议题时的

观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针对的是「性（态）」（sexuality）。换言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针对的不是性的生理行为、性的解剖、性的物理化学，而是性的言谈论述（discourses）、性的表现文本（text）。许多学者主张：sex（性）或许是没有历史、政治的，但是sexuality（性态）却是有历史、文化、政治……的。更有甚者，人文与社会科学对于sexuality（性态）的研究，甚至会反过来重新建构sex（性），显出sex（性）的社会建构；即，sex（性）其实是被sexuality（性态）所建构发明的。这也就是说，人文与社会科学对sexuality（性态）所进行的研究及反省批判，也将进一步形成对于性医学、性的生理生物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基本范畴、预设、概念、研究方法、理论建构等加以质疑、批判、颠覆、反省、解构。

学术界此一对性的认识，不再把性视为个人或私人、道德、生理生物的问题，而清楚认识到，性乃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种族／性别／科学研究／媒体……等问题。正如西方学术研究的发展一样，这个认识亦将使台湾的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每一个科系和学术领域产生新的学术研究题目，并对原来学科中的性／别盲点产生历史的与方法学的反省。人文与社会科学这种对性的彻底（radical）批判态度正是「四性研讨会」的基本精神。

经过原撰稿者一整年的沉淀改写，许多论文都有部分或大幅度的修订，甚至超过原来发表长度的一倍；我们以非常严谨郑重、力求完美的态度，将会议中发表的论文集结成书出版。我们也整理了座谈会的发言，企图重现当场的气氛和讨论内容。作为首度集结发声的性／别研究专书，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思考来更加认识性／别政治以及在其

中操作的可能。

在此刻的眼界来看，第一届四性研讨会的论述生产篇篇都是开疆辟土之作。傅大为的性史研究揭露了二十世纪性别身体的性规范如何在（性）医学领域内操作；何春蕤的美国百年性史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分析强悍的回应了对性革命的疑虑和悲观看法；赵彦宁从现象学和符号学的观点细致的驳斥了「T 婆之分复制异性恋」的说法；倪家珍书写了 1990 年代台湾同性恋运动的重大事件并期许运动在看似友善的范围中进一步的政治化；古明君分析了技职教育体系青少年所承受的身体驯训以及情欲文化资本的限制；王苹追溯了反性骚扰运动论述和运动策略在妇女运动阵营中的演变发展；苏子中从神话、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摸度杀（Medusa）在性别体制中的境遇；赖守正揭开巴代耶（Bataille）的情色观以显示其强大的颠覆动力；朱元鸿指出酷儿政治具体的挑战了医学学系及社会学理论中充满暴力的常态化政略；甯应斌把性解放运动中的核心矛盾化解成为捍卫性解放传统的激进主张；罗灿熯以内容分析显示 A 片事件中尖锐对立的社会动力学；周华山则对香港近年性教育中的异性恋中心、年龄歧视、性别成见等等提出严厉的批判。两场座谈会更是直指此刻同性恋政治以及性教育政治的核心焦点，积极介入这两个相连领域的运作发展。

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受到许多朋友的关切和敦促，在此特别谢谢那些因撰稿或引言而卷入各种复杂辩论甚至压迫的朋友们，谢谢讲评的朋友们（很遗憾无法收入他们的发言），谢谢在会中和我们激情辩论的各方人士，谢谢辛苦的助理游羽蓁，谢谢誊写座谈会记录的无名工作者。谢谢元尊文化的杨淑慧热情邀约，也谢谢元尊文化

的叶忆华为我们费力处理庞杂的稿件。第二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工作也即将开始，让我们热切期待性／别研究继续绽放灿烂的花朵！

性学的性逻辑

——一个「性史」的讨论

傅大为

一、金赛博士的性史位置

一般而言，从美国 1950 年代开始，金赛的研究于焉奠定了美国当代性学的基础。从著名的昆虫学家转行到性的研究（从 Wasps 转到 WASPs）（注 1），他从生物的「多样变化性」以及「动物行为」观点，大量搜集各种人的性行为模式，并且刻意剔除各种社会文化面的解释因素。因为他的书大为畅销，他的研究取向就为后来的美国性学发展铺路。金赛的生物学观点的切入，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他的其他相关取向，则在他之前的美国性学研究中，其实早有发展。

在美国二十世纪上叶，「防止性病」、「维持纯净婚姻」一直是性学及性教育专家特别注意的问题性。比较不像欧洲如 Krafft-Ebing、Havelock Ellis 等重视「性」的多样变化性，美国的取向早以「异性恋婚姻」为主流关切。也因为如此，「大量问卷」式的人口取向研究早已是重要的方法。又因为「科学主义」的发展，以及受欧洲开明观点的影响（如关于性变态），「中性／不带判断」的态度也在早期的医生中浮现。从 Morrow、Exner 到 Dickinson、Davis 等，都是美国当代性学的先驱。其中 Katherine B. Davis 更为性学研究调查的制度化的重要贡献。在这个历史脉络中，Rockefeller 基金一直提供大量资助，就像它以后资助金赛一样（注 2）。所以，金赛虽是外来者，但美国性学传统对他的方法并不陌生，包括与他共享的

「异性恋婚姻」关切；一旦介入其中，金赛就稳稳地立足于性学传统之中。当然，这也不是否认金赛「生物」及「生理」观点的重要性。他的「生理」观点、强调「性最自然」的立场、把「算高潮次数」当作他性学的度量基础，都对后来的性研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生物学史家古德 (S. J. Gould)，除了称赞金赛强调生物性行为的「多样变化性」(注 3)，掌握了达尔文主义的精神外，更以「他访谈的直觉技巧更是具有传奇性」来称赞这位被麦加锡白色恐怖所迫害的当代性学英雄(注 4)。但是，透过分析金赛的访谈规则，Janice M. Irvine 在她的 *Disorders of Desire: Sex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n Sexology* (1990, Temple) 之中则深入检讨在金赛表面「科学中性」宣称之下的性别意识型态。金赛所访谈的人数虽多 (5300 白男个案，5940 白女个案，包含各阶级与地域)，但他雇用「访谈者」的规则很有问题。根据金赛助理 Pomeroy，有三点规则：〔1〕访谈者需要有快乐的婚姻，但也因此不雇女访谈人(注 5)；〔2〕访谈者需要有医学或博上学位，但仍能与比他们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相处；〔3〕访谈者需生长在美国，熟悉一切，但能够避免去评价别人的性事。他也避免雇用有奇怪种族源头姓氏的人，像犹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金赛的助手们可说都是男性、异性恋、中产阶级、白 Anglo-Saxon 的清教徒——这些是他「正常」的标准。金赛相信，WASP 可以对任何人进行访谈。如此，金赛的男女性学报告，是在「异性恋婚姻」WASP 的世界里所问的问题与所听到的回答。

这样一个当代的性学英雄，他的「研究」在西方性史的位置，如

何去衡量？如果我们用 Laqueur 近来讨论西方「性／别的解剖学史」的尺度为参考（注 6）——他认为从希腊时代到 18 世纪末是一种特殊的「单性」模型（one-sex model），女人以男人为标准，彼此极为类似，而从那时之后到 20 世纪初则是一种「双性」模型（two-sexes model），是我们熟悉的 Victorian 模型，男女极为不同——那么，金赛的性学（注 7）在 Masters & Johnson（以下 M/J 简写）之前，可以说是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同性」模型。以「算高潮次数」为基本单位，金赛注意到男女在高潮时生理及肌肉的类似性。从强调自慰的健康与重要性，他看到「阴蒂高潮」的重要，并质疑所谓 Freudian「阴道高潮」有任何生物、生理，乃至解剖学上的意义。就神经分布而言，阴道中极为稀少，远不如阴蒂重要。如此。从金赛到后来的 M/J，维多利亚式的性别论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刀下逐渐瓦解。

除了从医学权威强调「同性」的重要之外，金赛还有另一层的意识型态原因要强调这个新模型。虽然「同性」说的论据不强，从金赛自己调查的男女性高潮平均次数的比较就很明显，〔无论婚前婚后男均远高于女〕，但是，金赛及后来的 M/J 都想强调新时代里「女性性」的重要性。吊诡的是，从十九世纪不会或不该有「性愉悦」，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女性会或该有性愉悦，其判定的标准都是为了「异性恋婚姻」的主流价值。医疗论述之所以有转变，从不该有到该有，正在于婚姻制度、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有「消费性社会」等等在当时的巨大转变与形成，故而促成医疗「论述策略」的重大改变。十九世纪的性「正常／变态」的规训并不足以防止新消费性社会中的高离婚率与

拯救婚姻制度的危机，于是干脆将「变态」都归于广义的「婚姻性愉悦」中，一方面让女人拥有更大的性愉悦，以交换婚姻的稳定性与女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则透过新的医疗技术，大量制造安全驯服的性快乐，并提供性快乐的新规训标准，以进行「性快乐」的规训。为了婚姻及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为了解决「性挫折、女人没有性高潮，是婚姻危机最主要的原因」的问题，金实明显地以「功能主义」来看性愉悦与婚姻的关系（注 8）。我引一段金赛的话来结束这一节（注 9）

There is developing in this country,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some of the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a home, and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raining modern youths and adults to be more effective marital partners. It is in these term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sex education, of pre-marital sexual outlets, of non-marital sexual activities for adults, and of the techniques and frequencies of marital coitus are being evaluated today. [emphasis mine]

二、新性学论述的确立与问题；Masters & Johnson 及其他

不同于半途转行的昆虫学家金赛，William Masters 本来就是医生，他小心翼翼地等到 38 岁，成为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后，才开始做关于性的研究。他更策略性地选 Virginia Johnson 为研究伙伴，成

为一个「两性队伍」(dual-sex team)，以便于对女性进行实验。就这样，M/J 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性学研究稳稳的建基于医学权威上。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 *Human Sexual Response* (1966) 非常成功，打入了大众市场，再加上他们开始应用他们的生理学研究成果，开始「性治疗」(sexual therapy)，更使社会上许多「有问题」的夫妇趋之若鹜。所以，站在金赛的基础上，M/J 所开出的美国当代性学发展策略，是以医学权威为根，而走向大众市场。

也正是 M/J 这种医学及市场／媒体的取向，他们的研究逐渐失去了金赛「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重点。从今天性学史的观点看来，M/J 研究的初略与问题重重是有名的(注 10)。就取样来说，M/J 从 694 人搜集到上万次的高潮来做的研究很有问题。这些人通常都是白人、中上阶级、受高等教育，并在摄影机及强灯下可以表演成功(注 11)。M/J 的取样条件是；「必须要有自慰、有性交高潮正面经验的个人历史才可以被接受」。而根据作实验者的一些自述，他们多是对性相当有兴趣的人。这种选样标准，Leonore Tiefer 认为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是「选国际大歌星做实验，来研究人类的歌唱行为」(注 12)。虽然 M/J 也承认他们的选样没有代表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被他们称做(the Human Sexual Response Cycle)。男女高潮被认为非常类似，都有四个一般阶段：excitement、plateau、orgasmic、resolution。但这个不断被强调、却非常可疑的行为主义意义的「response cycle」，其可靠性自然比重视「多样性变化」的金赛的研究要小很多。

选国际男女大歌星来做实验？可以想见两点；一、以歌唱的颠峰

来做为一般歌唱的标准；二、可以发现男女唱歌的方式很类似。M/J 继承了金赛以「性愉悦」作为社会的新规训的策略，扬弃十九世纪的双性模型而热烈地拥抱新的同性模型。在这意义下，我们可以曲折的读出，M/J 有意无意地透过样本的选择，塑造了「同性」模型中的新典范——异性恋婚姻中的「国际男女大歌星」；且暗示，只要好好唱歌，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M/J 进一步加强营造「同性」模型，在「性反应循环」的四个阶段中，强调男女性高潮的各种类似性。虽然许多评论者都已指出，M/J 书中所发现的男女「性」的相异性（注 13），事实上与彼此的类似性一样多，但在「同性」典范的要求下，除了女性性高潮的特高能力外，其他都被忽略与边缘化。

和金赛的访谈与诠释相反，M/J 的生理学研究认为女性的性高潮能力远超过男人：「女人对性刺激做反应的能力是没有上限的」（注 14）。虽然这个观点的意义，对 M/J 而言，要从它对「异性恋婚姻制度」服务所能提供的功能来评估，它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又如何？它蕴含着女人在「性愉悦」上的高度自主性，自慰的效果最好，男人（或其他伴侣）并不重要。这是女性性解放还是可能的新规训？重新想探讨「Straight sex」的 Lynne Segal 认为，M/J 把女人自己性高潮的满足、排除男人性挫折的恐惧的责任都放在女人身上。即使在婚姻里，女人要（和男人一样）努力做、反应、负责所有的性事（注 15）。除了这些问题外，M/J 定义性愉悦的「性反应循环」，正挟着巨大的社会物质力，以另外一种形式，建构着性愉悦的新规训。它就是著名的 *DSM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在当代美国性学瓦解了 19 世纪的「正常／变态」与「双性」模型、提倡新的性愉悦来维持异性恋主流婚姻制度后，吊诡与反讽的是，在「新愉悦」的医疗论述中，却伴随而起了新的医疗规训、新的「正常与病理」。无论是 *DSM-III*（1980）、*DSM-III-R*（1987）或 *DSM-IV*（1994），「性的功能障碍」dysfunctions 或「性与性别认同的错乱」disorders 中的各种不同的病态，均是扣合着 M/J 的「性反应循环」为蓝本的（注 16）。凡是「循环」中提到什么功能或阶段，如果在一般男女身上看不到，那就是障碍或错乱，就有进行医疗的需要及正当性。如在 excitement 阶段，就有 female sexual arousal disorder 及 male erectile disorder 两种来对照。在 orgasmic 部份，对照的「错乱」就更多了（注 17）。在医疗的正当性规训之下，文化、社会、家庭、男女权力关系等等可能的「外在」原因，就显得不重要，而心理、或更重要的生理机能、乃至医疗技术的「修正」，才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 *DSM* 所挟带的物质规训的巨大力量。它是精神医学诊断的官方标准、法庭上承认它、医院及心理治疗以它为记录的单位、保险公司理赔根据它、研究者及教师以它为分类标准，而国家机器、媒体、婚姻制度机构都依靠它来做记录、分类、估算，以及讨论和炒作的题目（注 18）。这，正是主流权力即识的「命名的力量」。

三、性器官零组件修配场，或「泌尿医学」的帝国主义？

如果当初 Masters/Johnson 以「医学为根、向大衆市场发展」作为性学发展策略，这个策略也会反挫。只要大衆市场够大，为什么医

学自己不去拿，而需要「性学」当媒介？的确不需要，对男人「性障碍」的市场而言，泌尿医学正积极发展它的鸿图大略。近二十年来，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所谓阳痿）的领域，原本被认为是在性学或心理学范畴的，现在不断地被扩张中的「泌尿医学」（Urology）所殖民。透过「阴茎填充术」的各种先进科技，泌尿科咄咄逼人地向男性大众市场进军。原本的性学尚重视「男女关系」、高潮，乃至「性愉悦」的各种面向，现在的泌尿科则只强调男人「局部」的性器官，专攻修补零组件，以勃起持久为目地。在这种「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下，女人（或其他伴侣）的身体及其情感与关系，都是多余、不相干的。在这种泌尿科的「帝国主义」逻辑之下，是否当初的性学发展，终于需要面对它发展逻辑的极致——从抛弃社会、权力面向，到忽略心理面向、到生物行为与生理机能化约论、到最后的阳具功能化约论。

泌尿科、精神科医生、也是 1993 年美国性学「金赛奖」得奖人的 Leonore Tiefer，在她的 *SEX is Not A Natural Act & Other Essays* 之中，正是以「帝国主义」来表示她对泌尿医学的不满、关切性学的被殖民，以及显示性学需要大幅的反省（注 19）。

前面我们提到，在 M/J「同性」模型中，透过「性愉悦」对女人的新规训；但在泌尿科的逻辑中，女性基本上被忽略掉。使得这种逻辑可以和传统「男性性」（Masculinity）紧密的结合。根据 Tiefer，泌尿科「阴茎填充术」（penile prosthesis）对男性的诱惑，在于它对男性的「问题」是一个「技术」的解答，不涉及心理及权力关系等复杂问题。就如运动伤害是运动表现差的常用借口。阴茎伤害也

开始大量被医疗权威用来当作是性交「表现差」的正当理由（注 20），这种男性可以不负责任的物理／生理伤害、及其技术性的「修补与校正」，相当符合传统男性性的模型。这种大量「医疗化」男性性的取向，也为大众媒体所喜爱，因这是一种「干净而清洁」的医疗化「性书写」。一种没有猥亵、没有色情、男女都可剪报的性书写。

当然，泌尿科帝国主义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所谓「性革命」、对女性性愉悦新规训的反应。当性学「医疗化」女性性高潮规训了女性的高潮自主独立，泌尿科也就「医疗化」男性的「阴茎勃起」，规训了他的勃起自主独立；两种医疗都没有「性伴侣」的问题。那么，帝国主义扩张的下一步呢？什么是「完美阴茎」向前推进的方向？Tiefer 看到了「早泄」（premature ejaculation）——一个理想的新「生理性错乱」（physical disorder），也看到了「阳具」最好的朋友——性医学，它正努力的把性关系制造成一种更像男人间可以彼此竞赛的运动（注 21）。美国太空人 Armstrong 在月球上的一大步是甚么？我们看看 Tiefer 的感言：「如果我们可以把人送上月球，我们当然也能够发展药物或技术，来加速、延缓、增强、刺激、延后、或挑起高潮（或勃起、性欲、性幻想、性刺激、或性记忆），毕竟，性的虚拟实在也是一种实在。」

四、性史的继续：二十世纪的「新开拓」

The machinery of power that focused on this whole alien strain did not aim to suppress it, but rather to give it an analytical visible, and permanent reality: it was implanted in bodies, slipped in beneath

modes of conduct, made into a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established as a *raison d'être* and a **natural order of disorder**. (emphasis mine) ---Foucault, "The Perverse Implan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在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中，傅柯从许多角度来说明「压抑说」的问题，说它不是历史事实、远不如想像来的强，更重要的，是它（如在十九世纪压抑究竟是较多或较少之类的问题）无法确实有效地说明历史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与形式。避免用压抑的语言，傅柯得以说明十九世纪里，医学论述对各种性错乱、性变态的「新人类」、「新族类」（注 22）的权力的穿透。一方面，各种「性变态」的法律制裁要比十八世纪前宽松，另一方面，医生的注视、倾听、描述、分类与禁制疗养则取代了传统「警察与狱卒」的压制。总之，把性「放进论述」的权力发展策略在十九世纪大幅发展，特别是医疗论述。那么，二十世纪是否是连续的状况呢？哪些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类与族类」？

从本文前三节的讨论看来，金赛之后已经出现了许多的「性」新人类。不过，二十世纪「放进论述」的过程仍有许多的新发展。首先，新性学以来，明显地，「压抑」的说法已经越来越没有解释力与诠释效果。在大方向上，金赛与 M/J 都鼓励性高潮、研究达到高潮的疗法与技巧，甚至进一步提出达到高潮过程中的许多可能的困难——即性错乱与性功能障碍。但是，前面提过，这些新说仍然发展出「性愉悦」的新规训。透过先进的科技，权力之线这次在男女性器

官、性肌肉、血管、神经、血液循环、填充物、内在药物、分子生物层、荷尔蒙、断层扫描等等中间来回穿梭与穿透（注 23）。前面第二节也已经提到过 *DSM* 系列的「错乱系谱」（geneology of Disorder）、「障碍分类」（classifications of Dysfunctions）。这些错乱族类，我不确定可否用傅柯的「a natural order of disorder」来描述，因为它们不一定是出现在像 19 世纪「另一种人类」那样的独特空间中。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说，function/dysfunction 的意义里蕴含「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的面相，而非像过去看同性恋有「另一种人类」的蕴含（注 24）。不过，*DSM* 主流论述的「命名的权力」，绝不会比 19 世纪的「另类人类」分类的权力效果差，第二节已经提过。下面，本文进一步讨论两种人：ISD（inhibition of sexual desire）患者，还有曾经活跃在媒体上的变性人（transsexuals）。先谈 ISD。

过去，佛洛依德有个臭名昭彰的问题：「女人到底要什么？」，到了 1980 年代，性学专家已开始在问一个新问题：「女人要吗？」或「女人有欲望吗？」。在 19 世纪，一个「双性」模型的时代，女人如果没有欲望，也许是正常的，甚至是充满「精神层次」的。但在 20 世纪「同性」模型中，在「性愉悦」的新规训之下，这就成为了一种新的「错乱」——有什么模型就有什么错乱。在这种新规训的宰制下，1980 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各种「性疗中心」，抱怨他／她们对性「没有兴趣」。对他／她们而言，不是不懂性技巧、性高潮或不熟悉典型的性幻想情节，也不是局部性器官有什么功能障碍或生理问题，而传统 M/J 的性循环四阶段论，甚至无法开始去了解他／她们的问题——因从金赛以来，各种性学一开始都预设了作为人的性机械

引擎的「自然性欲」。总之，性学专家他们无法了解为什么「无欲族」会存在。所以，性学专家 Helen Singer Kaplan 修改 M/J 的四阶段论，成篇「欲望、激动、高潮」的三阶段论。如此，「无欲」终于成为一可了解的「错乱」，因它是三阶段论中的一种「缺陷」。也如此，在性学「生理」典范的指引下，大厂、荷尔蒙研究专家等可以介入，像 Wellbutrin、Exsativa 等高科技的「春药」可以发展出来，供性学医生使用（注 25）。

从性学「生理」典范、还有 Kaplan 的本质主义出发，她自然认为「性欲存在脑中」。这简单地排除了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等等脑外的领域。事实上，「无欲错乱」的病理指控还成为了婚姻中权力关系的工具。它虽曾是新性学的大问题，但在现代婚姻危机的大市场中，它也代表着性学广大的潜在市场。虽然，从女性主义观点看来，女性的「无欲」通常反映了卧室床上「被宰制」的权力关系（注 26），但性学专家相当积极、快速地去「medicalize」这个新发现的「无欲族」。Irvine 简单描述了性医学对那些感到「性无趣、性无聊」的人们进行「医疗化」或医疗殖民化的过程：一、将它制造成一种病。二、对它进行大量生物医学的研究。三、发展出长期有效的疗法。四、在一些病例中植入「特殊药物」疗法。

从性学论述的发展史而言，性学医生与「无欲族」的罗曼史可有四个阶段：迷惑不解、（自我修正后的）发现与命名——ISD、驯服与关切、成为性学开发潜在市场的新工具。

五、讨论了「无欲族」后，我们现在来看「变性族」

(transsexuals)

从 1950 年代 Harry Benjamin 开始研究与推广「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 之后，美国性学医生、还有许多呼应而起的「性别认同诊所」(gender identity clinic) 在 1970 年代大为风行。医生们以先进科技来改变身体性器官，借以解决身体与性别认同彼此不能协调的问题：“One sex trapped in the body of the other sex”。这除了代表性学又一个广大的潜在市场之外，还有许多进一步的意义（注 27）。首先，一个大背景是美国在 1960 年代以来「性别区分」逐渐模糊化下的一种广泛的焦虑。所以，性学医生所创造的「变性主义」，事实上是在重新肯定性别范畴的截然区别：从男到女或从女到男的重大变性手术，正是肯定了「男／女」的重大区别（注 28）、也肯定了这种区别只有个体生理上的意义、进而排除这区别的社会建构意义。虽然社会上性别区分逐渐模糊化，但变性主义保证治愈各种的「性别叛变」。

变性手术的复杂性与困难、医生对可能的手术者的诊断、筛选（注 29）、长期手术程序中的要求与性别预设等，都对（手术前／后的）变性人以及其他潜在的有兴趣者与旁观者，造成强大的规训效果。不少变性人本来就对「男／女」分别意识相当僵硬与狭窄——故易于去寻求变性手术，而医生在变性手术过程中更进一步地去规范变性人人格、去社会化变性人进入新的性别生活、去控制各种跨越性别的医学管道。

虽然要控制各种跨越性别的管道，吊诡的是，性学医生非但常常无法将「性别叛变」者以手术刀规训在两种性别的框框中，反而无意中制造了第三种性别：变性人。变性族成了 20 世纪性学「新人类」滋生过程中的无意副产品、一种往往具有颠覆性的副产品。无论是被挡在手术前（因为它的复杂与昂贵）的变性人，或是手术后的变性人，对她／他们自己或社会大众（如果被揭露），她／他们的第一性认同往往是「变性人」、第二性认同才是变性后的性别。甚至当男变女的变性人想参加（纯）女性主义团体、或想做女同性恋者时，往往也招到基进／分离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强烈质疑（注 30）。就像 AIDS 患者有自己的互助团体，在主流性别的极端边缘的变性族也有自己的互助团体；不少变性族的同情者反而是男同性恋者。

于是，新性学的「新人类与新族类」继续的滋生、繁衍，傅柯的「性史」也继续着——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角度里。

注释

- (注 1) 参考 Stephen J. Gould, "Of Wasps and WASPS" in his *The Flamingo's Smil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1985, Norton)。
- (注 2) 参考 Vern L. Bull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exology in the U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R. Porter and M. Teich, eds., *Sexual Knowledge, Sexual Science: A History of Attitudes to Sexuality* (1994, Cambridge)。另外，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前金赛」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对「性」及性学的态度，常与当时的性教育者相类似；还有，对当时许多「婚姻及性」的 manuals（作者常是女人）的内容讨论，可参考 Lynne Segal, *Straight Sex: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pp. 70-89 (1994, Virago)。
- (注 3) 在演化论中的 primacy of variation 观点，以及金赛在这个意义下的 anti-essentialism。这自然可以关连到金赛对性／别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进步贡献；他对所有被访谈者的「性宣泄管道」（sexual outlets）分做六大分类：自慰、梦遗、异性恋爱抚、异性恋性交、同性性关系、兽交。彼此一视同仁，打破过去的性偏见。
- (注 4) 参考 Gould, "of Wasps and WASPS" op. cit., p. 158. 另可见 Gould, "Male Nipples and Clitoral Ripples" in his *Bully for Brontosaurus: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1991, Hutchinson)

Radisu)。

- (注 5) 参考 Wardell D. Pomeroy, *Dr. Kinsey and 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 p. 102 (1972, New York: Harper/Row)。根据金赛，女人很难一方面常常在外旅行访谈，另一方面还能保持良好的婚姻。
- (注 6) 参考 Thomas Kaqueur, *Making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1990/2, Harvard)。
- (注 7) 这是取"form difference to sameness"的历史发展意义。近代「同性」与「双性」两模型有一重要的共同基础；它们都以近代以来的医学权威为根本。而 Laqueur 所讨论的「单性」模型，如在希腊时代，则医学与政治、社会彼此平行。对 sex 而言，没有特别的权威。
- (注 8) 参考 Janice M. Irvine, 正文中引用，ch.1，以及 Lynne Segal, *op. cit.*, ch.3。
- (注 9) 见金赛，*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 p. 347。
- (注 10) 参考 Janice M. Irvine, 正文中引用，第二章。Lynne Segal, *op. cit.*, ch.3。Leonore Tiefer, *SEX is Not A Natural Act*, ch. 4, "Historical Scientific, Clinical, and Feminist Criticisms of 'the Human Sexual Response Cycle' Model" (1995, Westview)。还有 M/J 的死敌 Bernie Zilbergeld, 见 Bernie Zilbergeld and Michael Evans, "The Inadequacy of Masters and Johnson," *Psychology Today*, August 1980, pp. 29-43.

- (注 11) 原来 M/J 找了许多妓女来合作并接受她们的教导，不过后来那些个案也不用上。毕竟，M/J 性治疗的主要客户对象是中产阶级，所以研究对象也应该来自那个阶级。
- (注 12) 见 Leonore Tiefer, *op. cit.*, pp. 43-44。
- (注 13) 如，男女每次高潮的差异度，男小女大；又如，「性反应循环」就男性而言只有一种，而女性有三种之多。参考 Janice M. Irvine, *op. cit.*, pp. 87-88。又因为 M/J 的样本比金赛要狭窄的多，金赛所提到的男女「性」在阶级上的差异性，在 M/J 中则完全缺席。参考 Leonore Tiefer, *op. cit.*, pp. 44-45。
- (注 14) 这是 19 世纪双性模型中「无欲」的女性形象的相反极端。
- (注 15) 见 Lynne Segal, *op. cit.*, pp. 97-100。M/J 似乎在说，当女人被给予了最大的能力时，她也负担着最大的责任。
- (注 16) 唯一不同的是，M/J 「循环」原来的第一阶段被改成 *appetitive, excitement* 则被顺推为第二阶段，原来的第二阶段 *plateau* 则被删掉。这是当「*sexual desire*」的问题（与 *appetite* 有关）成为当代性学的大问题后 Helen Singer Kaplan 所建议的修改。后面会再谈到。见 Leonore Tiefer, *op. cit.*, ch. 4, pp. 49-52。
- (注 17) 根据 *DSM-III-R*，有五种：*inhibited female orgasm, inhibited male orgasm, premature ejaculation, dyspareunia, vaginismus*。
- (注 18) 参考 Leonore Tiefer, "Gender and Meaning in the Nomenclature of Sexual Dysfunctions," ch. 10 in Tiefer, *op. cit.*。
- (注 19) 参见 Leonore Tiefer, *op. cit.*, part IV and part V。

- (注 20) 在过去，男性功能障碍百分之九十被认为是心理因素，1970 年代以来，百分之五十以上被认为是局部生理问题，这是一种大改变。这是男性性的「医疗化」(medicalization)。参见 Tiefer, *op. cit.*, ch. 16, "In Pursuit of the Perfect Penis: The Medicalization of Male Sexuality"。
- (注 21) 参见 Leonore Tiefer, *op. cit.*, ch. 18, "Might Premature Ejaculation Be a Physical Disorder? The Perfect Penis Takes a Giant Step Forward"。
- (注 22) 从最有名的「同性恋」、「歇斯底里」，到许多其他：zoophiles, zooerasts, auto-monosexualists, mixoscopophiles, gynecomasts, presbyophiles, sexoesthetic inverters, and dyspareunist women, 到 children wise beyond their years, precocious little girls, ambiguous schoolboys, dubious servants and educators, cruel or maniacal husbands, solitary collectors, ramblers with bizarre impulses。见傅柯《性史》第一册，pp. 40-43，英文版。台湾市面流行的两种中文翻译版都绝对不可信。
- (注 23) 如果 19 世纪医生的注视、倾听、描述、分类与禁制疗养是坐落在身体的「表面」，则 20 世纪医生新的关注点往往在身体「内部」。透过科技，他们穿透、重塑、复制、填充、模拟与监视。
- (注 24) 当然，这不是说，「同性恋」这种「错乱」不曾出现在 *DSM* 之中。它当然也在其中，但因为同性恋者在 1970 年代

全面示威包围的结果，医生们只好把这种「错乱」除名，请出 *DSM* 之外。这是从「分类的真理」转移到「分类的政治」！

(注 25) 参考 Janice M. Irvine, *op. cit.*, ch. 6, "Repairing the Conjugal Bed: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Modern Sex Therapy", pp. 210-220。

(注 26) Irvine 从 Masters 一篇回顾文章中做这样的分析与归纳。见 W. Masters, "Three Decade Retrospective of the Master and Johnson Institute" (1983-)，Irvine 提出四个线索：一、通常人无法对他／她感到愤怒的人有欲望。二、被诊断为 *ISD* 的病人，女人仍占多数。三、传统性学治疗已被扩展到「长期关系」的治疗中，但仍只以「个体」为关怀。四、*ISD* 比其他「障碍」不好做性治疗，失败率达到百分之五十。

(注 27) 参考 Janice M. Irvine, *op. cit.*, ch. 7, "Boys will be Girls: Comtemporary Research on Gender", esp. pp. 257-271。

(注 28) 虽然，新性学强调性高潮与性愉悦的「同性」模型，但这并不妨害他们仍维护传统的「性别」（包括认同、仪态、语言、身份、社会角色、各种身体特征等）区隔。

(注 29) 基于他们自己的性别刻板印象，医生们往往从申请者的仪态、外貌、言语等来判断是否他／她们真有需要进行这种「不可逆」的重大手术。医生们特别等待要听到的是申请者说：他老她们感到他们的性／别是困在另一性的身体中。这种说法就成篇变性主义的「关键叙事」（*master narrative*），而后来的申请者也很快就学会这种叙事。

(注 30) 如，一种说法是：「这个变性人（男变女），在他享受了男性特权后，是否现在又想来讨女同性恋文化的便宜？」不过同情的女性主义者也很多，造成不少辩论。

性革命

——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美国百年性史

(注1)

何春蕤

摘要

情欲领域中的急速变迁跃动，是顺应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趋势而将身体进一步性化？是中产女性以改良式的情欲解放运动来延缓并漠视基层女性真正的革命需要？是情欲优势女性模仿或复制男性欲望以扩张自己的情欲版图？这些夹带着价值判断与各种化约论假设的问题，需要历史的、社会的具体复杂分析来加以回应。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整理厘清各家丰富错综的历史叙述，描绘出美国近代百年的情欲革命史，显示所谓情欲革命的意义在于情欲生产力与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如何被社会运动凝聚转化，被情欲边缘人口用来改变抗争的基点、累积新的主体养成资源。在这个意义之内，性革命已不能被简单的成功失败评断所化约，性革命的历史和运动分析是进一步改变社会的必须。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这段话带着一股极强的必然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激化矛盾就是社会革命发生的契机。这个分析方式固然提供了理论架构来思考社会革命的发生条件，可是它似乎也暗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整体，各自有其

颇为统一的性质和内容，因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矛盾也是颇为容易理解和观察的事情。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在写《捍卫马克思》（*For Marx*, 1969）的时候为这个架构做了一些补充。他引入了一个借用自佛洛伊德的概念，也就是「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细致的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是因为许多「来自不同源头、不同意义、不同层次和施力点的矛盾」——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极端异质的——在历史际会的时刻同时积累于同一场域，融会成为一个爆发的整体，因而形成社会革命（100）。阿图塞对多重决定的说法显示，是诸多异质矛盾的社会力在某个社会场域的际会，互相影响，互相运作，形成革命：这个说法在上层／下层单向决定论（determinism）的二分模式中开辟了更多的复杂空间。同时，多重矛盾的聚积和汇集虽然听起来是偶然的、自然的发展，但是其中仍有其必然性：「它们在『融汇』成革命式爆发时所构成的整体（unity）是被它们的本质和效应构成的，也就是被它们各自运作的特殊模态所构成的」（Althusser 100）。换句话说，阿图塞认为即使是多重异质的矛盾，也会在一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必然汇集成「整体」，形成革命。以二十世纪 1990 年代的眼界而言，这个具有某种统一性质的整体已不必然具有什么实证意义，诸多异质矛盾的社会力也不再轻易的享有不言而喻的融汇倾向，但是作为一个充满启发性（heuristic）的思考架构，阿图塞的分析模式在捕捉历史的某些际会时刻上还是个可用的工具。

比较不为人讨论的是，早在阿图塞之前，奥地利的佛洛伊德—马

克思主义者赖希（Wilhelm Reich）就已在其名著《性革命：迈向一个自律的人格结构》（*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中（注2），尝试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另一种宽广的理解，也就是把有关社会革命的结构分析运用到性的领域内。赖希和所有的社会建构论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一样，认为个人的性欲强度及需求性质总是在「性」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Reich, *The Sexual* 17），婚姻则是最主要规范情欲的制度。他也观察到，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性——不管作为观念或实践——虽然已经发展到无法在既有婚姻道德所允许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是婚姻关系中（许多）妻子和孩子在经济上的依赖位置却仍然要求婚姻道德继续巩固，以维持婚姻制度的存在及其所提供的保障。而另一方面，（某些）妇女和青少年因为劳动民主化而得到机会参与生产工作，在经济上逐渐向独立自主迈进，在生活方式和情感心理上也倾向更多样的需求，婚姻家庭制度内那个强制要求的、一向极为有限的情欲运作通路因而凸显出其威权的本相（注3）。这两股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根本变迁一旦汇集，就使得情欲的需求和婚姻家庭的道德之间产生了基本的矛盾，赖希认为这就是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了（Reich, *The Sexual* 152）（注4）。

赖希的历史眼界当然没有给他机会像 1990 年代的情欲政治（erotic politics）研究者那样细致的认识「性欲强度及需求性质」中包含了何种复杂多样、与主流道德对立的内涵，他所说的「性革命源自婚姻制度的紧张矛盾状态」似乎也太简化了社会变迁过程；不过，以下本文将透过对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两次重要的性革命的历史

分析，初步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特别是透过我对赖希和阿图塞的运用和补充——在情欲领域中的可能操作（注 5）。我想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因着一些历史际会的原因而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创造愈来愈明显的情欲发展与多样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情欲生产力」(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 的大幅增加，以致于和原本规范情欲运作的「情欲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现阶段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一夫一妻父权婚姻家庭和异性恋体制——形成强大的紧张状态（注 6）。这种紧张状态不但表现为情欲活动日渐升高的可见度，更带动各种情欲论述展开意识形态争霸战，为各种运动主体创造介入施力的可能——这些激荡的汇集就是我所谓的性革命。

在理论的层次上我也想指出，情欲生产力在 20 世纪的发展当然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带动的人口流动和欲望创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欲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形式也极可能纠葛了既存的其他权力网络（如性别、阶级、族群、年龄、性口味等）。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个情欲生产力的跃进就全然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或者必然只会加剧其他不平等权力的运作而已——提出这类结论的人不但低估了社会力的矛盾复杂（也就是高估了宰制权力的彼此配搭合作无间），同时也蔑视了权力弱勢的主体和她们的运动实践在此过程中的各种可能壮大施力。

事实上，在本文的动态结构观点中，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并不是什么固定明确的两块铁板，而是情欲的不同呈现与沉淀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展现出来的紧张及对立。因此，某些在此刻被视为体现情欲生产力开拓跃进的实践和论述，固然可能和那些体现当下情欲生

产关系的实践和论述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战，但是这种紧张关系或者敌我的部署并非绝对或固定，它们都可能在进一步的挪用串连中形成新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新生的情欲生产力若能在某些有利的条件（如基进社会运动的介入）之下扩散沉淀，争取到自我再生产的机会，就有可能重织情欲生产关系的经纬，甚至介入资本主义主体再生产的途径和性质。毕竟，傅柯所谓的「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各种社会力的激荡抗争中流动变换的（注 7）。另外，性革命对于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革命有其深刻蕴含，我将在结语中提出赖希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以破除此刻反控氛围中一般人对美国性革命过分简单轻蔑的评价。

在本文的理论架构之内，性革命并不是情欲实践被整体的、单一的、彻底的翻转或全面取代；相反的，它是情欲模式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中——被观察到、被大量关注讨论——的多样化发展，这个多样化的增长速度和幅度使得性的运作方式、具体实践、论述说法、甚至相关情绪反应，都一再突破原有情欲体制的决定或局限，这就是性革命的征兆。同时，本文对性革命的历史分析也将指出，性革命的方向、幅度、以及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冲击，深刻受到基进社会运动的介入影响。因此，我在论述性革命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关注多重异质的、在性领域中各有其特殊运作动力学的权力关系如何相互竞争、操作、冲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仍然保留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分析工具，以作为介入论述的切入点，希望能串连不同的抗争，拉出一条松散但确定的反对战线，在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前提中不丧失对立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的眼

界。

I

研究性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者们多半同意（注 8），美国近代史上有两个时期呈显出极大的情欲模式变迁，也就是我所说的「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一个是 1880 到 1920 年之间有关性道德和婚姻的重大转变，另一个则是 1960 年至今弥漫西方的性革命（注 9）。这两次性革命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之内都已形成重大的影响，深刻的改变了家庭、婚姻、爱情、性、堕胎、求偶、同性恋等等的文化面貌及实践，而这些具体的冲击和改变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等等简单评估可以捕捉的（注 10）。或许运动者更需要做的，是深入研究这两段历史，以便寻找可以在现有脉络中使用的思想及运动资源。

虽然史料极为有限，常常要依赖口述流传的个人经验和观察，或者只能从一些政治决策者对社会现象的忧心记述中侧面推敲，但是研究者几乎都同意，最明确标记出 19、20 世纪之交的性革命的，就是过去在情欲双重标准之下饱受限制和监控的女性。19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功能变迁，很明显使得女人的社会定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女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逐渐有机会和能力脱离以婚姻家庭为主的依赖关系和生活空间（注 11）。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未婚的）女人开始有经济能力和机会发展新的属于她们的生活文化时，由于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因素的际会（详见下文），使得「性」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并在开发情欲的过程

中形成了松动原有情欲关系局限的趋势。这也就是说，「某些女人【在当时】之所以选择进行比较随便的情欲模式，这必需要透过那个更广大的塑造其性文化的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来理解」（Peiss 132），而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女人的经济独立」而已。

促成世纪之交美国情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所带来对家庭结构的冲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年轻劳动人口开始流出原有家乡的人际脉络，进入新的都会空间，单身的劳动者大量集中到工商业都市的周边，在逐渐增多的临时居住空间（如 YMCA）或者供膳宿、混合性别的寄宿型住家中找到居所，以便在当时新兴的工厂、店铺、和百货公司就业（Seidman, *Romantic* 67-68）。在这些外在于家庭或社区人际网路的流动生活空间里，年轻的劳动者开始建立新的人际网路，原本被父母、教会、邻居、学校主导的求偶模式，渐次被自主性愈来愈高的交友方式取代，年轻男女在尝试和摸索中社会化，逐步发展出在她们父母和社群控制之外的情欲关系和模式，而且由于多多少少摆脱了原生家庭和社区的监管，她们对于不合道德常规的性活动也有较高的容忍度（D’Emilio & Freedman 228），这种自在和自由形成了情欲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

在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居住，以及新的年轻生活形态和经济实力的形成，很快的回头为当时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提供开发新型消费的诱因，以便吸收工资回笼。新兴的消费事业重新定义原本在家庭脉络中进行的闲暇活动，把工余的休息转化为在商业领域进行的休闲（Freedman 38-39），而为了呼召年轻的消费

主体，这些休闲事业多以一向最被成年人垄断的「性」为最主要的卖点，进而促成情欲生产力的大跃进以及情欲生产关系的多元化。

众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当时在都会区出现大量像舞场和俱乐部之类的新物质空间，首度标志了陌生男女已经可以借此聚集并互动调情，这些新空间则把工作之余的休闲呈现为勾动情欲的特别节目与活动形式，以便吸引下班以后无「家」可回但是又无事可做的年轻单身消费者（D'Emilio 及 Freedman 195-196）。在这种充分激动而鼓励的空间中，年轻的消费者相应的自发创造并扩散新的身体经验，刺激新奇、两人配对、摆动身躯、密切接触、充满情欲暗示的动感舞步，取代 19 世纪那种老少皆宜的制式集体舞步而成为流行；同时，从摆动臀部到身体接触到拥抱等等充满性暗示的动作，也直接雕塑出新消费主体充满情欲活力和诱惑的身体（Seidman, *Romantic* 71）；各种新兴的「钓人」据点出现，更凸显情欲的波动已经在这个阶段成为休闲活动的主要触媒（Peiss 128-129），交际的需求甚至带动其他新型娱乐场所的兴建，世纪之交开始出现的大型游乐场（最出名的例子就是纽约附近的 Coney Island）就以各种刺激惊险的游乐设施来直接提升感官的刺激，并以各种耸动情欲的广告来间接鼓励陌生男女在搭乘游乐设施的紧张过程中顺势进行身体的接触（注 12）。同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电影院则提供了黑暗的自在空间和银幕上具体的情欲形象，供情侣们边看边学，在后段号称「情人道」的座位中探索情欲的极限（D'Emilio & Freedman 196-197）。

以上这些以情欲为主要焦点的空间硬体及活动形式同时在世纪之交出现、普及、和扩张，不但标记了情欲的可见度和强度大幅提升，

凸显了情欲生产力的迅速扩张，同时也显示身体情欲协商模式的重大转变，逐步超越原本由父母和宗教道德主导的交往范畴，代之以随着资本扩张而大幅提升的情欲强度与多样性。人口的流动聚集、因就业而延后的婚龄、情欲的扩张和平常化——这些变迁都在情欲生产关系中引进更多变数，创造了更多空间和资源，边缘情欲形式因而得到发展成熟的机会，使得不婚和同性恋在这个阶段首度成为个别女性在婚姻之外的人生选择（D'Emilio & Freedman 190-193），并且在纽约哈林区和格林威治村等少数特殊地点成功的形成明显可见的同性恋文化及社群，借着周遭情欲生产力创造的开放空气而自在发展（Faderman 67-92）。

当然，即使在这些边缘的情欲社群中，情欲生产力的跃升就个别主体而言也有不同的意义和实践空间。具体来说，未婚的年轻就业人口虽然在经济上证明了自己有生产力，但是在操作这种经济能力以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上仍然受到既存的性别、代间权力、阶级等因素限制（注 13）。例如，女性劳动者的个别阶级位置往往影响到她们情欲实践的能力，有些中产女性因为受过大学教育，就业机会比较好，经济能力比较独立，因此比较有本钱选择终身不婚或采取被称为「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s）的公开同性同居；无产阶级女性的同性情谊则多半以一人扮装为男人，来制造异性同居关系的形象，以避免人言（D'Emilio and Freedman 188-194）。另外，代间与阶级位置也在女性情欲空间上形成复杂的影响。劳动阶层女性的工资有限，而且仍被视为家庭整体收支的一部分，除了日常生活的必需之外，绝大部分工资要交给父母以贴补家用，这么一来，她们面对各种流行的消

费形态时所能使用的资源就很有限。在这种欲望与实力的大幅差距状态之下，以性作为某种交换，蔚为风气（注 14），劳动阶级的女性可以主动以当时流行的、但是与妓女大为不同的「甜头女郎」（*charity girls*）的方式，用不同程度（除性交之外）的身体开放，来换取男人招待她们享受新兴的休闲娱乐，但是也因此在其中开辟出比中产女人更大的情欲探索机会（D'Emilio & Freedman 198-200；Peiss 134）。

II

情欲生产力的大幅扩张一旦形成以上所显示的可见度，并向情欲生产关系的疆界和底线挺进，就难免引起另一些社会力的骚动。1860、70年代已经开始对情欲生产力逐步增长的强烈关切，首要表现为由一些性主流妇女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社会卫生运动」（*social hygiene movement*）与「纯净运动」（*purity crusades*）就在此动荡时刻合流，希冀透过宣扬文明的道德观来教导维多利亚式的自制，并消除性病及其传染媒介——妓女（Seidman, *Romantic* 72），以维系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稳定；她们也呼吁政府消灭红灯区，并用透过婚前验血、性病病例强制报告等等措施来加强对性的管理（D'Emilio & Freedman 205）。这些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成功的把红灯区赶到性主流妇女视野之外，进入劳动阶级、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区域，因而大量增加了劳动妇女（即使短暂）卖淫的机会，更为后来进一步扩大扫黄提供了正当理由（Peiss 132-134）。

值得注意的是，当阶级意识在这种张力中凸显时，「性」也开始逐渐成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注 15）。换句话说，不但阶级可以透

过性来反映其在社会资源和权力上的差异（某个阶层的人才可以得到或享受某种性），同时，性本身也渐次成为构筑阶级的文化范畴（表达或拥有某种性才算是某阶级的成员）（Haag 165）。因此研究者注意到，20 世纪初新兴中产阶级女性定义自我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各种行动和论述来显示自己的情欲是道德自制的，与当时普遍可见的妓女或淘金女郎商业化了的情欲截然有别。即使在进行与传统有别的情欲探险时，中产阶级女性也强调自己是有意识的「自主情欲」，而不是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心智不成熟，晕头转向，无法掌控自己的性，更不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物质能力太弱，以致于拜金虚荣，只能盲目顺从情欲市场的逻辑（Haag 165）。中产阶级对自我情欲的这种定位与期许，一方面推动了各种健康卫生或净化的改革运动成功的操控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常常表达为对基层女性施恩式的保护心态，反而形成对基层女性主体的另一种管制与阶级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见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在世纪之交形成的拉锯战，而正是这种拉锯战在性文化中形成了意义和实践的移位及转化，才使得我们注意到性革命的征兆。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扩展固然推动了休闲与情欲的结合，提升了情欲的生产力，而随着消费生活形态的扩散，新兴的消费道德也继续鼓励充分享受愉悦，追求自我满足——包括在情欲方面的享受和满足（D'Emilio & Freedman 234）；但是，同时在这种突破各种原有权力和欲望疆界的氛围中，情欲生产关系也因为与其他权力关系以及整体文化生产关系的共生而必须采取一些维系本身稳定的努力，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中产道德净化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这种稳定局势的努力，世纪之交的进步社会运动也发动了新的性政治，不但为（已婚）女人争取节育的权利，也在无意中间接的为未来发展并推广更普及、更方便的避孕措施准备比较有利的环境。随着都会的形成以及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流动，美国政府原本在 1873 年设立「Comstock 反色情法」，严厉禁止避孕资讯和工具的公开販售或宣传，拒绝让女人的身体和人生脱离生养重担的阴影，世纪之交的社会运动因此把这方面的解放视为重要目标。1910 年代前后的基进运动份子（特别是艾玛·勾幔 Emma Goldman 与维多利亚·伍德尔 Victoria Woodhull）、劳工运动领袖（如尤金·戴普斯 Eugene Debs）、进步记者（如约翰·瑞德 John Reed）等，都相信社会解放必然包含身体情欲的解放，因此大力鼓吹「自由恋爱」（free love）（这里的恋爱事实上指的是性），积极反对制度性传统婚姻的相互责任制及生殖目标，并主张建立以热烈恋情为基础的新关系模式，企图在被视为个人实验的情欲活动中创造社会运动集体努力的目标（Bullough 101）。勾幔并且首度为当时还被视为非法的各种节育避孕措施提供「女权」的理论解释，认为节育是女性身体自主的具体运动路线之一，女人（特别是劳动阶级的女人）应透过节育来拒绝强制式的母性母职，这不但可以为女人创造自我生命的实现空间（注 16），更可以因女人集体的抗拒而形成对资本家的压力（注 17）（Grant 40; D'Emilio & Freedman 232; Segal 82）。就个别的女人而言，这个非常基进的左派运动路线为女人的情欲处境提供了一个新的复杂立场，因为在节育不普及的年代，怀孕的高机率可以被女人用来当理由挡掉不想进行的性事，但是它同时也为想要开

展人生的女人创造无比的焦虑和可能不想要的后果；而左派运动在此时把节育重新定义为女性自主，一方面拿走了女人推阻性事的方便理由（怕怀孕），迫使女人不再用这种说法继续强化性和怀孕之间看似自然必然的连结，且转而在拥抱情欲及抵抗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寻求新的抗拒论述；另一方面，节育也降低了女人参与情欲活动的代价，享受情欲不再必然有生养的重担，女人仍可以投身创造其他的人生出路。

以世纪之交的历史眼界，这个抗拒母职、身体自主的说法是非常进步的。可是后来最积极推动节育运动的人，像玛格丽特·桑儿（Margaret Sanger）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玛俐·史透普斯（Marie Stopes），都在各自的交游圈中受到当时中产阶级背景的优生运动（eugenics）所影响，她们冒着牢狱之灾，热诚的推动节育的理念和实践，基本信念则在于减少下层贫穷或「低等种族」的人口，以便让社会更进步（Asbell 9; Grant 43; D'Emnilio & Freedman 245），同时为了避免背负鼓吹性开放的恶名，她们也坚决反对教导未婚女性避孕（Grant 41）。结果，在不动摇种族、阶级、婚姻地位的立场上，优生的信念逐步赢得了医学人士的支持。透过医学论述建立的正当性，节育运动得以在大西洋两岸开展，主要的对象则是下层阶级的已婚女性。这些努力虽然促使节育得到正当化的地位，间接缓和了一般民众对性的顾虑与负面印象，但是节育的基进解放内涵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优生考量所取代（注 18）。

当剧烈的社会变迁引发舆论强烈关切社会秩序的变动时，有关「性」的论述往往成为道德及社会变迁的一个象征指标，也因而成为各方争战的场域，更成为阶级张力充分展现其操作的替代场域

(Weeks74)。毕竟，情欲上的越轨行为并不只是女人们各自生活上的秘密而已，情欲论述也不只是另类的意见而已；事实上，世纪之交的情欲消费空间、活动以及论述一旦形成高度的可见度，很快就引发社会关切，并因而激化各种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辩论，更加提高性革命的分贝。世纪之交，除了前面提过的社会纯净运动和进步社会运动之外，来自美国第一波本土性学先驱者的专业论述也在此刻浮现（注19），其动力和正当性则来自社会纯净运动对性病、青少年、及女性情欲的忧心（Bullough 304-308; Weeks 75）。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性学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身体政治学：它以专家的、学术的、医学的论述，来重新定义并经营身体的规范、道德的重整、甚至优生的考量。

即便如此，性学研究从欧洲发源开始就带着另一些相对于当时主流文化脉络而言颇有进步意味的内涵，因而也有助于性论述与性意识的革命。性学研究者对科学抱持的无上信念不但表达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更呈现为他们对性的自然法则的追寻（Bullough 3-6; Hekma 187; Weeks 62-72），而这种把性当成自然天性的研究态度和语言，有效的挑战了原本由道德谴责来主导的传统性论述，也首度提供机会让诸多性模式浮现。欧洲的性学研究先驱（如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Havelock Eill, Magnus Hirschfeld 等人）都竭力以客观的语言来描述性的各种面貌及形态（由性变态到同性恋到童年性欲到女性情欲等等），他们钜细靡遗的记载个案、分析特色、列举性质，终究则是希望在这些看似差异多样的性现象及性表现之下，发现其共有的性欲源头及自然法则，并追溯此源头在发展的过程中因着哪些个

人的、意外的、环境的因素而形成此刻众多差异的面貌。性学研究者于是以性百科全书的模式来记载描述并进行他们对性的分析；取样的完备多样及描述的准确详尽是他们的目标，理性的了解和冷静的研判是他们希望投射的形象。在这方面，性学研究都展现了典型的现代化趋势及色彩，研究者自我期许客观中立，以科学为指标来理解并掌握性的各种变型，在知识的领域中努力发现有关性的「真理」以奠定性学发展的基础。在那个还颇为宗教禁欲、道德保守的社会环境中，性学赖以自诩的理性研究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

性学论述对性实践和性主体的列举描述固然将各种性主体类型化、定型化，促成了后者被抹黑丑化，但是性学论述却也同时生产出可以被转化挪用的语言和思考（Bullough 318; Faderman 91-92; Weeks 76-79）。至少，性学研究的科学语言在某一定程度上正当化了性的社会呈现以及一般人（特别是女人和青少年）对性的高度兴趣，因此间接支撑了情欲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从性学研究的角度显示了当时情欲生产关系规范之不当（注 20）。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舶来的性论述，例如，英国的哈夫洛克·艾利斯（Hacelock Eillis）的著作在英国被禁，因此转而在 1897 到 1910 年间连续在美国出版了六册《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虽然他的理论仍然假设了男女在情欲表现上的本质差异、性爱灵肉之不可分、以及一夫一妻制度的优越性（但除去了排他的贞操观），可是艾利斯同时也对 19 世纪以来的保守情欲传统大加批判，平反了手淫、女性情欲、同性恋等等积极表现情欲的方式，把非婚姻生殖导向的性，从过去那种病态罪恶的说法，转化为无法自抑、「不可避免的发展」（Robinson

13)，具体的试图在以婚姻和生殖角度来思考情欲的传统中投下变数。另一个对美国情欲生产力有重大影响的性学研究者就是 1909 年首度访美的佛洛伊德，他有关幼儿性欲、家庭罗曼史，以及性压抑会导致精神官能症、性本能强大而时时流动等等说法，透过诸多知识份子的普及引介而深入人心，促使性逐渐被视为一个不能不面对、不能太压抑的能量，把性更加自然化、正当化，也把人类的文明（以婚姻、异性恋、保守性道德等为代表）显为外加之恶（D'Emilio & Freedman 223）。世纪之交的这些性学研究论述都对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但是深刻的影响。

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欲望生产的扩张运作、情欲空间和活动的多样化、基进社会运动的眼界异象、中产阶级的认同及其性操作、性学研究的启蒙理想——这些因素各有其运作的方式和领域。各有其推动的方向和速率，彼此之间甚至有着重重因果渗透关系，但是它们的历史际会在快速增长的情欲生产力和摇摇欲坠的情欲生产关系之间形成复杂张力。这个张力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末期的历史沉淀，可以在 1920 年代风行美国的各种婚姻手册中找到迹象。在这些婚姻手册中，虽然贞洁仍然是个不言而喻的镇山石，而性基本上还是被要求在婚姻之内进行，但是从《婚姻之爱》到《理想婚姻》（注 21），当时走红的婚姻手册的书名就描绘出婚姻性质的转变：情感和性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性爱的满足被视为是夫妻二人都需要努力的目标（D'Emilio & Freedman 265; Seidman, *Romantic* 77-81）。而当婚姻的品质（特别是性爱的品质）被凸显，被视为夫妻双方的责任时，这也暗示婚姻的问题是可以由个人的努力来解决

的——只要有「专家的指导，如：正确的性知识，适当的技巧，和正确的态度」(Seidman, *Romantic* 76)。这种对婚姻和性爱关系的改良式看法，显示情欲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因此一夫一妻婚姻体制也必须为此前澎湃的性革命提出一个折衷的调和，把性更深刻的嵌入婚姻关系，以间接对蓬勃的情欲生产力加以包裹控制（注 22）。同时，这个关注也种下后来美国社会对「正确性知识」的渴求，强化了性学论述和专家在情欲领域中的知识权力运作。

III

经历世纪之交的性革命之后，1930、40 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或许带来了生活的困苦和不安，挑战了情欲活动的动力和物质基础（注 23），因而挫折了情欲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个物质缺乏、生存不易的时刻却也使得切断性与生育之间的连结成为愈来愈迫切的需求，并加速各种节育措施由中产阶级向下层的扩张（D'Emilio & Freedman 247）。相较于情欲文化其他方面在这段期间的紧缩，避孕研究以及原来已卓有成果的性学论述这两方面的耕耘反而在此需求中有了长足的进展，也为 1960 年代蓬勃上路的性革命准备了具有正当性的论述和实践，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避孕研究方面，医学发展史上一向充斥着因为惧怕「不道德」的标签而放弃或避免的性研究（Bullough 135）。1930 年代内分泌医学首度成功的分离出男性和女性荷尔蒙之时，原本也只是想对（男性的）生殖功能和循环有更深入的认识（注 24）。希冀透过操作荷尔蒙的分泌来创造或终止衰老的过程（Bullough 125-126），至于要进

一步获得正当性来进行所谓「干预自然」的节育研究，这还需要另外一些强大的理由。好在，1920年代性革命之后新婚姻手册的风行，不但反映了性爱在婚姻中的意义和地位已有了重大的转变，同时也具体呈现了许多人不便明说的担忧——那就是，传统的婚姻日渐衰颓，而其最主要的原因被认为是夫妻因担忧怀孕而在性爱生活上踌躇不前（Bullough 137）。一旦大家愿意相信性爱是婚姻关系中需要不带后顾之忧进行的热情活动，那么和性爱相关的资讯及商品就成为迫切需要普及的基本装备了。这个和改善婚姻关系相连的考量使得从1930年代开始，不但许多药厂对相关避孕的研究大有兴趣，连医学界也因为避孕和婚姻幸福连结得到了正当性因而投入研究。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从19世纪起就以淫秽为理由阻碍节育研究讨论及资讯流通的Comstock法案终于在1936年废除，积极推广节育避孕的「计画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于1942年成立，正式标记了节育从进步运动的女性身体自主理念，转为巩固家庭结构、提升家庭品质的政策性措施（D'Emilio & Freedman 248），但是也在此中留下了改变性意识的种子和建制，为1970年代堕胎合法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发展据点（D'Emilio & Freedman 335），这是后话。

值得提醒的是，1930、40年代不管是婚姻性爱或避孕节育，甚至婚外婚前的各种性实践，都已经是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所沈淀的性意识中被理解、被认知、被欲望；换句话说，前一段时期情欲生产力在性活动、性论述、性道德方面的热烈发展或许在此刻速度减缓沈潜，但是它们已经留下了新的情欲地平线，新的思考和经验起点，甚至构筑了新的情欲运作基础。毕竟，艾利斯和佛洛伊德性理论的通俗引

介，透过对婚姻性质的新要求，已经深深的种下了性的正面意义与必要性，求偶消费文化的积极变迁则逐步正当化了许多新的性活动，这些都重新刻划了性的文化想像与呈现，将在下个阶段重大的人口迁徙集结中带动新的情欲生产力。

以1940年代一个重要的例子为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涉入，深刻的影响了原本以异性恋婚姻为主的情欲发展。大批年轻美国男人离开原有的异性恋人生轨道，进入男性集结的军中，后方的女人则首度有机会穿上传统认为非女性的服装——长裤（Faderman 125），离开她们受限于异性恋婚姻家庭的小世界，大量进入几乎全女性的国防工厂和军事单位工作，同性情谊于是在这两个纯粹性别的有利场域中苏醒茁壮，并在战后解散军队时继续在诸大城市集结发展成为同性恋的新社群（Faderman 120-130）。但是，这一波的同性集结和世纪之交的同性情谊发展有一个根本的差异：世纪初性学论述对性的凸显以及对同性恋的友善描绘，加上1920、30年代围绕着像《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之类通俗同性恋小说的猥亵官司和知名度，使得1940甚至1950年代对同性情谊的期望、想像和实践都带着身体和性的全部欲望和动力；前一个世代逐步发展的性意识、性实践和性态度，也在此时达到了新的成熟高度和多样性，这些历史条件的汇集遂促使当时的情欲生产力开出灿烂的同性恋花朵来。

另一方面，如果说世纪之交的性学研究使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被视为人生重要的动力，那么1940、50年代的性学研究在战后的新性别氛围中就更进一步展现了性欲的多样呈现，自然化了性的诸多表现及满足形式。特别是印地安邦大学的金赛（Alfred Kinsey）接

连出版有关男性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84) 和女性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 性行为的研究报告, 将性充分带进大众的眼帘。这些研究的庞大数据、广泛取样、及绵密的访谈, 有力的聚焦于美国人的性习惯和性价值观, 具体的显示有一个极其广大多样而隐密的情欲世界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 和一般道德规范所教导的单一贫瘠模式截然不同, 而所有的性实践和性口味, 不管多么边缘, 在金赛的分类系统中都不过是性光谱上具有些许程度差异的表现方式而已 (Bullough 172-177; D'Emilio & Freedman 268-270; Robinson 66-81)。金赛的性研究所投射的科学形象和数据的说服力, 成功的扣紧了当时实证科学在通俗媒体中日渐升高的可信度, 不但吸引一般媒体广泛引用, 也提供了大量范例素材给寻求耸动题目的通俗作家及专栏作家自行转化运用, 因而更加普及金赛研究的结论, 形成主导美国性讨论的权威论述。

金赛性学报告对美国情欲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毕竟, 当性理想与性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差异铺陈眼前时, 群众过去对私己独特性事上的焦虑得到了纾解; 当众人各自的性差异观点和性实践以具体数据和细致描绘方式呈现时, 原本单薄的情欲资源世界突然有了丰盛的想像和学习空间; 而当性学研究成功的结合了实证研究努力建立的强大说服力时, 性的公共讨论和呈现也同时赢得了正当性。更可贵的是, 金赛的性多元理念是在冷战的 1950 年代麦卡锡白色恐怖对性异议份子的沉重打压之下浮现 (注 25); 尽管带着有限的历史眼界, 金赛对性差异的包容尊重态度在当时保守的政治气氛中却仍然奋力创造了新的友善环境。例如, 当性习惯和性价值观被性学研究显为

多样而差异时，当性被认为不再仅仅是异性恋插入式性交时，一向控制性的文化呈现的司法官，再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来衡量性的公开消费。因此，由 1957 到 1967 年间，以华伦大法官为首的美国司法系统对色情表达出极大的宽容态度 (D'Emilio & Freedman 287)，使得情欲言论自由得到司法制度的包容，性的商品迅速嗅出开发市场广泛需求的机会 (Ehrenreich et. al. 105)，一向被打压在地下流传的色情书籍、杂志、图片及其他商品终于得以搬上抬面，为情欲生产力的多样发展提供最具象的呈现。

毕竟，性学论述或许在学术和理性的层次上提供了思考框架，但是对于普通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言，还是要靠通俗出版品以持续的、多采多姿的方式把性自然化于日常生活的消费和活动中。在这方面，出版业在 1939 年推动的「平装书革命」首度使书籍得以廉价方便的在处处皆有的杂货店、报摊、及其他零售据点贩售，1940 年代的出版商于是顺势推出各种耸动的小本情欲小说、扑克牌、照片、甚至色情内容的唱片 (D'Emilio & Freedman 280)，这些小本经营的性文化事业为当时不太丰富的情欲资源提供了最平民化的消费。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1953 年海夫纳 (Hugh Hefner) 创立中产品味的《花花公子》月刊 (Playboy)，接着推动各种和情欲相关的休闲企业，不但以最绚烂的方式展示女体，更同时推动男性观点的性自由哲学，鼓吹自我沈醉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带动了整个一代男性的自我幻想形象 (D'Emilio & Freedman 302-303)。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花花公子》的出现并非如某些教条女性主义者所言，仅仅是父权恣意展露自身的丑陋面目，而其实主要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已

逐渐进入消费导向的经济，需要把占人口一半的男性营造成为新的消费主体而非汲汲工作的生产主体而已，因此鼓励男性背叛传统中以养家为人生成就的男性形象，多在消费活动中实现自我。在这个理解框架内，女性身体的暴露呈现，与其说是提供给男性发泄享用，倒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进步意义，可以用来松动拆解「男养家」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更重要的则是保障男性认同与异性恋的不可分（注 26）（Ehrenreich 51）。这个解读在性别的轴线之上又加了经济模式和异性恋两条轴线的考量，对情欲现象提出了较为丰富的理解。不管如何，《花花公子》深刻改变了女体的呈现，改变了情欲的形象，它以最有中产品味的口味形式来包装呈现过去在道德规范下被当成最低俗的情欲和身体活动，具体呈现了——也正当化了——新的、性的市场品味。

也正是因为像《花花公子》之类的男性色情产品以明显的男性本位观点自然化了性的开放，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在评估这段历史时常常认为性革命其实只是男性的「性市场革命」而已（如 Jeffrey 91-94）。不过，这个简单的评估有点问题，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指出，性自由并不是什么崭新出现在男性生活里的东西，一般而言，男性一向就享受比较大的情欲空间：「事实上，如果有哪个性别曾经经历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大转变，值得被称为革命的，那应该是女性，根本不是男性」（Ehrenreich et. al. 2）。

IV

世纪之交的性革命已经为女性情欲主体创造了个别实践和探索的

具体空间，1930 到 50 年代一连串论述、研究、以及通俗文化在性领域之内的累积则为性的享受创造了正当性；时至 1960 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解放运动将被压抑的、禁忌的话题更广泛的带人文化领域，年轻一代借着不受羁束的身体性爱做为抗拒成人建制的政治表态方式（Grant 13），资本主义的情欲生产则在文化论述方面达到另一个高度，这股强大挑战既有性道德的动力使得新的情欲主体的生产进入集体的、全面的发展，形成第二波的性革命。带头冲刺的，仍然是女性。

首先，景气的 1960 年代资本主义在文化消费层面上的积极生产，使得跃跃欲试的女性得以在商品和新的生活方式中具体塑造女性情欲主体的身分与实践。最明确的征兆就是，1950 年代的女性杂志主要还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杂志，充满日常生活中的家事心得和经验，但是短短十年后，性变成了女性杂志的主要卖点。例如，原本是家庭杂志的《柯梦波丹》（*Cosmopolitan*）于 1963 年由以畅销书《性与单身女郎》（*Sex and the Single Girl*, 1962）著称的作者 Helen Gurley Brown 接手编辑（注 27），初期以职业妇女的生涯指南为主，但是很快就认识到读者群的性质已经在历史的过程中转变，新一代的年轻妇女经济上比较独立，自主的动机强，教育水准也已提高（注 28），《柯梦波丹》于是闻风转向，顺势把当时英国已经很发达的「浪荡单身女人」（the swinging London dolly-bird）概念，建构为新的美国版「柯梦女郎」（the Cosmo Girl），在杂志内容方面则主要是为单身女郎提供情欲和身体消费上的指南，并且明确的以图像和文字来表达女人拥有新的性自由。杂志推出之后大受欢迎，有些历史家甚至认为，《柯梦波丹》最大的贡献就是使得女人的性显为自然而可敬（Grant 98-123），

这在普遍相信「性属于男人」的美国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也带动了后来其他如 *Ladies' Home Journal* 以及 *Redbook* 等传统通俗女性杂志在竞争的压力下对性生活话题的开垦。

除了通俗杂志的女「性」化之外，充分反映 1960 年代女性观点的性学论述也在此时深刻的影响了一整代女人对身体、对性的观点与实践。其中最有名的研究论述要算是马斯特与琼生 (William Masters & Virginia Johnson) 的 *Human Sexual Response* (1966) 以及 *Human Sexual Inadequacy* (1970)。这些研究虽如其批评者所言，受限于中产智识阶级受访者的性经验和偏好口味，只反映了那个阶层的成年受访者在性事上的特有表现，把高潮当成性愉悦的唯一尺度，甚至在统计时刻意排除了所谓偏差的情欲模式 (Robinson 134-140)；但是马斯特与琼生的研究首度正面肯定了人类可以主动透过自慰来达成情欲上的自给自足，他们对性高潮模式的分析还显示，女性在性上面的能力与需求和男性无分轩轻，甚至远超男性。更令人惊讶的是，女人甚至不需要男人，因为她们透过阴核可以自行达到的性欢愉比异性恋性交更为强烈。性不再仅仅是主动男性宰制被动女性的场域，而有可能是「对女人的力量和独立的肯定」(Ehrenreich et. al. 69)。

身体是力量和愉悦的来源，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也是全新的女性情欲实践。马斯特与琼生具有实证基础的研究结论帮助了女人肯定她们的性欲需求和探索，也使得女人对性采取比较正面的态度，这对情欲生产力的阔步前进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不过，当马斯特与琼生在肯定女人的性的同时，不但热情的把婚姻视为性的主要场域，也强调女人在性上面的「困扰」应该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性治疗门诊）

而不要在彼此的倾诉叙述中「加重病情」；这么一来，性的理解和诠释最终还是被保留在医学专业权威的手中（Irvine 142）。好在 1960 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的集体自我成长风气使得女人有机会在「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的小组活动中操练自我描述的论述生产，更在交心的叙述中沉淀捕捉自身的经验感受（注 29），故而到 1976 年海蒂（Shere Hite）开始出版她的性学报告时，女人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语言和观察，可以用最肯定的语调和最具体的说明，来对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在她们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枯竭提出最沈重的抗议。

另一个对新的女性情欲主体有利的发展是，在 1960 年代性革命之前，所有的性论述几乎都掌握在医学专家手中，即使是多所鼓励开放的婚姻手册也是由医学专家撰写；但是从这个历史时刻开始，有愈来愈多的通俗论述出现，突破性医学的论述垄断，而且是以教战手册的方式教导女性读者如何主动进行性事以达到最满意的性生活（Ehrenreich et. al 81）。其中最着名的例子就是 Terry Garrity（笔名是 J）1969 年出版的《性感的女人》（*The Sensuous Woman*），作者以自助手册的方式实际教导女人如何做充满情欲、不畏身体享受的女人、如何做好性伴侣、如何展现性魅力、甚至如何口交等等。另外，波士顿女性主义成长团体集体撰写的医药保健及性手册 *Our Bodies, Our Selves*（1971）也首度开创由女人经验出发的身体论述，极力推广女人的自主选择 and 性爱自由，甚至远超异性恋和婚姻规范（Seidman, *Embattled* 46; Snitow et. al. 27）。这些自发的论述都以开朗肯定的语言来谈女人和性之间的正面关系，并明确的、按部就班的教导女人如何发现身体，如何自我营造快感，如何累积女性情欲的文化经验，因

而大大的提升了女人涉足情欲的正当性。同时，这类建基于主体经验的性论述也将性呈现为无数可供个人选择挪用的具体活动形式，其中包括像从 1970 年代开始流行的口交 (Ehrenreich et. al. 82-87; Grant 120-123)，因而使得各种过去并不普及的性活动在交流学习中逐步扩散 (注 30)。更重要的是，当性不再是什么神奇神秘的身心交融，而被视为是需要经验和练习的「协商」过程时，女人也被赋予更大的空间来掌控这个活动 (Ehrenreich et. al. 90)，因而有机会积极塑造情欲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创造女性读者以支撑这些情欲读物的当然是美国的生产体制。由于经济形态变迁，此刻的女性人力需求已由蓝领劳工转向粉领的秘书文员 (Ehrenreich et.al. 54)，因就业机会增加而出现的单身粉领阶级拥有更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消费形态，因而回过头来也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提供了发展创意的动力。于是 1960 年代大量出现的单身酒吧、休闲设施、交友中心、各种消费阅读杂志等等商业发展，不但为新的单身生活方式提供休闲和社交的硬体软体，也在这些消费活动中逐步塑造新的单身身分认同，为女人提供在婚姻之外另一可敬的人生选择 (Ehrenreich et. al. 60)。而且，为了更加巩固这种生活方式的运作，建筑业在此时为年轻单身人口的需要设计出专属的公寓社区，好让她们独立生活甚至开派对，而无虞影响父母、邻居或其他老一倍的人口 (D'Emilio & Freedman 304)，这种独立于父母的居住环境当然也有利于自主性高的亲密关系，单单在 1960 到 70 年之间，不婚同居的人口就增加十倍 (Seidmlan, *Embattled* 39)。这种性生活的安排方式并不是此时才有，但是它们过去

在通俗论述中往往被呈现为少数的、可耻的、会有不好下场的；然而此刻在大众媒体中却被呈现为新潮的、洒脱的、令人欣羡的，连硬体空间的安排设计也更方便这种身体关系的运作。也因为如此，新的、与情欲相关的、以消费为主的单身文化很快就扩散到广大的中产阶级，成为 1960 年代以后流行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活跃自在的性生活当然假设了可靠方便的避孕措施存在，1960 年开始量产贩卖的口服避孕药早已带着应许降临（注 31）。不过，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很谨慎的强调，口服避孕药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忧心的那样有力量「创造」性革命；事实上，它只不过合理化（或者说「方便化」）了已经在蓬勃进行中的性革命而已（Ehrenreich et.al. 41）。况且，即使酝酿于优生运动者的理念，成形于充满种族及阶级考量的人体实验，并且还带着各种当时尚未发现的副作用，口服避孕药却具体标志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情欲和人生选择的轻松掌握，彻底的重绘了性别、经济上的角色分野。当然，身体情欲上的自主自由并不表示女人就万事如意，但是，就像后来 1993 年「家庭计画组织」的执行长谈到口服避孕药时所言：「拥有选择的权力不等于快乐幸福，但是它至少逼迫女人成长；拥有选择的权力也不表示人生就一帆风顺了，但是它至少使得女人有力量去计画她的人生。」（Grant 56）。

事实上，性革命昂扬的气势也并不依赖口服避孕药，因为，即使 1960 年代末期揭露了避孕药丸可能的副作用之后，女性也并未因此挫折而放弃性革命；相反的，在西蒙波娃的情欲自主论引导之下，她们转而以堕胎合法化为主要运动目标，更积极的努力突破情欲生产关系

的局限 (Ehrenreich et. al 62; Snitow et. al. 18)，因此才促成了美国最高法院在 1973 年作成历史性的判决，使堕胎合法化，为女人提供另一个自由操控身体的机会。

1960 年代情欲生产力最爆炸性的开发，显然并不仅仅在于开拓各种性观念与性实践，也不止于开发新的女性情欲主体；事实上，性革命最令父母师长卫道人士忧心的，是它也把情欲动力赋予了另一个从未在公共论述中与情欲沾上边的人口群——战后富裕年代中首度有经济能力享受休闲的青少年 (D'Emilio & Freedman 353)。

各种情欲消费与休闲设施原本就不排斥青少年新获得的的经济消费能力，当时女性主义在思考身体情欲自主权时也非常远见的把青少年的堕胎权包含在内 (Thompson 296)，这些历史条件的际会部或多或少自然化了青少年的情欲发展。另外，在这个年龄层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欲中介，那就是此时开始热烈普及的摇滚乐，它提供了情欲流动的具体节奏和震耳欲聋的节奏音乐，彻底悬置了成人文化对身体的形塑，动摇了主体已经内化的清晰自我控制，使个体暂时放纵于充满狂野含意的节奏中。此刻配搭的舞蹈也不再是中产白种成人圆滑优雅的摆动，而是从贫民区黑人舞蹈中学来的抽搐震荡式的抖动，不但抖腿、抖臀、连头部都在激烈的甩动中制造晕眩的感觉，快速的节奏和巨大的音响帮助青少年用纯粹的身体来体验并刻划世界 (Fiske 50-51)。这种摆脱文化对身体心灵之铭刻的尝试，也在当时流行的迷幻药或大麻吸食中得到具体的出路。摇滚乐、迷幻药、和自在的性活动相连，形成年轻人口群全面拒斥既有社会文化的标志。

同时，伴随着摇滚乐诞生的巨星偶像也为新的性别形象和性对象

开创范例。相对于二次大战后美国男性的平头短发阳刚趋势，摇滚乐的长发和紧身裤传达了中性（双性）时代的来临（Ehrenreich et. al. 32），也严重的挑战了传统的去性（de-sexed）青少年形象。另外，与经济成长齐头并进普反的电视媒体更将摇滚乐的具象（摇摆的身体、新潮的穿着、扭曲的身体、情欲的暗示等等）以最明确的方式普及呈现在新一代的青少年眼前，便于他们模仿学习并正当化自己的作为。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向被视为柔弱无欲的青少年们在此刻首度形成的偶像文化中成群的尖叫、昏倒、推挤、追跑，以最具体放纵失控的形式来表现她们的情欲感受。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女性性革命「最戏剧性的起义」（Ehrenreich et. al. 11）。很明显的，这种彻底的放弃自持是对性压抑的一种强烈抗拒，也使得新一代的女性主体及早开始探索宽广的心理情绪幅度和自在情欲的表达。

新情欲主体的大量浮现显示性革命的能量生产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性别的、代间的、道德的、身体的、生活方式的）既有文化规范的激烈挑战创造了 1960 年代特有的动荡印象，也把当时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紧张的关系用最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日渐普及具象的影视媒体中，更加强化了性革命的迹象。

V

1960年代情欲解放的倾向显然是在大氛围中得到商品文化的全力推波助澜，然而它最主要的成就却是在社会运动的反对文化中找到了突破情欲生产关系以及性别体制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塑造情欲的其他社会轴线。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社会中各种冲突矛盾的

力量和权力轴线总是积极的在情欲战场上角力的。

事实上，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自主理念就是从 19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左派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它最深刻的体认和反省。那些激进社会运动中本来就有大批女性成员在运动过程中累积组织经验，性革命的风潮松动了激进运动的情欲表达，但是也明确的凸显了性爱关系在种族和性别轴线上的不平等（Echols 29-32）。1960 年代中期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目标在改革牛步慢进和领袖人物（如 Martin Luther King, Jr. 及 Malcolm X）连连遭到暗杀的阴影中，由起初的「族群同化」激化为「黑权」，拥有众多白人成员的左派运动则相应的在这种种族关系激化的情况中把主要的注意力从民权移至反战和反征兵上以避免尴尬。在以男性议题为主的运动趋势之下，（白种）女性成员在运动中的位置更为边缘，但是男性成员对她们身体的要求则并未稍减（Echols 37-38）。1967 年激进女性成员在进步运动的年会中正式提出了性别不平等的控诉，凸显了「妇女问题」（The Woman Question）的浮现，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1968 年，妇女解放升高为女性成员的首要关怀，各个草根的妇解组织在各大城市成立，不但积极找寻自己的理论出路，也在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特有的说法和理念（注 32）。这个分裂的举动显示，除了在性别歧视方面的体认外，女性成员也在最素朴的身体经验中意识到，蓬勃开展的情欲生产力极可能有其性别的内涵假设，女性需要突破这种性别盲点，挑战既有的性别关系，开拓新的思考空间，才能将性革命改造成女「性」的革命。女人和性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形成妇女解放运动下一阶段的新争议焦点。

除了情欲的性别轴线之外，激进社会运动在 1960 年代所创造出来的开放空间中也为性偏好这条轴线提供了浮出的机会，并为边缘情欲人口的壮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撑。早期成立的同性恋联谊组织逐渐发现自己的温吞气质愈来愈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新一代的年轻同性恋教育程度比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Faderman 197），她们由其他的运动团体中学会了更加活跃的主动出击策略和经验，更透过其他弱势群体的抗争语言来理解自己和少数民族一样受到主流社会压迫，因而发展出带着强大正当性的强悍气势；她们追求的不再是仅仅被接受被包容，而更是彻底的平权和完整的人权。事实上，著名的 1969 年石墙暴动事件之所以能快速凝聚同性恋群众，形成 1970 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全面出发的契机，正是因为它已经从那个时代各种进步运动所累积的动员策略相抗争经验中得到了不可或缺的滋养（Faderman 193-196）。在另一方面，嬉皮运动中对于传统性爱、衣着、道德、生活方式等的挑战，则为同性恋的自我呈现提供了灵感和掩护，使得整个一代的同性恋得以在比较丰富自由的文化资源中开发自我的形象（Faderman 203）。这种揉合了抗争和自我壮大的运动经验深刻塑造了后来像「女同志国度」（Lesbian Nation）和「酷儿运动」（Queer Movement）之类的运动形式（注 33），也在开发新的情欲论述和思考上打开了视野。1960、70 年代的解放运动甚至提供了自主抗争的气势以及人权至上的论述武器来滋养被污名化的性边缘人口的解放运动，1970 年代中期美国的娼妓便开始推动伸张妓权的组织，以最肯定自我的强悍姿态挑战性主流霸权（参看 Jenness）。

情欲生产力在 60 年代的长足进展，随着进步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

结构的挑战而不断的冲撞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但是性别、种族、性偏好、阶级等因素却也在情欲生产力的发展中显现为各种相关议题上的矛盾冲突立场，而当这些立场的对峙遭遇到比较紧缩的历史条件时，就难免形成对情欲生产力的严厉质疑。毕竟，女性主义者退出男性主导的进步运动自成组织时，并没有就此解决性别、性偏好、阶级、生活经验等轴线上的差异。

1970 年激进女同性恋团体 Radicalesbians 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女人认同女人」(woman-identified-woman) 的理念，觉得女人应以女人的利益和连结为首要目标，因此女性主义者不能再与敌人（男人）共枕，而应该只实践「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 的性，「大女同志主义」(lesbian chauvinism) 于是成功的以最纯粹的立场和最强势的语言成为女性主义的新火车头 (Faderman 212; Snitow et. al. 20)。在这个新的性别逻辑之下，对性别歧视的痛恨在「意识觉醒」的成长活动中形成义愤，个别女性成员由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叙述父权的阴影和伤害，借以鼓舞反抗的气势，巩固女性的主体性。可是，在既有的主流情欲文化资源中，女性主体的发言位置多半是受害者，情欲文化中所提供的是丰富的受害语言和意象，再加上「与敌人共枕」的可能批判，这使得意识觉醒团体中的经验分享经常只能用一种而且只能是受害者的叙事情节和情绪出现 (Snitow et. al. 20)。因此这些活动中对性侵害的一连串揭发和自觉，不但揭发了父权社会的丑陋面貌，也同时凸显了既有情欲文化在女性的情欲语言和愉悦经验上的贫瘠 (Grant 207-208; Tieffer 115-146)。

女性成长团体中逐渐浮现的愤怒和无力感透过「夺回黑夜」

(*Take Back the Night*) 之类的街头抗争运动而扩散，也部份的扣连了当时美国大环境中另一些际会的变化情势（注 34）。经济衰退的 1970 年代创造了美国人不安的心境：政治上，越南战争的失利和柬埔寨的失守动摇了美国一贯的世界强国地位；经济上，石油危机则暴露了美国富裕生活之下的薄弱基础（Seidman, *Embattled* 62-72）。在这种焦虑的环境中，新右派（New Right）等保守团体于 1974 年开始浮上台面，成功的动员媒体在论述中把这些不利的局势归罪于性解放以及其他进步运动带来的家庭解体和相应的国力衰颓（注 35）（Seidman, *Embattled* 82-89），「拥护家庭连线组织」（Pro-Family Coalition）随即在 1970 年代末期开始推动「家庭」的单一传统定义（Trudell 17），各种在此刻应运而生的民意调查于是顺着人心的踌躇和不安，重新刻划单身女性的孤寂空虚和性的危险，把怀旧的家庭意识形态发挥到最高点（Ehrenreich et. al. 171-179）。逐步成形的自我怀疑、退缩心态遂表现为对一切异己和变化都深具戒心，在这种氛围内，性革命所带来的进步空间首当其冲，1973 年才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在四年后就遭到国会通过进一步修法，裁撤医疗制度对堕胎的经费支援，也撤去了好不容易才夺来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经济基础，腐蚀了妇女运动奋斗多年的成果（Snitow et. al. 28）。更沈重的打击是 1978 年前后，原本已经通过的「性别平权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证实无法获得 38 州的认定支持，因而无法成为正式的宪法修正案，更加深了妇女运动的挫折感（注 36）。这种挫折无助的感觉在媒体和保守团体强大的论述攻势中很容易的就被征召到回归传统的阵营中，于是女性成长团体中沈痛控诉父权的能量不但没有被

引导去批判连保守派都已经看到的问题焦点——家庭结构及其养成的性别权力及性角色分工，反而被聚焦于情欲生产力中最令保守派非议的面向——色情。

1970年代初期，色情电影工业在开明的社会风气中蓬勃发展，逐渐脱离短片的形式而模仿主流电影的情节和制作，成为大量发行、普遍可见的成人级剧情长片（Williams 120）。它们在影像上的钜细靡遗和在文化中的高度普及使得色情轻易的成为争议的中心，不但引发保守份子的攻击，其所谓男性观点也引发某些女性主义者的强烈关注。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虽然经过了1960年代的努力，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一点都没有改善，仍然是全面遭受剥削压迫，在色情材料中就能清楚看到（注37），因此，要改变女人的处境，就要全面禁除色情。这种关切和保守人士出于道德或宗教理由的批判合流起来，反色情的运动因而在1980年代快速壮大，并给予保守份子机会转化使用女性主义色情批判的语言来呼吁全面禁止色情（Vance, "Negotiating" 37-38）。可是事实上，面对女性消费能力和情欲角色的变化，1970年代中叶已出现男性脱衣舞的场所，色情影片也已经开始调整脚步以诉求愈来愈活络的女性情欲主体（Ehrenreich et. al. 111-117）；即使许多色情影片仍然缠绕在虐与被虐的主题上，成人色情长片已经很明确的开始描绘以女性性主体为中心的剧情发展，而不再把女人只当成被用来满足男性欲望的性客体（Williams 176）。然而，对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而言，这些都只不过是父权更进一步收编女人、控制女人情欲的作为。换句话说，情欲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只不过是男性霸权的进一步扩张而已——因为情欲本身就是「男性权力的社会建构」（a social

construct of male power) (MacKinnon 128)。

同时，妇女运动之内也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出现反挫的现象（注 38）。1960 年代以来的性革命所带来的重大转变在短短一、二十年间还没有能够沉淀吸收，就遭遇美国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以及新右派无情的抹黑打击；性革命在个人生命和理论及实践方面也都还有许多极待细致处理的问题。比方说，大多数女人在长久调教的情绪和无意识中仍相信女人的力量有限而男人的暴力与权力无限，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和价值判断也继续认定家庭结构仍然是不可怀疑的社会关系，1981 年通过的「家庭保护法」(Family Protection Act) 更以控制政府经费补助来压制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性别教育或同性恋家庭组合 (D'Emilio & Freedman 349)，以致于在性别关系上越出常轨的个人（特别是女人）常常面对极大的困苦孤立，要不就只好选择回归家庭 (Willis, *No More* 125-127)。面对整体环境的紧缩和女性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抉择，从 1980 年代开始，在女性主义阵营中就有反挫的迹象，不少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公开抛弃原来对一夫一妻家庭体制及其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彻底批判，重新拥抱（此刻被媒体大量凸显而美化的）家庭和它一向所代表的温暖（注 39），认为家庭的某种有机完整性是深植在个人心中而无法动摇的；她们也放弃早先自由开放的性主张，转而认为女性主义不应该用太激进的理念得罪太多男人或女人，而应该拾回原来的传统性别分野和母性角色，并且认为比较有效的社会变革方式是用女人的特有温婉风格和气质去改变公领域中的真实政治 (Stacey 210-221)。

妇女运动之内对性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要求、

甚或从改变「性的部署」的努力中退却，以及妇女运动对外的强烈反色情立场，都一再缩小妇女解放的运动和论述空间，使得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深深觉得进步运动不能放弃情欲生产力所可能带来的自由和自主，也不能放弃对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体制的批判——特别是在雷根政权上台所代表的保守氛围内。于是 1982 年在 **Barnard College** 举办的 **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 学术会议点燃了女性主义的性辩论，凝聚了女性主义性激进派（**sex radicals**）多样多元的性观点（注 40），继续向女性所受到的传统情欲社会调教（**erotic socialization**）挑战。从 **S/M** 的性角色扮演、到女同性恋色情材料、到性对象的多元发展、到禁忌的性爱活动，性激进派的现身及论述生产使得这些边缘的情欲形式得以出线扩散，也为新的性主体创造集结和组织的动力（**Seidman, Embattled** 146）。

映着 1980 年代背景中逐渐加大的爱滋病阴影以及它对边缘和多元性主体的抹黑恐吓，性激进派在谨慎中继续性革命已经开创的情欲空间和选择，在爱滋的现实中重新思考性的实践与意义，更在爱滋所衍生的各种医疗和服务中强悍的对抗其中隐含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参考 **Patton**）。事实上，1980 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被迫愈来愈唱和保守的道德观，除了媒体中继续刻划性的虚幻和危险之外，在面对青少年的性探索时，国家机器也得到成人的充分授权而将性教育课程广泛的进驻校园，更加普及性的意识；可惜其中主要的语言仍是延迟加恐吓加危险，性革命中逐渐浮出的女性情欲仍然被压抑丑化（**Fine** 32-45）；性虽然已经成为大众常识中的基本思考面向，然而它也时刻遭受强大的监控。在这个时刻，也还只有那些边缘的、另类的情欲

运动主体（例如性基进派、同性恋、双性恋等）在公共论述的场域中继续转化资本主义情欲生产力的冲撞力，继续活络使用性革命的丰富遗产，拒绝让情欲生产关系紧缩空间，拒绝让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垄断情欲的合法园地。

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新右派所形成的社会紧缩心态互相搭配，或许不太有利于情欲生产力的大幅发展，但是新的边缘情欲主体仍然不停的在抗争中浮现，新的情欲争议也使得性的疆界和部署时时流动扩张，更重要的是，此刻的情欲地平线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日。回归婚姻和家庭的保守呼声虽然似乎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在进入婚姻之前绝大多数已经有了丰富的性经验和性资讯，性变成了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而且不断进行的活动，性经验使得女人有了更多能力来协商自己身体的主权，家庭的结构和组成实验着各种新的面貌，性别的角色和功能都有了新的定义，婚外情欲活动更是频繁而多样，生殖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性和生殖功能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通讯科技则使得性的资讯和人际连结方式更广泛的流传。从青少年到老年，情欲再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D'Emilion & Freedman 333-338）。

换句话说，196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的性革命或许在一般的论述中被划归为过时，被通俗的观点视为错误，更被保守派宣告死亡，然而性革命所创造的新世界却是此刻任何情欲实践和理念的新基点；情欲文化的任何进一步（或退一步）发展也都必须从这个基点和其所创造的权力布局和人生可能上开始协商。「令人深思的是，至少西方世界已经对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解放风气重新进行了不少评估。但是这个重新评估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尽管那个年代有其过度

放纵以及不容置疑的性别歧视，但是它所达成的进展是值得保存的」(Altman 105)。

回顾 1960 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女性主义者有着矛盾复杂的情绪。不过，就像妙丽·戴门 (Muriel Dimen) 说的：

性当然不是革命的唯一之路，但是它是塑造欲望的主要力量，而我们对欲望的限制往往直接导致了自我否定和社会虚伪。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欲望太多而是欲望太少；我们的无力反叛以及未完成的革命，都根植于性压抑对欲望的压迫，而正是这种性压迫截断了一切希望。1960 年代反对文化中那种呼求解放欲望的乌托邦狂想，现在在左派及女性主义者中间都不再流行了；我们好像已经应该长大了，不应该再眼睛大，肚皮小了。可是这种时髦的「成熟」恐怕根本没认清欲望的本质，那就是：不管欲望多么痛苦，不管欲望看起来多愚蠢，多贪心，我们都需要尽力的想望。我们或许得不到想要的一切，但是只有继续想望我们所能想像的，我们才可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Dimen 48-49)。

VI

以上的叙述为性革命——甚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补充了一些思考方向。我认为简单的说劳动民主和经济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性的发展，因而造成对婚姻体制的冲击，甚至形成性革命；或者太轻蔑的漠视性革命的重要性，或者太快的断言性革命的必然方向或结果——这些都不是什么太有意义的做法。历史显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已经具体的带动了情欲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一部份，劳动人口的流动、休闲文化、媒体及广告、性别角色的变迁、消费道德所渗透的情欲享受心态、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都已经大幅提升了

情欲生产力，再加上进步社会运动和现代性学的某些论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交战施力，这些风云际会都为情欲生产关系的动荡提供了更多的变数。性行为、性论述、性认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它们在再现和论述领域中的明显可见度，这正是性革命昂首前进的征兆，也是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动荡变化的时刻。而什么样的介入能够更进一步壮大情欲生产力，激化它与当下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或者换个方式说，就是彻底改变情欲的生产关系，驾驭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情欲生产力扩张，使得情欲生产关系更加多元、开放、流动——这恐怕是所有进步的劳动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历史的先例来看，性革命带来的当然并不见得一定是情欲生产力的全面解放，性革命也不一定保障情欲受压迫者的全面翻身，情欲体制总是以各种方式继续吸收改变的动力；但是，只要有进步运动的介入，有抗争，就至少「改变了辩论的条件」（Willis, "Foreword" viii），也就是改变了压迫和斗争的条件及局势。美国百年来的两次性革命都因着各种进步运动的积极挪用和转化，为多元情欲主体创造了此刻以及下一阶段抗争的资源动力。换句话说，这些介入和抗争不但使得女人、青少年、同性恋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等等情欲受到压迫的主体，有机会在动荡的社会条件和结构中寻求抗争的机会和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此刻的抗争形成了多少进展，下一阶段的女人、青少年、同性恋、性多元人士等等受到压迫的主体至少不必从原点开始，而可以在新的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前进。可惜许多进步人士总是轻看情欲领域中的抗争而看不见它对彻底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在这一方

面。赖希倒有不少洞见可以供我们思考。

赖希对情欲革命的关切并不是对马克思革命论的教条式套用，而是来自于他对苏联 1920 年代性革命的反省（注 41）。当时许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经济领域有关「生产」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而其他领域（如性别或情欲方面）的变革充其量也只是从属的、片面的、奢侈的、不太重要的；因此这些人对经济生产以外的社会脉动抱持着漫不经心的态度，或者用各种阶级色彩的大帽子来扣它们（Reich, *The Sexual* 160）。但是赖希相信，革命不能忽略存在在群众心理中的「历史的主观因素」（subjective factor of history）（Reich, *The Sexual* 174），因为这种心理状态——也就是在一夫一妻父权情欲生产关系中养成的情欲匮乏状态和威权人格——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革命的动力，而且这个心理情欲的结构并不完全随同经济力起舞，而是形成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力量」（Reich, *The Sexual* 188），甚至可以左右一个革命的走向。「父权家庭为所有建立在威权原则上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的和意识形态的繁殖地」（Reich, *The Sexual* 161）。因此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家庭情欲结构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改造节点（注 42）。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赖希在社会革命的架构内首度认识到情欲（性）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uality），以及物质的情欲基础（the erotic/sexual basis of the material）。复杂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下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截然二元分野（注 43）。赖希严正的指出，「一个社会的情欲过程（sexual process）一向就是其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的核心」，也就是再生产

(reproduction) 的核心。换言之，情欲领域中的革命就是再生产的革命；「性革命就是社会文化重新结构 (re-structuring) 的客观表现」(Reich, *The Sexual* 160)，而父权家庭及其相关的人格心理情感性欲绝对是这个革命的主要场域。

换句话说，以苏联的性革命为例，赖希认为是强烈的家庭情感影响了革命的执行者，因而使得革命的果效无法全面展开；这个深刻的认识也为我们思考美国百年来的性革命提供宝贵的洞见。毕竟，新的社会连结方式总是新的、刚建立的、甚至尚未生根的，可是原有的家庭情感及其构成的人格结构却是根植于日常的每日生活活动仪式中。每一个习惯动作及情绪反应都可能促进并巩固主体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形成的自我定位。因此，一个革命的真正效应除了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外，一定要改变其人格结构的再生产方式，改变那些维系现有人格心理运作的日常生活与惯常反应，也就是改变养成这些日常生活与惯常反应模式的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家庭结构。赖希甚至明确的指出，革命的效应不是由它建立了多少新的立法而定，而是由人民是否经验到崭新的、革命的生活方式和内容而定 (Reich, *The Sexual* 174)。因此，社会革命不能只是经济与政治层面的重组，它必然要包含人格结构和和情欲心理的重组，才不至于一时进步，终究倒退。可借苏联的革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深刻的意义，反而用阶级的帽子扣上推动性革命的努力，使得苏联的整个革命功败垂成。因此赖希才会沈痛的说：「真正的悲剧就是当革命运动开始维护反动的、庸俗的观点，并称呼性革命者为『小资产阶级』的时候」(Reich, *The Sexual* 160)。

赖希在 1920 年代苏联性革命反挫的例子中所学到的宝贵功课是：性革命决不只是相关现有既存的、已经带着各种文化人格心理包袱的抗争主体及其实践，更重要的是如何切断体制再生产自我的管道，也就是解放一夫一妻家庭的情欲压抑，挑战此刻的性的部署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积极改造生产未来将承担体制的新生主体。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全面扩展当然会包含了情欲生产力的开展和性意识的扩散普及，这个新开发出来的动力和空间也当然有可能如傅柯所言使得性的权力部署更加细致化，但是对抗这个趋势的策略绝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努力回复情欲白色恐怖的禁绝状态，而是要像傅柯一再强调的，去挖掘串连已经存在的零散的抗争点，平反被压抑的知识和论述（*subjugated knowledges and discourses*），暴露性部署的松散和矛盾。这也就是说，情欲生产力能否为情欲上受到压迫的主体形成抗争式的支援，能否彻底的改造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单一及权力不平等，能否被串连起来摇撼迂回相连的其他压迫关系，都还要看运动者如何挪用转化资本主义的情欲生产力，如何呵护那些已经在此刻片面或局部突破情欲生产关系的畸零主体以扩散她们搅扰体制的效应和力量，如何积极介入通俗媒体中不断复颂的情欲常识、家庭意识形态中的性养成、青少年次文化的情欲实践、性与家庭的相关法律及制度常规、性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性（医）学及性（心理）研究等学术及论述生产、以及在现阶段愈来愈强大的知识／权力场域中形成的性教育（注 44）。

如果说台湾现阶段澎湃进行的性革命有机会为情欲弱势创造什么发展的空间，开拓什么情欲方面的资源，改变什么现有的不平等分

配，那么，对性革命的历史和理论进程的活络认识和诠释，实在是此刻迫不及待的工作。

注释

- (注 1) 本文是笔者对「情欲政治」(erotic politics, or, politics of sexuality) 所写的「导论三部曲」的第一篇。第二篇〈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在 1996 年 5 月 3 日第 20 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中宣读，定稿则发表于《中外文学》第 25 卷第 4 期，1996 年 9 月，6-37 页；第三篇则是〈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性／别研究》第 3-4 期合刊，1998: 260-299。。
- (注 2) 研究者一向就注意到，赖希晚年大量修订其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对于了解他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基本上，赖希尝试融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倒是不争的事实。赖希觉得个人心理问题有其社会源头，同时，他也觉得精神分析理论只在个人范畴之内打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个人的性生活和性态度甚至人格结构上具体的操作以便再生产适合本身需求的劳动力，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来显示社会组织方式对个人心理的细致塑造。但是赖希又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只有宏观的眼界，而没有思考在社会条件中形成的个人心理和情欲结构如何阻碍、或延缓、或有助于社会生产的操作以及再生产体制的维系，故而也需要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实地检视社会文化在个人心理的沉淀如何反过来使得生产模式得以成为可能。由于这个关切，赖希才对 1920 年代欧洲及苏联的性

文化变革充满兴趣，期望了解其中各种力量的运作。本文在此沿用的是 1945 年出版的英文版如《性革命》。

- (注 3) 赖希在这里的分析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经历了这些冲击（个别家庭和个人当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变迁发展），而是说整体的社会结构中有这些新的趋势和现象。
- (注 4) 赖希认为美国的婚姻制度崩解速度最快，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因而在「情欲经济」(sex-economy) 上创造了最大的矛盾，一边是高度严格要求禁欲的清教徒精神，另一边却是强制道德 (compulsory morality) 在社会变迁中的逐步崩溃。事实上，赖希也暗示，清教徒式的情欲生产关系正是被强制道德所压制不住的情欲生产力冲垮的 (Reich, *The Sexual* 142)。
- (注 5) 有些学者质疑「性革命」的说法，认为「革命」包含了一个前傅柯式的历史发展观念 (Seidman, *Embattled* 22)。但是连质疑者也都承认，使用「革命」这样的语言，并不一定要包含什么实证式的全面翻转现象，而可能只是代表了性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且在动员群众、创造反叛的象征上，有其重要的修辞策略的意义 (Seidman, *Embattled* 21)。傅柯虽然强调抗争点的零散、流动和短暂，但是他也承认有巨大激进的翻转可能：「毫无疑问的，是那些（散见于社会阶层和个人生活中的）抗争点被策略性的串连符码化，使得革命成为可能」(Foucault 96)。而所谓社会运动就正是要创造并实现这个可能，因此本文对美国百年来性革命的「重新描

述」(redescription)并不在于「发掘历史的真相」——那些言之凿凿说性革命是不可能的空想、已经被女人视为错误而唾弃、美国人现在倾向回归家庭之类的断言，倒常常宣称自己是知道「历史真相」的。我的立场比较靠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Richard Rorty：现实总是在论述中被经验、被建构的，而任何描述都只是发言者所选择的隐喻(chosen metaphoric)(Rorty 39)，也因此只不过呈现了发言者引以理解和建构世界的角度而已。而我们之所以不断重写历史、重述现实，正在于开拓另类描述的空间，也就是以「自我创造」(self-creation)的隐喻来取代「发现史实」(discovery)的隐喻(Rorty 40)。

(注 6) 在这里，我的语言有可能使读者误以为这两个概念也有什么单一本质(monolithic)，不过我在下面的历史分析中会具体显示，美国历史上两次性革命是由愈来愈复杂的运作因素和力量促成的。在这篇论文中，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将只是一组启发性(heuristic)的工具，以帮助我们串连各种敌意以及各类与性体制矛盾的实践，以形成对立或反对阵线，并且和马克思主义论述串连。

(注 7) 关于「性的部署」的观念，参考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特别是第四部份的后面两章。我对这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也做了比较宽广的、比较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

(注 8) 如 D'Emilio & Freedman, Epstein, Faderman, 和 Seidman。

(注 9) 这两次「性革命」所涵盖的层面当然包含了「性」和「性别」方面的各种变迁，本文将比较聚焦于性领域内的变化，而以性别为背景。

(注 10) 事实上，也只有那些自我定位为场外裁判的人，才会热衷于用一竿子打翻船的方式来评断一个运动或思想革命是「失败」（或「成功」），仿佛一旦决定了功过，就可以把其中的一切抹上本质主义式的色彩，然后轻易的全面拒斥（或全心拥抱）个中的一切。可是，就社会运动、就改变世界的出发点而言，真正要关心的恐怕应该是如何转化使用串连那个运动或思想革命中的各种论述或历史资源，来操作此刻的意识形态场域，扩大此刻的运动能量。

(注 11) 研究性与生产模式在西方社会中互动关系的许多学者都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量扩散之前，家庭的结构和功能是经济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劳动的生产活动绝大部分在家庭之内进行，因此性别分工并不十分明显，家庭成员合作生产每日所需，互相依赖存在。这种生产体制并没有提供在家庭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因而使得个人的人生选择十分有限，情欲活动的模式局限于维系这样的家庭和生产模式，也就是局限于服务婚姻，而由家长全权决定。性和婚内生殖密不可分，因为那是唯一可能大幅增加劳动力也就是增加家庭财富积累的方式。历经 17、18、19 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把许多劳动生产活

动移至家庭之外，提供了雇佣劳动的机会，家庭成员因而被吸引离开了原本自给自足但此刻在生产力竞争中居于劣势的家庭生产模式。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减弱。女人在家庭中的工作窄化至子女之照料，同时，幼年人口的经济贡献力因着劳动的职业化而延后或减弱，生育子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这些发展都可以部分解释 19 世纪末对节育的关注。事实上，学者认为到了 20 世纪初，家庭的经济功能已被其情感功能取代，因此性也不再局限于生殖功能之内了（D'Emilion 6-7; Epstein 156-158; Reich, *The Sexual* 135）。

（注 12）有些游乐设施的广告词明白的宣告其情欲性质。例如：「爱之桶」的广告词说：「听过小木屋宾馆吗？『爱之桶』比它浪漫十倍！」（意译）。「炮弹飞车」的广告词说：「她会大声尖叫，飞身躲入你怀中吗？是的！一定会！」（D'Emilio & Freedman 196）。

（注 13）值得注意的是，D'Emilio and Freedman 在叙述主体在情欲实践力上的差异时，并没有以区分高下的方式来断言阶级因素全面决定了情欲满足的程度，也没有断言当时的情欲生产力扩张对中产女人比较有利因此不值得推广等等。阶级（以及另外许多因素，如婚姻状态、居住区域、家中排行、相貌身材、年龄辈分等）当然会影响到情欲资本的大小与运用；正如它在教育、就业、从政等方面也同样会影响个别主体施力的机会与结果。但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许多人面对主体的阶级差异，仍然对各种方面的解放运动热情支援，

不遗余力，却唯独对情欲领域的解放运动特别有保留，而且时刻祭出阶级差异来劝说大家驻足不前？「否性（sex-negative）文化」（Reich, *The Sexual* 25; Rubin 11）和「情欲沙文主义」（Rubin 32）在这一点上的同时运作，值得运动者进一步反省。

（注 14）世纪之交的情欲革命可以从另一个迹象观察到。金赛的性学研究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男人在婚姻体制之外的情欲出路多半只有找妓女，但是战后的现象是，男人转向非妓女的比例大幅扩张（Kinsey et. al. 300），不再严行情欲规范的 20 年代女人甚至赢得了「新女人」（New Woman）的封号（D'Emilio & Freedman 190）。

（注 15）不少历史观察者都指出同性恋身分在此刻浮现（Bullough 177; Weeks 90），但是我在此处更关心的是阶级、性别与认同身分在此时刻的汇集发展。

（注 16）节育从十九世纪起就一直是个引发焦虑的社会议题，因为各种节育的措施不但意味着人口的减少，更意味着女人首次有了机会决定自己的生命有多大一部分要投注到养儿育女的事业或者其他的人生目标上。这种蕴含自主选择权不论对男人或女人而言都是一大挑战（Epstein 158-159）。

（注 17）德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曾在 1913 年呼吁工人进行「生育罢工」，以全面拒绝生产新的工人来企图终结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Asbell 30）。

（注 18）这种优生的考量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种罪

行被揭露。才逐渐在许多中产人士中减弱，继之而起的节育说词就变成了所谓的「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Grant 42)。

(注 19) 美国本土生产性学研究的男女医学人士包括 Katherine Bement Davis, Prince A. Morrow, Gilbert V. Hamilton, Latou Dickinson, Cleia Mosher, Max J. Exner 等(参见 Bullough)。另外，同一时间内，透过中产妇女的支持，专业的妇产医学也逐步取代传统的产婆，把女人的生育过程医疗化，从家庭和社区移往专业空间中(如医院)。这个医疗权的争夺战牵涉到复杂的阶级和种族问题，也凸显了性革命的复杂动力学(Riessman 126-130)。

(注 20) 这些性学家对于性的热情正面描述使得评论者都称呼他们为「性狂热份子」(sexual enthusiasts)(Robinson 3)，可见他们在性学领域中的突破性，绝不亚于那些积极抗争既有体制的社会运动者。

(注 21) 1918 年 Marie Stopes 推出 *Married Love*，1926 年 Theodoor Hendrik van de Velde 在德国和荷兰同时推出 *Ideal Marriage*，两本都在美国成为畅销而且长销的婚姻手册。

(注 22) 1920 年代欧洲各国进步人士也曾透过各种性质改革的组织，如「性改革世界联盟」及「德国保护母亲暨性改革协会」，来推动性道德及文化革新，其中还包括苏联 1917 年革命之后，新社会对堕胎和同性恋的诸多开放、对妇女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的松弛、对青少年和儿童性教育的创

新学程等等新措施及政策。1920 年代欧洲的性革命承袭了当时左翼的进步思潮，把性视为社会文化的物质基础之一，也因而把性改革当成社会改革的重要环节，宣称追求更公义、更理性、更现代的性道德与性文化，以减轻强制式的禁欲为个人生活带来的痛苦压抑，并消除双重标准的伪善式性道德在社会中造成的恶果（如嫖妓、性病等等）。对同时期的赖希而言，1920 年代欧洲各国的性改革运动者虽然有其进步性，也具体的为消除非理性的性道德压迫尽过心力，但是。赖希坚定的指出，这些性改革运动者注定走不了多远，因为他们共同有一盲点：他们都还死守婚姻制度为最后底线：换句话说，性改革者只希望在不动摇婚姻制度的前提之下，对当时的性道德做局部的改革，以建立一个新的、比较理性的新道德秩序，她们所作的努力充其量只是调整了婚姻的内容和性质以保存婚姻体制而已（Reich, *The Sexual* 52-73；亦可参考 Seidman, *Romantic* 73-81）。

（注 23）例如，就业机会的紧缩使得许多女同性恋在经济上无法单身独立生活而被迫进入异性恋婚姻，可是同时有些女同性恋也策略的调整情欲生活，以某种双性恋式的妥协模式来维系自己的同性恋身分（Faderman 95）。

（注 24）内分泌方面的研究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对繁衍生殖过程的关注，还有一部分则来自男性医学人士对恢复自身男性雄风的个人兴趣（Bullough 125-126）。

（注 25）二次大战后。国家安全成为首要考量，右派份子如麦卡锡等

人利用恐共心理，对许多政治异议份子大加迫害，例如 195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获悉金赛的性研究中心遭受调查之后就立刻终止了对金赛的经费补助 (Segal, *Straight* 88)。这种氛围对同性恋等性异议份子亦不放松，1947 到 1950 年间军队和政府单位中就开除了将近五千名同性恋身分的员工 (Faderman 140)，艾森豪总统并且在 1953 年下令，以后政府的雇佣程序中必须查明申请者的性偏好取向。冷战阶段中社会大众的不安心理遂以排挤异己作息抒解，造成了对同性恋极为不利的社会氛围 (D'Emilio & Freedman 291)。不过，同性恋仍在如此的劣势中推动自我意识和认同，左派同性恋就在此时成立 The Mattachine Society，女同性恋则组成了 Daughters of Bilitis 的联谊组织，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组织的前身。

(注 26) 过去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对这个趋势的诠释是：花花公子哲学为男人提供了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这对女人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个诠释没有思考的是。如果女人要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家庭体制，开拓新的人生道路，那么她们对那些已经在拒绝支撑家庭体制的做法——包括女人逃家（不婚、出轨、第三者）或男人不养家（外遇、离婚）——也必须有更细致复杂的分析，而不能一竿子打翻船的全面加以批判。

(注 27) 历史学家认为 1960 年代性革命的号角是由两本重要的女性著作吹响的。其中较为女性主义者乐道的是 1963 年 Betty

Friedan，愤慨描绘中产家庭主妇生命荒原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另外一本就是这里所说的、更早一年出版而且轻松决断的一举将婚姻及女性迷思彻底撇弃的《性与单身女郎》（Ehrenreich et. al. 56）。

（注 28）1950 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是美苏之间在古巴的剑拔弩张，末期则转为两国的太空争霸战，1957 年苏联成功的发射 Sputnik 太空船，美国惊觉落后遂投入大量经费和奖助学金来补助大学的扩张，希冀透过教育来提升竞争力。这个「教育的民主化」为原本与高等教育无缘的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开辟了自主自立的道路（Faderman 197）。

（注 29）「意识觉醒」这个名词是纽约市左翼女性主义者 Kathie Sarachild 所创，但是这种活动的灵感来源则是 50 年代全球反帝、反殖运动中发展出来提升人民自觉的团体活动；Sarachild 曾经参加过的民权运动在南方黑人群象中就曾有「细诉真相」（tell it like it is）的做法，中共在农民中则推动过「忆苦思甜」，瓜地马拉革命游击队也使用过类似策略来提升群众意识（Echols 83-84）。

（注 30）此刻另外两本以通俗语言撰写的经典著作则是 Alex Comfort 的 *The Joy of Sex*（1972）以及 Nancy Friday 的 *My Secret Garden*（1973），前者以丰富露骨图片和明确的文字描绘，具体教导读者如何创意的享受性爱，后者则展现了女性性幻想的狂野和主动，直逼任何社会的道德禁忌。这类著作的风行都宣告了性医学再也不能垄断性的论述。

(注 31) 口服避孕药的研究和实验推广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意外发展，可参考 Bernard Asbell, *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以及 Linda Grant,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 第 3 章。

(注 32) 例如前面提过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 活动，目的在透过个人的经验叙述来发展阶级意识和姊妹情谊。她们相信女人的觉醒不是用什么理性或教条的教育来认识女人的处境，而是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一来，「一般人民的智慧」既然高过别的运动（特别是美国当时由男性主导的进步运动）已经建立的理念，那么就需要尽量鼓励个人提供经验，集结以作为知识的基础。这个做法后来也被同性恋解放运动采用，作为壮大主体的活动形式 (Echols 82-85)。

(注 33)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考 Faderman (215-245) 及 Smyth。

(注 34) 1960 年代逍遥探索的那一代年轻人在 1970 年代已成为必须面对现实生活的青、中年人，她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有了稳定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或者想要结婚但找不到可以共同建立平等关系的伴侣，想要生育后代而已经晃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同的年龄及其相应的社会角色，使得许多人的心态也很不一样了 (Stacey 227)。而不巧的是，她们所面对的美国现实正好是 1970 年代后期的危机四伏和挫败连连，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雷根保守政权对这些人产生广泛的吸引力。

- (注 35) 1980 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大批拥护家庭、回归家庭的作品，把女性主义者刻划为肇始家庭解体的元凶，例如 Berger & Berger 及 Kramer。言论风气所及，甚至有些左派学者也有相同的论调，例如 Illich 及 Lasch。
- (注 36) 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基进的左派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中产化。因为此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已成「妇女运动」(Women's Movement)，「女性主义变成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Willis, *No More* 118)；原本高举女性情欲自由和女性自决的首要议题——堕胎权，也已经在运动的语言中变成了温和的「人生选择」(choice) (Willis, "Foreword" 7)；而要求女性得力壮大并且对体制进行全面集体的抗争，变成了一系列自我救援式的疗伤组织，例如强暴救援及辅导中心、家庭暴力受害女人的中途之家、女人的健康诊所等等。虽然这些机构有其及时救助个人的重要性，但是它们需要长期的支援和经营，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而当性伤害层出不穷，社会环境的改造速度有如牛步时，各种来自父权社会的反挫和来自女人本身的丧志，都使得性革命所带来的脉动受到极大的耗损。
- (注 37) 有意思的是，领导反色情运动的主要是白种中产女性，而非那些在体制中受害最深的少数族裔女性 (Segal, *Straight* 62)。
- (注 38) Susan Faludi 的《反挫：谁与女人为敌？》(*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就记录了许多这

方面的迹象。

(注 39) 例如 Betty Friedan,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 和 Germain Greer,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注 40) 这个会议的相关论文可参看由 Carole S. Vance 编的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注 41) 苏联在 1917 年革命之后，曾经尝试推行一连串性革命的措施，来改变有关婚姻、离婚、节育、同性恋、青少年生活、及儿童教养的社会实践，以当时的历史眼界而言是十分进步的做法，可惜没有多久就在各方守成势力之下倒退，赖希在《性革命》的后半段对这一段历史有颇为沈痛的检讨和分析。他认为当时有很多人抱持着非常简单的经济观点，「以为随着资产阶级的败亡和苏联新颁布的性立法，性革命就『已经完成大业』，或者只要无产阶级一掌权，性的问题就自然的解决了」(Reich, *The Sexual* 187)。赖希认为这些人的大错误正在于他们只看重立法，而忽略了情欲领域的(半)自主性：「任何对历史发展所作的研究，只要它以为群众的心理状态仅仅不过是经济过程的产物(product)，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心理状态也同时是经济过程的动力(motive force)，那么这种研究还算不上是有革命眼光的」(斜体字写本文作者所强调；Reich, *The Sexual* 174)。

(注 42) 就 1980 年代以来性／别解放运动所遭遇的挫折来看，家庭显然还是最重要的争战场域，情欲革命的果效似乎与家庭结

构的革命息息相关。傅柯曾特别指出，从 18 世纪以来，家庭单元就是「性的部署」的最主要场域，包括女性身体、儿童性、生育、及各种变态等等主要的性轴线部署策略，都在家庭中的「夫妻」和「亲子」两个面向上找到它们最坚实的支撑：「性的专属发展场域就是家庭」（Foucault 108）。傅柯的兴趣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指出「性的部署」在家庭中运作所形成的各种矛盾张力，如乱伦禁忌与情欲灌注的共生；但是家庭「性化」的内容和结果在个人具体心理的层次上倒底是何面貌，这样的主体形塑对社会运动又有什么影响，傅柯并未处理。在这方面，我们倒可以由赖希的性革命论得到一些启示。赖希并非下是笼统抽象的宣告性欲的社会形成，而是更深一层由微观的角度指出，一夫一妻父权婚姻家庭中的管教式情欲调教，根本无助于主体快感能力（orgasmic potency）的养成，也因而无助因愉悦开放的人格养成。赖希在研究当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心态时，逐渐认识到一夫一妻婚姻家庭是促使个人快感能力薄弱、情欲经验匮乏、以致于无力创造愉悦而只能养成权威人格的主要场域（Reich, *The Sexual* 95）。赖希指出，一个强烈（而且强迫）要求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贞的一夫一妻家庭，事实上正是威权体制的缩影，也是养成权威人格的温床（Reich, *The Sexual* 75-82），在这种家庭中运作的最主要权力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来的「身体私有制」以及按着父权逻辑来执行的「父亲权威制」。「身体私有制」使得夫妻之间强

制排他的性交关系在实质上早已丧失自发的性和愉悦，而多半是维系体制的例行活动而已；「父亲权威制」则勾画出父权的一夫一妻婚姻家庭中，父亲与妻子儿女间的赤裸权力面貌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性管制。赖希则认为，这两种所谓的「强制道德」(compulsory morality)构成了家庭人际关系最主要的运作模式，而嘲讽的是，环绕着家庭的意识形态再现却是最甜蜜温馨的图像和描绘，以至于不管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如何苦闷无趣沈寂，不管孩子的人格发展如何被性焦虑和性压抑所构成，人们还是不自主的合理化其中的痛苦，习惯性的觉得有义务巩固这个制度。而在这种环境中所养成的自欺、伪善、敌意和怨愤也往往在无意识中啃噬家庭成员的心灵，使孩子不但无力创造自己的愉悦，连对别人的性愉悦也不是忌妒就是打压，而且倾向唯唯诺诺、胆怯退缩、保守内敛，但却同时迷信领袖、惧怕权威、甚至残暴易怒。这些——正是权威人格的特质，也正是纳粹之类的威权政治体制需要的臣民，其对情欲的矛盾畏惧但又自责压抑，更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需要的严谨劳动主体 (Reich, *The Sexual* 82)。若不面对并改造这种人格心理的生成，性革命的效应往往只是一时的、有限的、个别的突破现象，而不能彻底切断旧情绪、旧习惯、旧心理对旧制度的依恋和支撑。这种人格心理的固着一旦遭遇挫折的情势就立刻退缩转向，渴望回到某个安全的、不引发变动的位置上去。这个体认使得赖希视婚姻家庭为性革命的首要场域。赖希在这里指出了体制内

的性医学和性教育专家们极力回避的一个事实：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固然有可能是关爱和依赖的小屋，但是它也同时是压迫与限制的牢笼。婚姻义务和家庭中的权威只会创造出一个个无力以自主的爱性来经验人生、只想靠着婚姻的道德与法律制度来强取他们希望享有的安全感、归属感、占有感的怯懦人格（Reich, *The Sexual* 129）。赖希本人则主张用自由自在，不建立在占有及监控上的自然结合（及分手）来取代强迫式的婚姻制度，彻底的改变人际结合的方式相形态，借以改变在父权一夫一妻家庭中生成的情欲匮乏和权威人格心理结构。

（注 43）不屑性革命的左派总是强调要先谈情欲的「物质基础」，好像情欲是什么依赖着某种物质基础而存在的次要东西，而那些「物质基础」则有着自我独立的优先地位。赖希所关心的则是那些使得物质基础得以持续运作的「情欲基础」——在这里指的特别是婚姻家庭所养成的心理情欲结构。更有趣的是，赖希同时强调，这个情欲基础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物质的，他在《性革命》的前半部指出，情欲的发展意味着物质世界的重组和资源的分配，因为性愉悦能力的培养需要文化物质基础。换句话说，性当然不只是个人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是个牵涉到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赖希很明确的指出，对一个经济能力有限的青少年而言，她的情欲如果要能自在的得到满足，这不只是她的性欲自由的问题，她同时需要隐私权、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和经济能力、需要避孕的

知识与资源、需要肯定面对性事而且有能力爱她的性伴侣、需要开明支援的父母、而且绝对需要一个正面看待性的社会环境 (Reich, *The Sexual* 15)。不过，由于在现有的婚姻家庭制度中，这些情欲资源的掌控主要是由父母来进行日复一日私密生活的监管和性道德观的灌输，因此赖希对父母以性控制来建立自身的权威并挫伤孩子的人格感到深恶痛绝。更值得台湾本地进步运动人上深思的是，赖希在提到情欲解放需要物质条件的时候，从不是为了消极的指出青少年情欲自主之不可能或困难，也不是忧心忡忡的担心情欲解放有其经济能力和阶层限制；相反的，赖希正是要用这种对物质条件的强烈关注和具体要求，来指出青少年在情欲上的处境是代间压迫的问题，是性别压迫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需要用更激进的情欲社会革命来改变的状态。

(注 44) 196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初期性革命的浪潮中，美国的教育系统开始考量推动性教育时，女同志就已经在异性恋主导的妇女运动中清楚的看到（性）教育对再生产自我的重要，因此提出了非常前瞻的要求：「所有的性教育教程都必须包含女同性恋情欲，作为有效的、正当的性爱和性表达方式之一」（Echols 215），像这样前瞻激进的运动策略在台湾本土尚有待生产。

參考書目

- Adam, Barry D. *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wayne, 1995.
-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Altman, Dennis. "Political Sexualities: Meanings and Identities in the Times of AIDS." *Conceiving Sexuality: 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 Eds. By Richard G. Parker and John H. Gagn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97-106.
- Asbell, Bernard. *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Bailey, Beth. *From Front Porch to Back Seat: Court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U of Maryland P, 1988.
- Berger, Peter & Brigitte Berger.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Ground*. New York: Anchor, 1983.
- Bremmer, Jan. *From Sappho to De Sade: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1991.
- Bullough, Vern L. "The Development of Sexology in the U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 in the Bedroom: A History of Sex Research*.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303-322.
- D'Emilio, John. *Making Trouble: Essays on Ga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D'Emilio, John &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 Dimen, Muriel. "Power, Sexuality, and Intimacy."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s. by Alison M. Jaggar & Susan R. Bordo.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89, 1992. 34-51.
- Echols, Alice.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 Ehrenreich, Barbara.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 Ehrenreich, Barbara, Elizabeth Hess, & Gloria Jacob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 Epstein, Barbara. "Family, Sexual Morality,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Turn-Of-Century America." Snitow et. al. 155-168.
- Escoffier, Jeffrey. "Sexual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ay Identity." *Socialist Review* 15 (1985): 119-153.
- Evans, David T. *Sexual Citizen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Faderman, Lilli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1991.
- Faludi, Susan.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Crown, 1991.
- Fine, Michelle. "Sexuality, Schooling, and Adolescent Females: The Miss-

- ing Discourse of Desire."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2. 31-59.
-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Foucault, Michel.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
- Fout, John C. & Maura Shaw Tantillo, eds. *American Sexual Politics: Sex, Gender, and Race Sinc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0, 1991, 1992, 1993.
- Freedman, Estelle B.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US." *Socialist Review* 25.1 (1995) : 31-46.
-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1963.
- .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
- Grant, Linda.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
- Green, Jonathon. *It: Sex Since the Sixtie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3.
- Greer, Germaine.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1971.
- .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 Haag, Pamela S. "In Search of 'The Real Thing': Ideologies of Love, Modern Romance, and Women's Sexual Subjectivity in the United

- States, 1920-40." Font & Tantillo 161-192.
- Haste, Cate. *Rules of Desire: Sex in Britain World I to the Present*. London: Random House, 1992.
- Hekma, Gert. "A History of Sex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Sexuality." Bremmer 173-193.
- Illich, Ivan. *Gender*. New York: Pantheon, 1983.
- Irvine, M. Janice. *Disorders of Desire: Sex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n Sex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0.
- Jeffreys, Sheila. *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0.
- Jenness, Valerie. *Making It Work: The Prostitutes' Rights Movement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 Kinsey, Alfred,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1953.
- Kon, Igor S.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Russia from the Age of the Czars to Today*. Trans. by James Riordan. New York: Free P, 1995.
- Kramer, Rita. *In Defense of the Family: Raising Children in America Tod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Lasch, Christopher.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MacKinnon, Catharine A.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 Patton, Cindy. *Inventing Aids*. London: Routledge, 1990.
- Peiss, Kathy. "'Charity Girls' and City Pleasure: Historical Notes on Working Class Sexuality, 1880-1920." Snitow et. al. 127-139.
- Porter, Roy & Milulas Teich. *Sexual Knowledge, Sexual Science: The History of Attitudes to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4.
- Reich, Wilhelm.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Trans. by Vincent R. Carfagn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0.
- . *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 Trans. by Therese Po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45, 1962, 1969, 1974.
-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Women and Medicalization: A New Perspective." *Inventing Wo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Eds. by Gill Kirkup & Laurie Smith Keller. London: Polity, 1992. 123-144.
- Robinson, Paul.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Ithaca: Cornell UP, 1976, 1989.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9.
- Rubin, Gayle.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s. by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 David M. Halperin. London: Routledge, 1993. 3-44.

- Sayres, Sohnya,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 & Fredric Jameson.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 Schur, Edwin M. *The Americanization of Sex*.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8.
- Segal, Lynne. *Straight Sex: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London: Virago, 1994.
- Segal, Lynne & Mary McIntosh, eds. *Sex Exposed: Sexuality and the Pornography Debate*. London: Virago, 1992.
- Seidman, Steven. *Embattled Eros: Sexual Politics and Eth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Smyth, Cherry. *Lesbians Talk Queer Notions*. London: Scarlet P, 1992.
- Snitow, Ann, Christine Stansell & Sharon Thompson, eds.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London: Virago, 1983.
- Stacey, Judith. "Are Feminists Afraid to Leave Home?: The Challenge of Conservative Pro-Family Feminism." *What is Feminism: A Re-Examination*. Eds. By Juliet Mitchell and Ann Oakley. New York: Pantheon, 1986. 208-237.
- Thompson, Sharon. "Feminism and Teen Romance: 1966-1983." Sayres et.al., 296-299.
- Vance, Carole S. "Negotiating Sex and Gender in the Attorney General's

-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Segal & McIntosh 29-49.
- Vance, Carole S.,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2.
- Weeks, Jeffrey.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85.
- Williams, Linda. *Hard Core: Power, Pleasure, and the 'Frenzy of the
Visibl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9.
- Willis, Ellen. "Foreward." Echols xvii-xv.
- . *No More Nice Girls: Countercultural Essays*. London: Wesleyan UP,
1992.

性、性意识及身体建构

——形塑台湾女同性恋的身体美学

赵彦宁

一、简介

台湾的女同性恋者以「T」与「婆」来指称圈内（注 1）两种似乎相对立的性角色（sexual roles）。据许多四十岁以上的女同性恋者，这二个名词是在 1960 年代一家 Gay Bar「圆桌」的老板取的。当时国内的女同性恋者聚集的场所是如中央酒店这种「西化」的「上流」聚会场所以及 Gay Bars。「T」源自于英文的「tomboy」，指的是外表「类似」（异性恋）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而婆则是指相对于 T 的、较「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也就是 T 的「老婆」。在当时的香港与台湾，「Tomboy」也称为「汤包」。T 和婆性角色的分化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美国的 butch-femme。Butch-femme 的关系在 1980 年代以前被主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者（feminist lesbians）强力抨击，认为其复制异性恋霸权。但从未有人说的清楚所谓被复制的「异性恋关系」究竟为何，这个名词不仅被理所当然的本质化（essentialized），扮演 butch-femme 角色的女同性恋者亦受到隐含的阶级歧视（注 2）。但自 1980 年代中期起，许多美国的同志学者开始为 butch-femme 模式翻案，并探索其在女性主义及情欲流动上的颠复性。譬如说，Nestle（1987）说明 butch 与 femme 在情欲流动中双向建构（mutually constitutive）关系、主张此模式绝非异性恋的复制

品。其后。Nestle (1992) 又编了第一本 *butch-femme* 文集，进一步将历史、阶级、种族等社会面相纳入 *butch-femme* 研究中，且以公开的 (out) *femme* 身份伸张 *butch-femme* 在同志运动中的权力 (power)。Case (1989:297) 主张 *butch-femme* 的身体表演 (bodily performance) 揭露、但也同时演出 (play out) 被佛洛伊德派心理分析视为面具的正常化的女性特质 (normativ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butch 的「男性化特质」(masculinity) 与 *femme* 的「超女性化特质」(hyper-femininity) 的基础为一种特殊的 *erotic economy*，它兼具颠覆性 (相对于佛洛伊德派代表的社会系统与阳物霸权) 及情色性 (erotic)。Butler (1990) 则认为这种身体表演解构 (denaturalize) 已被自然化的异性恋制度，由 Lacan 的角度来看，这种解构昭示的正是异性恋在符号学上本体性的空洞 (essential Vacancy)。

这些研究不仅颠覆异性恋主流文化，也挑战性／别与酷儿研究的发展性。但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研究者仔细探讨 *butch-femme* 的快感 (pleasure) 来源与面相 (manifestations)。在人类学的领域中，性的研究一直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本世纪初人类学发展的早期，在隐性 (implicit) 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奇风异俗的狂热下，不少知名学者发表性的观察与研究，最著名的如：Mead (1961 [1928]) 及 Malinowski (1929)。但在此风潮过后，保守主义回头，性 (特别是同性恋) 的研究便迅速消失，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忌 (注 3)——更遑论快感的研究了。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结合文化人类学与酷儿理论，试图探讨国内部分 T 与婆的身体表演及情欲流动的数种面相。文中将以 T 的束胸着手，自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探讨其性与性别上的意义及可能的颠覆性，由此分析 T 与婆在视觉与情欲上互动的起点，最后再借由 T 与婆性爱的可能及不可能性来探讨身体与想像的关系，并对当前的酷儿理论提出一些批评。资料来源为 1993 年 5 月至 7 月对视 T Bar 为社交场域的圈内人所做的田野调查。在这里里并感谢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与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在研究经费上的支持。

二、谜一样的 T 的胸部——「去女性化」的身体政治

我：T 是什么？

小安：T 就像男人。

我：你说「像男人」是什么意思？

小安：有些人会注射荷尔蒙，然后就会长胡子还有喉结来。像我二哥和三哥就是这样。

我（一星期之后）：妳是怎么认识妳二哥和三哥的？

小安：我三年前在一家 MTV 打工的时候遇到我二哥。有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一起去喝酒，我告诉他说我是圈内（注 4），他说他也是，我不懂他的意思，我根本就看不出来，我甚至还问他说：「什么？你是 Gay？」他大笑说：他是 T，就跟我一样，可是不信。直到有一次她来我家换衣服，我看到她的胸部，我才相信。

我：她的胸部很大吗？

小安：没有啦，没那么大。可是，那是女人的胸部。

圈内几乎所有的 T 在性爱中均不坦露其胸部，而且大部分的 T 已

在、或曾经束过胸，对许多 T（如「刚出道的「小 T」」），其建构「T 性特质」（T-ness）的第一步便是束胸，并且不再戴胸罩。因应这个现象，一、二年前某家 T Bar 甚且还代售一种「束胸内衣」，形状造型类似汗衫，但内附魔鬼胶可束住胸部。T 为什么要束胸？婆对此看法如何？圈内人极少回答过这个问题，大部分只含混的说：「这就是 T 与婆不同的地方」。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不可见的）胸部是「T-ness」的代喻（*synechdoche*）（注 5）。对其他的 T 而言。这胸部的特质是既可见又不可见的（*at once visible and invisible*），如小安所言「我根本就看不出来……直到有一次她来我家换衣服，我看到她的胸部我才相信」。那么，表面上要除去的胸部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这个意义必需放在历更与文化的脉络中方能浮显出来。初浅看来，T 要束的胸部是女性化的胸部（*feminine breasts*），在视觉上其意义为避免被结构化的男性化眼光（*male gaze*）物化。Mulvey（1989〔1975〕）将好莱坞影片中的观看关系分析为男性：女性 = 观看者：被物化者 = 主动：被动的权力关系，深深影响了其后二十年女性主义影像论述者的分析角度，虽然不少批评者认为 Mulvey 忽视了其他社会面相——最明显的便是种族与性认同——但仍公认此权力关系的普遍存在。但甚少学者自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将女性身体物化的视觉主体性（*spectatorship*）究竟是如何创构出来的。以女性的乳房为例，在台湾或中国的汉人社会中，它究竟在何时进入公领域（*public sphere*）（注 6）。被集体性的物化呢？

在所谓台湾或中国的汉人社会中，女人的胸部都是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才被拿来当作是女性特质（*femininity*）和女性性征（*female*

sexuality) 的一个可资辨识 (visible)、可以表述 (representable) 的象征/符号 (Symbol/icon)。二十世纪初期, 伴随着中国反殖民运动及现代化运动的兴起, 文化中一向受压抑最深的女性身体, 被知识阶层物化 (reify) 成为概念层次上可拿来宣扬自由民主意识的东西 (注7)。女人的双乳首度在中国历史上走入集体论述的网络, 并立即被政治化及再情欲化 (re-eroticized)。依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证方式来说, 将女人的胸部 (female breasts, 译者按, 此处指生理器官, 有别于具社会性别意涵的女性化胸部: feminine breasts) 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 似乎也意味着是要将作为一个社会体 (social body) 的中国从殖民情境中解放出来。只不过, (松了绑的) 女人的胸部仍然要接受异性恋本位和男性中心的政府及知识阶层的联合监督 (surveillance)。

在这里我举一个民国初年对于女性胸部是否要「解放」(即松绑) 的争论为例, 试图说明不论男性或是女性的性特征、及在视觉上被物化的可能均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在民国初年的大众媒体上出现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论战: 即, 女性的乳房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它的社会功用为何? 观看它的对象是谁? 此论战的起因在广东省的民政首长某日发了一个通告, 命令其治内的女性不可再束胸, 他的论点如下: 女性是所有中国老百姓的母亲, 哺育 (人民) 是她们的天职, 女性的乳房因此实在是推动国家进步的一个基础。胸部如果把它绑住, 乳房会萎缩, 奶水也会变少, 如此一来, 人民的健康就不会进步, 因此。从今后起禁止束胸。他特别规定辖内的官员要时常向他汇报妇女胸部解放的情况 (襟霞阁 1931: 8)。这个通令引发了下列的论战: 某

些儒家学者十分愤怒，认为束乳是中华文化的美德，在中国受列强侵略之时正应推展此传统美德。以彰显华夷之分。而他们所认为的西方蛮夷的特点之一。便是会在公共场所裸露胸部「并点缀珠花」的、不知廉耻的女性；另外一些受新学影响的新文化推动者则认为，男女两性在生物基础上均有吸引对方的身体部位（**body parts**），对女性来说，那便是她们的乳房。他们还说：「试想一胸部平坦的女性看来是多么的乏味」（**ibid:11**）。

拜反殖民之赐，女性胸部（**feminine breasts**）竟被建构为国家建设的要素。注意，在此时期，那个未言明的，必须先被抵消（**counteracting**）始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它者」（**other**），始终是指西方殖民主义。在这里同时被建构出来的是一个集体性的（见民政首长的通告以及其他人的论述）、男性中心的（见新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者）、及异性恋的（同上）视觉主体。由于这个主体是集体性的，不论是男或是女、不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均能在公领域中取有（**take on**）此主体，而物化女性的乳房。

相隔六十年后，这个掺杂了（异性恋）女性特质（**femininity**）、再现理论（**representation**）、国家建构及可见度（**visibility**）问题的议题，在台湾本岛再度引发热烈讨论。以流行文化界为例。自 1987 年解严之后，电影从业人员即不断呼吁相关单位放宽影片查禁尺度，争取女性三点的「解放」。我认为，必须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脉络之下，**T** 的（被捆绑的）胸部才变得有意义，也才能被解读（**intelligible**）。负载了过多异性恋性别意义——不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物性别——的胸部，需要在象征层次及生理层次上进行解构（注

8)。

以下是某位 T 的束胸经验：

她：我从十四岁开始就用透明胶带束胸，那时候我在一家餐厅打工，餐厅规定瑞盘子要高举过头，没做多久，我的腋下附近就痛得受不了，有时候把胶带撕开以后还会流血，可是不能等伤口愈合，第二天一早又要再把胸部贴住，所以伤口就永远都好不了……。那时候，我们大家吸安吸的很凶，每次阿珍很 high 的时候，都会乱绑。有一次她出现的时候，一连高一连低，把我们快笑死了，结果我就带她到化妆室重新帮她绑。虽然我也是常常都很 high，可是我每次都是绑的最好的。妳知道，束胸是有技术的，妳要把它变小，但不能完全变平，用胶带贴的时候难度更高。

我：所以，妳有看到过阿珍的乳房罗？

她：当然，看了不晓得多少次。

我：所以，T 看 T 的胸部是可以的？

她：我不懂妳的问题……。让 T 跟异性恋在一起工作是很麻烦的，我每次在工作的地方都会意识到自己（绑起来）的胸部，我很怕别人会注意看，然后就会晓得我是圈内人，所以去应征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挺（起被绑小的）胸给对方看。有时候我还会擦口红，妳相信吗？

此时，另一个 T 插嘴道：妳的工作跟我的比起来已经算好的了，我的老板还会要求女性员工化妆，刚开始我都不想去，虽然待遇很好，可是后来我的婆给我买到一支天然色的口红，问题就解决了。

T 对自我胸部的拟像（envisage）是摆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接合点上。「妳知道，束胸是有技术的，妳要把它变小，但不能完全变平」，既然如此，那又何苦费那功夫去绑它呢？理由是，T 的身体认识论的特色即在于，它将状似矛盾对立的二元关系平行并置

(juxtaposition)；诸如：可见与不可见、缠裹与曝现、摘除与保留、生物与建构、女性特质与非女性特质……等。在这个意义上，借用班雅民的话来说，T 有一个寓言式 (allegorical) 的身体 (注 9)，依 Sha viro。(1993: 86-7) 的解释：

寓言总是暗示着寓言对象的丧失或死亡，寓言不是再现，而是以极明显的方式，具体化 (materialize) 揭露再现原想去遮掩、复盖，然终不能使之弥合的落差……寓言因此不仅是再现的形式 (mode)，也是达成颠覆性转换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积极手段。

T 的胸部的这种「亦彼亦此，介乎其间」的特性，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打破二元对立，指出女性特质与非女性特质，或是其它的对立关系间，还存在着别的面相；它的意义比较是在于标示出一个颠覆性行为，该行为具体化 (corporealizes) 呈现的身体与 (异性恋) 性意识的能动力 (agency) 间的距离。颠覆行为人的敏锐自觉是建立在一特定的「现象学」基础上。此现象学在凸显知觉经验 (sentient experiences) 的同时，亦将经验变得合于情理 (sensible) 并可以理解 (intelligible)，比如，在面对它者，面对一个怀有敌意的凝视的时候 (「我每次在工作的地方都会意识到自己〔绑起来〕的胸部……去应征工作的时候，我部会提醒自己挺〔起被绑小的〕胸给对方看」)，原本绑起来的、被去除了感受力 (desensitized)、去除了感官欲望 (姑且说是女性化) 的胸部，再度又恢复了感觉——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于原有的形式。新的这对被努力挺出来的乳房之所以有知觉 (sensible)，是因为它们已在实质上被重新女性化。

然而，依旧要问的是，为何要去生产一个理论上「天生就有」的胸部呢？借用 Newton (1994) 的「复合扮装」(compound drag) 的概念来说，答案是，因为这是在 T 的身上表演 (perform) 异性恋女性特质的一种「双重扮装」(doubledragging)。在这个例子中，那个监看的它者的权势已被削减 (disempowered)，因为它丝毫不能预先阻碍 (foreclose) 表演动作的进行，意即，纵使是始终有感于它者的潜在威胁，胸部依然还是绑了起来。监控 (在想像中) 即使法力无边、无所不在，如果以 Zizek (1989) 的犬儒主义来对应，扮成犬儒般的被监视者，还是有可能将关系倒转过来。「我的老板还会要求女性员工化妆，刚开始我都不想去，虽然待遇很好，可是后来我的婆给我买到一支天然色的口红，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故事反讽的地方当然就在于说，不擦口红和擦一种与原来唇色全然一样的口红，其结果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看起来色彩天成的嘴唇，还会被当作是整张上了妆的脸的代喻，意思是说，只要有擦口红，不论擦的是哪一种，就 (会被认为是) 等于整张脸都化了妆。然而，与 Zizek 的犬儒认识论不同的是，它者的宰制力量 (hegemonic power) 并不来自于它有辨识真伪的能力，恰恰相反，它者之所以有宰制力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去看出口红到底擦了还是没擦。

T 的主体建构因此包括了要在表面上去配合一个已知失去督导能力、不再敏感，或是根本漠不关心的它者。已知「人之不已知」却还要「为所不必为」，是许多 T 会采取的某种特定形式的蒙混过关 (passing) 的方式中，一个主要的面相。

一般情况下，假扮成 (passing for) 它者的意思可以说是去模拟

(minicking) 它者最为显着可见的特征，与它者做一种转喻式 (metonymical) 的连结，以期最后能被 (误) 认为就是它者，而且／或者可以去占据它者的主体位置。T 的状况与此截然不同。T 在「假扮」的时候，并不想做原件真品，而就是想做摹仿的复制品 (mimetic representation)，透过寓言式的转换过程，T 的胸部遂以具体方式揭露了正常规范下 (normative) 性别再现所欲遮掩、复盖，然终不能使之弥合的落差。换言之，这种形式的再现原意是要解消性能动力 (sexual agency) 与身体间的本质性差异——此处说的性能动力可自动对应 (register) 并启动 (initiate) 适宜的性欲望，而此处说的身体也充份具备了这样的性能动力。

三、T 与婆的相互认同关系

T 的胸部在其它的 T 面前会被去情欲化 (「所以，妳有看到过阿珍的乳房罗？／当然，看了不晓得多少次。」)，在婆的面前又会被重新情欲化。可以被情欲化的原因是，婆平日看不到 T 的胸部；事实上，很少有 T 会在做爱的时候裸裎以对。以下是某 T 描述的她「死的最惨的一次」：

五年前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婆，每次做爱的时候都要我把衣服脱掉，我是她交的第一个 T，所以她不晓得规矩……有一次我正要跟她做的时候，她忽然从床上跳起来，把我的衬衫撕开拉到腰这边，很倒楣的是，我那天穿了一件白色蕾丝胸罩，上面还有亮亮的珠珠，那时候我跟我妈住在一起，她给我买了很多胸罩，而且都强迫我要穿。不管怎么样，总之，她看到我的胸罩以后，就在那边大呼小叫说：「好可爱喔！」我 X！她讲完我就没办法做了，我在那边一直想我的胸罩，根本没办法再做，就这样，那件事以

后我们很快就分手了。

T 的胸部是区辨 T、婆差异的关键要素。强调 T 的胸部的非实体性（non-corporeality）及非存在性（non-existentiality）的同时，已在 T 与婆的身体间划出一道严格界线。而 T 与婆的个别身份（identity）也正是在此界线分明的情况下被重新生产出来。T 的胸部不能被婆看到或被婆碰，更不可以被婆模仿，有个 T 会抱怨说她的婆在知道 T 会束胸后，自己也想起而效尤，此 T 不悦的是，这样做会踰越身体认同的界线，吊诡地把 T 的胸部变成是可以被模仿的东西，如此一来，T 的胸部就失去了独特性，不再专属于 T 了。对 T 而言，只有在她们身体的独特性可以被自己并被自己的婆认定的时候，她们才能被性欲化（sexualized，「我在那边一直想我的胸罩。根本没办法再做」），一旦意识到自己胸部没绑，或是戴了胸罩，她们就完全丧失性欲，或是被去除情欲（de-eroticized），与此同时，她们的伴侣也同样会丧失性欲，或是被去除情欲。

某位婆也做过类似的陈述：

我以前交往两个 T，刚认识时候，就都留着长发，头发长短对我没有影响。其实我喜欢的 T，也不会太阳刚喔！如果喜欢一个非常阳刚的 T，那么和男人在一起就好，我比较喜欢有女孩子气息的 T。胸部倒是曾经困扰我，我接触一个女孩子，她的胸部比我丰满。我跟她上床的第一次，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害怕，然后就吹了。

（《女朋友》试刊号 13）

她害怕的是她会在 T 的身上看到自己被性欲化（sexualized）的部

份，说的更精确一点，她怕 T 的「胸部」比她自己的还大——显然，小一点的胸部并不会令她感到困扰。在这陈述的背后可看到 T、婆身体间有一必要的差别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此关系同时限定了婆的性意识，对婆来说，适度地情欲化的 T 的身体不可以是自己身体的翻版，万一 T 的波比婆还要婆，那就更不对劲了。

这个例子说明，将身体的某部位恋物化，会产生某种特定形式的解构认同（**dis-identification**）。意思是说，T 的「天生的」胸部会被当成易位关系（**dislocational relations**）中，但也是恋物关系中的一个视觉基点（**visual locus**）。（「我在那边一直想我的胸罩……」以及「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我有感觉到她的胸部……」）在传统佛洛伊德的理论中，母亲身上阳具的空缺（**absence**）与小男孩的自恋心理会产生某种吊诡的砥触，然而，小男孩却可在象征层次上，以被恋物（**the fetish**）补位的方式来获取恋物快感。这个有名的被恋物当然是指想像中的母亲身体的阳物，或者，也可以说是指在小男孩还未意识到该物根本不存在前，与其想像已做了某种转喻式连结（**metonymically related**）的东西。这个象征性的替补的过程，在佛洛伊德的理解中。是透过一个延异的动作（**deferred action**）来完成的。先「被延置」与然后又必须再被找回的（**recuperated**）是身上那个被恋物化的部份，它在时间链及转喻链上同时取得先行位置（**anterior position**），惟有透过这两个意象的奇妙的转换（**transformation**），小男孩才能维护主体的完整性。然而，矛盾的是，也正因为佛洛伊德认为母体的前构成物（**pre-constitution**）是必然可以被性欲化的（**necessarily sexualizable**），所以延异动作才会发生。这无可避免地

促成了母体的 *scotophilic* 客体化，而这个母体在小男孩原先的构想中，是由时间切面与实体切面，片段不相关连。然又以转喻方式连结的意符 (*signifiers*) 组合而成。

对照之下，T 的胸部的恋物化之所以会变成一场大灾难，是因为不论对 T 或对婆而言，延异皆不可能。T 的胸部不能被替换，不能复位，以至于也不能被重新性欲化，其症结在于，习惯上，T 的身体不是在女性身体的转喻链上被性欲化 (*the T body is not conventionally sexualized on a metonymic chain of feminine sexualizable body parts*)。因此，T 的胸部一旦曝现，或是被意识到不能见容于 T 身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前行的意象可取代它的位置。换言之，T 的身体组成是建立在「空无」(*blankness*) 之上——空无任何传统的女性或男性的性别意涵。这个身体是一个没有传统「性意识」的身体，或者，说的更清楚些，它的性意识正源自于它的非实体性 (*non-corporeality*)。这个身体物化了一个没有「生理构成」(*physical constituents*) 的性能动力，身体部位间的不协调因之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难以容忍到甚而几乎不可能——在视觉上及在心理上——假装视而不见。

四、T 与婆的性事

某 T 曾如此描述「T 的性高潮」：

在我的经验里，高潮有大、小之分。一般只借着摩擦或性幻想所得到的是小高潮，真的大高潮，会全身颤抖，完全无法使力，变成一个很无助的人，什么也没办法做。你急欲和对方身体合而为一，你真的很想进入她身体里跟她在一起一辈子，这是一种很强列的欲望而非想法。在那一刻你的

欲望无法控制，而达到一个最大的高潮。

(《女朋友》试刊号 12)

高潮的多样在知觉层次 (sentiency) 划分了 T 与婆的不同，要达到真正的高潮，需要一个配合度高的它者，在 T 的概念里，这个它者的身体是「多孔的、可渗透的」(porous)，T 在孔穴间进出，内与外的界线被 T，被这个物化的性能动力划了又重划。在这个动作里，此性能动力的存在变得可能并可被理解。这里的一个重点是，人不可能在压抑欲望的同时又想「把自己给出去」——把 T 的身体交给婆。换句话说，T 的身体在此刻进入实体化阶段。T 与婆身体的媾合成就了性的转喻链，也将婆的身体从此变成首要的身体意符 (the master signifier)。

此处要注意的是，T 欲达到高潮时，其身体与主体是分离的。就像是有一个超越的它者可以从她身上跳出来，监督指导她自己的情欲流动，而要获得「真正的」快感，就要征服这个它者。

某位婆也有类似的说法：

过去两年我有跟两个 T 上过床，在那之前我的女朋友都是比较女性化的，所以，跟第一次那个 T 在一起的时候，我被她做爱的方式吓到，妳知道的嘛，就是不脱衣服也不喜欢被碰，很典型 T 会做的事。可是，过一阵子以后，我就比较能去享受跟她的性关系，有部份的原因是因为在做爱的过程中，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自己被强烈地欲求，让我觉得自己很女人、很性感。除此之外，我可以同时扮演好几种角色和身份，我知道我是在演一个角色，或是多个角色，而且单单只是这样想的时候就会让我有欲望，好像只是这样想，欲望就可以被撩拨起来。我的第一个 T 有时候会在做爱的时候，讲些类似异性恋关系的故事，在不同的角色间穿梭。让我有性的感

觉。可是我跟我的第二个 T 在一起的时候就有问题，她跟第一个 T 很像，只有一件事不同，那就是，她要我在达到高潮以后去插她，可是呢，当我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她还是继续在讲她的异性恋故事，甚至她还会坚持要在我插她的时候，继续要在我上面，这对我而言实在太奇怪了，要在同一个场景去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很难的，而且我又被要求很有意识的去变换我的角色，现实与幻想间出现缝隙，使我我觉得非常难为情。

Butler (1990: 123) 说，正是因为「女性身体」(female body) 的文化解释之外，又见到经由 butch 的身份建构所被重新定义出来的男性特质，两节对照之下，才显现出社会界定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男、女两性特质的空洞。而，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解构社会性别化的主体位置的基础上，酷儿的身体表演对 Butler 来说才具「踰越性」(136)。Butler 除了再次将这里的「颠覆」本质论化，暗示好像只要在身份认同或身体表演上故作酷儿状，自然而然就会有颠覆力，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她的讨论中，只有扮装同志和 butch 才是真正有颠覆力的酷儿。Femme，相对来说，几乎仅是被动的身体／表演的搭档，femme 的颠覆力——如果有的话，就是在语言层次上确认并合法化 butch 身体的踰越性。就如某个 femme 所解释的，她要她的「男友」是「女孩」(She wants her boys to be girls)，意思是「身为女孩」(being a girl) 重新脉络化并重新定义了 butch 身份里的「男性特质」(Butler 123)。

怪的是，在 Butler 的记述中并无 butch 说「我要我的女友是女孩」，由此可知，对她而言，「身为女孩」之所以有颠覆力是因为它重新定义了 butch 的男性特质，而非因为它重新定义了 femme 的女性特质。换言之，只有在看到可对应于 butch 身上几可乱真的男性特质

的东西的时候，femm 的身份始告确立。因之，femme 是拜 butch 先行存在（pre-existence）之赐，才得以进入实体界及象征秩序。

如果 butch 的身份真有表演性质，那么这场表演的观众或它者是谁呢？Butler 的说法里好像隐含了两种形式的观众，一种是集体霸权式的异性恋社会——几乎是像拉康说的那种幻象式（phantasmatic）的存在体，即生即减，应酷儿的身体表演而生，但旋即在表演过程中被解构。另一种观众是 femme，她们可一眼看穿加诸于 butch 身上（及 butch 与 femme 的关系里）的异性恋比喻（trope），并立即将之置换掉。

把 butch 和 femme 当作是异性恋关系的「临摹」（replicas）或「复制」（copies）的想法，是低估了这些身份在重新定义霸权分类时，情欲意义的内在差异及复杂性。Femme 也许会忆起好似异性恋模式的场景，但也会立即将之置换掉。

（Butler 123）

换句话说，「她」是「回忆」的一方，说的更精确一点，「她」是被迫「回忆」的一方。「她」忆起的是「她的」异性恋过去，解决这样一个强制性重演的过去的方式是把它置换掉，也就是说，需要同时被质疑的是这个把「她」变成 femme 而非变成 butch 的异性恋过去，或者，至少，她应以 Michael Taussig（1993）的「拟似记忆法」（mimetic remembrance）来建构主体，借着模仿它者，模仿传统异性恋关系中女人，然后再将之置换掉的方式来建构她的 femme 性特质。由于 femme 与她的异性恋过去有此转喻上与／或时间上的连续性，

她因此不具不证自明的能力，来无所用心的充份表现出酷儿颠覆性。

易言之，尽管 **butch**（及 **femme**）的表演揭示了几可乱真的异性恋情（*the virtual reality of heterosexuality*）可作为某种真品原件（*original text*），若把它者当作参考对照的叙事体（*narrative*），还是可以凸显出 **butch** 的男性特质及女性特质的颠覆性——尤其是如果把 **femme** 的拟似记忆也带进来的话。我的民族志研究显示，**T**、婆的性意识在建构的同时，也是 **T**、婆个别身体重新脉络化的过程，在这中间，异性恋比喻（*tropes*）可作为某种参考座标，但已被削除传统的再现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T** 的身体以及 **T**、婆的性事是寓言，因为被颠覆的不只是异性恋比喻，连同再现性意识时保有其「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的可能性皆被推翻。此处关涉到一个必要的先解消、然后再重构的主体化过程，在此过程中，**T** 的身体进入最后存在主义式的性欲化形式，对 **T** 而言，婆的身体也逐渐地实体化。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由台湾大学外文硕士班于佩君小姐翻译为中文）

注释

- (注 1)「圈内」对台湾以 T bar 为建立人际关系的女同性恋而言指的是一种女同性恋的『社区』(community)。在此，我沿用 Kennedy & Davis (1994) 对女同性恋社区的看法：在以美国 Buffalo 为中心的社区，与 50 到 60 年代，工人阶级的女同性恋者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便是以 Bar 为基地。这种组成社区的方式和一般人类学的了解不太相同。
- (注 2) 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中类似于像 *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 的作者 Radcliffe Hall 这样的上流阶层知识份子"Mannish lesbians" (Newton, 1979 [1972]) 使得 butch-femme 的角色扮演受到注意，但基本上大部分扮演 butch-femme 的女同性恋者出自中下阶层，非白人者的比例更高。
- (注 3) Roscoe (1995) 的调查显示，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人类学是最排斥同性恋研究的学科：从 1985-1995 的十年中只有三篇此类论文在人类学期刊中发表。极少数的例外如 Newton (1972) 对芝加哥 drag bars 的田野研究，这部经典深刻影响了二十年后 Butler (1990) 对 sex 与 gender 的看法。性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角色不仅涉及殖民主义、亦涉及人类学传统中主观与客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informants) 关系的论战——性即是此论战的一个争议性战场。
- (注 4) 认同 T、婆二分法的本地女同性恋者，特别喜以「圈内人」自称。此处的「圈子」若以 Anderson (1991 [1983]) 提出的

「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理解之,是以不断划出和重划各种不同的界线的方式被建构出来的。可能的界线包括有同、异性恋间的界线、都市与乡村的界线、以及相对于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而言时,T吧的特殊地理位界。

- (注 5) 代喻为一整体的部分其具有代表性,象征整体的能力。譬如说: Klein (1993: 61) 分析波特莱尔的"一绺青丝"(La Chevelure), 认为诗人爱慕的女子的长发(特别是发中弥漫的香水味)成为她整体的代喻,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代喻,诗人的幻想可航向最奇异最诗意的境界——亦即,它不仅是个恋物(fetish)。我认为 T 的胸部在此对圈内人也有此意义。
- (注 6) 在此我基本上沿用 Habermas (1974,1989) 的概念,强调在此领域中,上层权力阶级、其认可的意识型态、与人民间互动的关系,及此领域的政治性。如 Brownell (1995: 67) 所言。公领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面相。
- (注 7) 相关论述可参见 Barlow (1993)。
- (注 8) 在此举中国现代化早期女性乳房被物化的例子,非在暗示中国与台湾在文化及历史上必然的连续性。近年来台湾文化是否应纳入「汉人文化」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是人类学界东亚领域的新兴话题。否对者如 Murray & Hong (1991) 及 Hong (1994) 认为汉人及日本殖民主义等历史因素造就台湾社会本质上不同于中国社会的特性。而

Sangren (n.d.) 则主张所谓的中国社会应视为一理想型态 (ideal type)，固然台湾无法代表中国社会，也无其他任何「汉人社会」可以，同时过分强调台湾社会的独特性会将其再度本质化。在此我无意解决此棘手的问题，我提出中国的例子，一在强调历史建构身体的可能性。二在突显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性别论述的影响，在这里我追随的是 Mohanty (1991: 6) 对「第三世界女性」及「殖民主义」的概念。

(注 9)「以《徽示图选集》(Emblemata selectiora) 为例，它里面有帧图案画的是一朵同时正在盛开，同时又在凋零的玫瑰，太阳在同一地点升起而又是落下。『巴洛克的精髓蕴藏于动作的同时性中，……』」(Benjamin 1994 [1977]: 194)。

参考书目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1983] .
- Barlow, Tani E.,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93.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 .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intro. George Stein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1963] .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 Case, Sue-Ellen.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 In *Making a Spectacle: Feminist Essays on Contemporary Women's Theater*, ed. Lynda Har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 . "Seduced and Abandoned: Chicanas and Lesbians in Representation." In *Negotiating Performance: Gender, Sexuality & Theatricality in Latina/o America*, eds. Diana Fuss and Juan Villega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abermas, Jurgen.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3 (1974) : 49-55.
-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 into a Category of C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1962] .
- Hall, Radcliffe. *The Well of Loneliness*. New York and London: Doubleday, 1990 [1928] .
- Hong, Keelung. "Experience of Being a 'Native': Observing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Today* 10.3 (June 1994) : 6-9.
- Klein, Richard. *Cigarettes Are Sublim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alinowski, Bronislaw.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New York: Halcyon House, 1929.
- Mead, Margaret.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Quill, 1961 [1928] .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Introduction.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s.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7.
- Mulvey, Laura.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Murray, Stephen O. and Keelung Ho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Looking Through Taiwanese Cultur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 (1991) : 273-299.
- Nestle, Joan. *A Restricted Country*. Ithaca: Firebrand, 1987.

- ed. *The Persistent Desire: A Femme-Butch Reader*. Boston: Alyson, 1992.
- Newton, Esther. *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972] .
- "The Mythic Mannish Lesbian: Radcliffe Hall and the New Woman." *Signs* 9.4 (1984) : 557-575.
- "Baking Ziti for the Coronation: Homophobia, Sexism, and the Subordination Status of Lesbians in Cherry Grove." Paper given at the 93th Annual Meeting for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2, 1994. Atlanta. Session Title: "Discriminating Lesbians and Gays: Rights, Communities, Identities."
- Roscoe, Will. "'Was We'Wha a Homosexual?' Native American Survivance and the Two-Spirit Tradition." In *glq* 2 (3) : 193-236.
- Sangren, P. Steven. "Anthropolo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The Relevance of Local Religion." Paper given at Conference 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ern Chin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3 October 1993.
- Shaviro, Steven. *The Cinematic Bod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Taussig, Michael.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Zizek, Slavoj.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Davis, Madeline & Elizabeth Lapovsky. "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Sexuality in the Lesbian Community, Buffalo, NY, 1940-1960."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Eds. by Martin Bauml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 George Chauncey. New York: Plume, 1989. 426-440.

九〇年代同性恋论述 与运动主体在台湾

倪家珍

一、前言

去年（1996 年）的第一届「四性研讨会」是今天这篇〈同性恋论述与运动主体〉短文第一次发表，会中及会后许多朋友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篇正式的学术文章，而是一篇关于台湾同性恋运动的「运动笔记」(critical notes)，我作为一个在 1992（1990 年代）加入妇女运动的妇运工作者，在这五年中因直接参与各式运动场域，并策划和推展运动而获得许多实际经验，如：参与警方在华西街搜索被贩卖的雏妓行动；在广慈博爱院为被收容的成年流莺及未成年雏妓上课、交谈；1993 年和我的运动伙伴们组成了一个劳动者小红帽大队参与当年的工人斗阵游行，抗议女性劳工在职场内所面对的恶质的劳动条件和性别歧视；1994 年台湾的校园内发生了一连串性骚扰、性暴力事件，我们一群年轻的妇运工作者觉得应该将许多女人的愤怒与恐惧化为具体的反抗行动，联合了各校女研社的同学为主要发动主体，发起「522 反性骚扰大游行」。在这个第一次由女人自己发起，自主策划、组织、动员的游行中，一句即兴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擦枪走火的引爆了妇运内部的性论战，至今不休。1994 年我到美国旧金山亚裔爱滋防治团体（Asian AIDS Project）

实习，并参与当地的同性恋游行和爱滋活动后，更确信台湾以阻吓式的防治政策与带有各种歧视的社会文化交互作用，只会更强化社会对女性、同性恋以及爱滋感染者的歧视，于是更积极介入爱滋工作。1995年我接触第一位女性爱滋感染者。同年同性恋团体抗议台大涂醒哲教授假爱滋研究之名进行一项充满歧视与偏见的同性恋研究，我和工作伙伴受邀参与声援队伍，共同行至台大及卫生署，抗议卫生署补助此类研究以及官方长期执行的不当爱滋防治政策。从1994年至今，不断直接或间接参与多项由同性恋团体所举办的行动和活动。

这样的运动经验不仅不断地冲击我对性别身分内涵的思考，也不断测试着妇运的局限性（在行动力上、在阶级思考上、在性异议主体上、在妇运的内部民主上……）、无法回避的女人之间的差异的议题、和其他运动相互结盟／批判的关系。在一次次行动中，和不同运动主体接触的许多深刻的真实感受不仅开启了我的阶级意识，形塑了我对同性恋运动的认同，也时时提醒着自己不能固着在单一的女人身分认同，因为所有的压迫机制并非只来自于性别身分，不同的弱势女人主体对于性别压迫的实质经验和面对方式也不尽相同。

这篇运动笔记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正在从事或关心同性恋运动发展的朋友，为这个尚未有固着形貌与历史包袱的新兴社会运动开启一个思考／行动／实践之间的辩证，让运动从停滞的学术说法上跳开，让思考成为行动与实践的工具。

二、1990年代与同性恋相关的社会事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是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在旧

的威权体制瓦解、新的政治势力重新洗牌重组的过程中，许多被压迫的主体纷纷集结起来，形成自主的社会运动，透过共享被压迫的物质处境，建立正面的自我认同，以反抗统治者，对抗各组压迫的社会关系（性别、种族、阶级……），改变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

在这些不同身份主体所形成的运动之间，同性恋运动在 1990 年代随着同性恋社团与校园学生社团的相继成立缓缓探出头来，挑战这个社会的男女对应的性别架构与欲望法则、刻板化的性别角色与特质、独尊异性恋的婚姻家庭制度与社会资源分配，在反抗性别与性压迫上建立新的主体、开拓新的眼界。

本文从有限的文字资料中，整理出 1990 年代由同性恋团体所主导的运动事件，以及引发反控的社会与校园事件。

三、1990~1996 台湾同性恋运动与社会事件

「我们之间」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1990.2.23 「我们之间」成立。成立之初，分成不同工作小组招收会员，举办各类型活动，不定期出版会内通讯，以凝聚内部共识，并作为女同性恋寻求认同与相互支持的基础，进而主动打造女同性恋的活动空间与文化。		此为台湾第一个女同性恋社会团体，亦即第一个同性恋社会团体。
1991.1 「我们之间」会内刊物创刊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1992.3.08</p> <p>参加妇运团体「妇女新知」所举办的「我爱女人」园游会，并摆设摊位。引发媒体对同性恋竞相追逐欲采访报导，「我们之间」皆予以婉拒。</p>	<p>「台视新闻世界报导」制作女同性恋专题，记者璩美凤（现任市议员）潜入女同性恋酒吧，并由摄影记者以隐藏式摄影机偷拍，播出时加上负面旁白描述，另一方面以制作「妇女节专题」为由，欺骗歌手潘美晨接受访问，隐射她为女同性恋。</p>	<p>此事件赤裸裸的暴露出异性恋社会对于同性恋社会的歧视，以及血腥的媒体暴力（有女同性恋朋友，因台视的报导曝光与家庭失和，甚至遭受暴力。）</p>
<p>1992.3</p> <p>针对「台视新闻世界报导」背离媒体道德的歧视案件，发表抗议声明谴责台视对女同性恋的扭曲，充满了偷窥搜奇的心态；也指出其欺骗手法有违新闻专业守则。</p>	<p>妇女新知基金会发表社论—人权最后堡垒「请尊重女同性恋者」，由冯光远发起近三十名文化界人士连署发表《尊重同性恋者的隐私权的一封信》表示声援。</p>	<p>这是妇运团体第一次以社论支持、声援女同性恋团体。</p>

事件内容	社会效应	备注
	新闻评议委员会也做出决议，认为报导不当。	
「台大男同性恋问题研究社」		
事件内容	校方效应	备注
1993.3 向台大校方提出申请正式成立为学生社团。成立之初的社团简介： 一、学生自发的文化性与学术性社团；二、厚植台大学术实力，作为台湾同性恋文化与社会问题研究反省的先驱；三、透过公开之社团活动，结合各方专才，形成沟通与学习的成长氛围；四、广纳校园人才，全方位研究探索，使之成为台湾男同性恋研究资料库。	因为社团属于「研究」性质，校方虽不愿意，但也找出不准成立的法规，训育委员会于3月25日决议，该社具学校社团登记之基本资格。	开启校园内成立同性恋学生社团风气之先。第一个校园内的（男）同性恋社团。
反歧视法		
事件内容	社会效应	备注
1993.12.28 「同志工作坊」与「我们之间」、「亚洲女同性恋连线」、「爱福好自在报」、「台大男同性恋问题研究社」、「Speak Out」等六个同性恋与爱滋病防治团体针对民进党内部份立委所组成的「台湾国会办公室」所草拟的《反歧视法》草案中未列入保障同性恋权益的条款，首度联合举办「促进同性别人权」公	公听会结束后，与会发言人之一中央大学何春蕤教授因在会议中主张同性恋者应分享各类资源，会后收到黑函，骂她是「教育界的败类」	同性别人权问题首次进入国会，成为政治性议题，同时也是同性恋团体问结盟的开始。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厅会（到了会场却被立委改成「谁来关怀同性恋」），这六个团体并发表声明。</p> <p>声明内容摘录：《反歧视法》应是一部反省台湾社会中种种不平等现象，企求落实保障弱势者权益的社会立法，但是同性恋身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却未被列入《反歧视法》保障的对象，因此为全面贯彻宪法第七条之平等原则，我们六个同性恋团体一致要求于《反歧视法》中列入保障同性恋权益之条款，并提出尽速让同性恋者在人身安全上免于受警察取缔之行政裁量权之侵害；同性恋者的工作权及受教育的权利不应被剥夺；卫生署应检讨对同性恋充满歧视的爱滋防治政策。</p>	<p>（同志工作坊出版的《促进同性恋人权公听会纪实》）。公听会上，教育部训育委员会郑崇趁主任表示：「我个人觉得异性恋比较正常，我不晓得同性恋他们的肇因，但我要提醒大家，如果这种行为好像是『吸毒』的话，吸毒它是不是一种『人权』？社会要付出多少成本，我在奉劝正沉醉在这种团体的人，我也不希望不要因为你们的扩充而「污染」到别的人士。」</p>	
<p>「台大女同性恋文化研究社」</p> <p>事 件 内 容</p>	<p>校 方 效 应</p>	<p>备 注</p>
<p>1995.2</p> <p>向台大校方提出申请，核准登记，成为校内正式学生社团。</p>	<p>以「学校社团太多」为由，要求</p>	<p>继台大男同性恋问题研究社之后</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并入性质相近之社团，如：女研社、男同性恋社，被申请人所拒。	成为校园内第一个女同性恋社团，并以「文化」取代了「问题」二字。
抗议学术强暴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1995.3.25</p> <p>「同志工作坊」针对一份由卫生署委托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涂醒哲所做的「同性恋者流行病学研究报告」，所发表的研究结果表达强烈的愤怒，于是发起「同志串联一反歧视之约」游行，共计联合台大、政大、东吴、中央、中原等同性恋学生社团，以及电脑学术网路—MOTSS 版、「爱福好自在报」、「新文明互助团体」等同性恋社团，和妇女团体—妇女新知基金会等，总计约有七、八十人参与游行，人权团体与多位大学教授以文化界人士参与连署。</p> <p>此次游行以抗议「学术强暴」为主题向卫生署及研究哲涂醒哲提出抗议，表达同性恋者不是充满歧视的伪科学研究下的白老鼠，并指出此份研究的问卷设计，充满异性恋观</p>	媒体普遍有报导，但是没有任何社会回应。	同性恋团体首度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行动，并针对爱滋病议题与医疗专业研究者进行抗议。

<p>点的偷窥心态与假设，对 2.61% 的低回收率，游行皆表质疑。抗议者要求研究者道歉，并且要求卫生署不应以性偏好作为研究的前提。前往声援的妇运团体更进一步指出，卫生署长期将同性恋列为爱滋防治中的「高危险群」(传染源)，透过政策制定与补助特定研究者，片面诠释研究结果，把防治疾病的问题变成窥探隐私、研究异己的问题，把实行安全性行为的社会责任完全推诿到个别的弱势群体身上，研究者成为政府的帮凶。</p>		
<p>台大校园同性恋日</p> <p>事 件 内 容</p>	<p>社 会 效 应</p>	<p>备 注</p>
<p>1995.6.1</p> <p>为了要过一个属于校园内同性恋者的节日，由「台大男同性恋研究社」、「女同性恋文化研究社」和支持同性恋的台大学生共同组成的「台大香包小组」订 6 月 1 日(端午节前一天)为校园同性恋日，活动内容包括：贴有粉红色倒三角国际同性恋标志的香包义卖、影展、座谈会，以及「同性恋烛光祈福法会」，共计有政大、东吴、中兴、中央、中原等学校的同性恋「地下社团」，以及校外人士一千多名参与。</p>	<p>媒体善意回应，广为报导。</p>	<p>开启校园内同性恋动态活动的开端，促进校园内同性恋社团间的互动。</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台大香包小组」表示，选择端午节前一天作为「校园同性恋日」，是因为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有强烈的同性恋意涵，粽子的形状充满着同性恋的意味。校园同性恋日要以节庆的活动设计，洋溢青春欢笑、强调同性恋生活的喜乐，走出悲情。</p>		
<p>同性恋结婚权</p> <p>事 件 内 容</p>	<p>社 会 效 应</p>	<p>备 注</p>
<p>1995.6.20</p> <p>针对民间妇女团体所提出的「新晴版民法亲属编修正草案」，同性恋团体组成「同性恋人权促进小组」争取同性恋合法结婚权，并发表声明，并召开记者会。</p> <p>「促进同性婚姻合法化」声明主要内容：一、「民法亲属篇」未能贯彻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之精神，剥夺同性恋结婚的权利；二、异性恋家庭为唯一的合法家庭形式，非异性恋家庭的成员均无法享有以异性恋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和法律权益，国家规避照顾所有国民的责任；三、同性恋家庭需要制度性保障，包括：合法的伴侣与子女关系，</p>	<p>在报章的民意论坛版面，引起一些他论，反对意见如下：一、同性恋者无法传宗接代；二、不必跟着欧美起舞，我们有传统的伦理道德；三、立法应是为了公众之事，同性恋只是少数，与立法宗旨不符。赞成的意见如下：一、两情相悦，既不犯法，也不妨</p>	<p>同性恋团体首度针对妇女团体所进行的民法修正工作提出意见，与妇女团体进行对话。</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拥有法定财产继承权与保险受益权；四、同性婚姻／伴侣关系，早获不同程度的承认，其中又以瑞典为最。具体要求：一、基于宪法第七条平等权之精神，立法单位应立即在民法亲属编中增修保障同性婚姻之条文。二、立法单位若无法将同性婚姻纳入现行民法，应尽速另立民法之特别法规承认同性婚姻之存在。</p>	<p>碍别人；二、有情人为何不能终成眷属；三、同性恋虽然是病态，但是是天生的且无法改变，应该让他们活得快乐点；四、只有循法律途径，得到承认，社会的眼光才可渐渐改变，台湾应广纳同性恋者的意见尽速立法。</p>	
<p>台湾师大男研社事件</p> <p>事 件 内 容</p>	<p>教 育 效 应</p>	<p>备 注</p>
<p>1995.9</p> <p>台湾师大若干男同性恋学生，打算组成男同性恋社团，但学生同时面临是否因此失去教职（无法担任中小学教师），未来工作权是否不保的担忧。</p>	<p>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官员表示：同性恋能不能担任中小学教师，法令有没有明确规定，一时之间并不清楚。但他个人认为，因为教师要教育学生，因此对于教师品德的要求比一般</p>	<p>此一事件再度暴露出教育部对于同性恋不友善态度与歧视，以及校园对同性恋学生与教师而言，仍处于戒备状态。</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人还要高，同性恋者的身心发展，通常并不健全。	
庄松富以同性恋身份参选立委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1995.11 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台北市南区登记第 26 号候选人庄松富，以同志（身份）出马竞选。	社会反应冷淡。但同性恋社群透过电脑网路和电台节日有过热烈的讨论。	庄松富先生在激烈的选战中并未获胜。
1995.11.22 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最后阶段，为了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由「我们之间」、「同志工作坊」等七个同性恋社会团体，以及政大、师大、中兴法商、中央、中原、东海、中兴校本部、世新、清大、交大、台大等十一个同性恋学生社团，共同组成「同志观察团」，举办「同志看选举」座谈会，并提出「新现身运动—同志政见换同志选票」连署宣言，以及发起「新好立委十大守则」的连署活动。 「新现身运动」宣言摘要：当媒体正不停追逐总统、副总统以及立委候选人，针对统独议题展开无休止	媒体零星报导，大多数立委候选人并未签署这份守则，也未出席记者会。	在激烈的选战和贫瘠的选举文化中，同性恋社群和其他弱势群体一样不被认为是需要积极争取与重视的选民。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论辩之际，同志观察团要对这样的选举文化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呼吁。虽然台湾的政治将迈入新纪元，妇女、劳工、原住民的权益，已渐渐成为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同志人权的呼声却被漠视，使同志成为在法律与社会福利中的次等公民。</p> <p>「新好立委十大守则」包括：将有有关同性恋者权益的法案优先排入议程；致力保障同性促进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争取同性恋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现行教材以教育体制对同性恋者的漠视与歧视；删除歧视与打压同性恋的现行法规；推动无歧视的爱滋防治政策；监督执法人员不得滥用公权力对同性恋者的聚会活动进行骚扰及人身攻击；支持同性恋者担任政府官员及公职人员等。</p>		
<p>同志空间行动阵线</p> <p>事 件 内 容</p>	<p>官僚的回应</p>	<p>备注</p>
<p>1995.12.28</p> <p>「同志空间行政阵线」成立，以下简称「同阵」，成员包括空间专业者、个同志团体、个人，以及关心同志运动的人士。「同阵」的成立是因为，台北市长陈水扁委托了多</p>	<p>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局长张景森自1995年12月30日起就不断发出 不当言论，如：</p>	<p>突出同性恋者作为市民主体对公共空间使用权之正当性，并进而挑战专业规划者</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位空间规划者，针对博爱特区一带作了重新规划，名为「首都核心区」规划历史保存计划，它的范围将新公园也包括在内，企图转化昔日博爱特区的威权，建立希望、快乐的市民城市。但是在本次的都市更新计划中，并未正视新公园作为同志们唯一的「公共空间」（也是个被污名化的空间），新公园有其无可取代的地位和特殊的象征意义。「同阵」认为在一连串的更新行动之后，同志族群势必被迫离开新公园，而这个承载同志历史的空间也将消失无踪。</p> <p>「同阵」认为这个规划案，不但不尊重同志作为新公园使用者的事实，更是官僚体系透过空间的更新以「净化」新公园的一种手段。</p> <p>「同阵」提出重视同志的公共空间使用权，同志在公共议题上应有合理地位，以及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具有合法性。</p> <p>「同阵」随后发起「寻找新新公园系列活动」包括：自1月7日至2月4日的1996同志十大情人票选活动、与市长有约拜会台北市市长陈水扁，以及彩虹情人周等活动。</p>	<p>「计画不是要故意忽视同性恋者，而是不了解需求」；「同性恋团体批评市政府不尊重同性恋，不过是『稻草人』心态，无非是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以凝聚力量」；「弱势的同志与社会上强势大众争夺共同空间，同志们要达成心愿的希望不大，而酒吧这种较具隐密性的场所，同志们比较能自在的活动」；「继续留在新公园阴暗的角落，不是同性恋团体所想要的结果」；「市府在首都核心区的规划中，完全没有独及新公园的规划，也绝对没有</p>	<p>与官僚体系在都市计划中，对于同性恋者的漠视与歧视。</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赶走同性恋的说法，请同志们不要误会」；张局长在媒体上更语意暧昧的表示：「同阵透过私人管道传话，要求将红楼戏院规划为同性恋俱乐部、特区或酒吧。」此举引发当地居民强烈反弹，造成当地居民与同性恋团体的对立。</p>	
台大学带选举黑函事件 事 件 内 容	校 内 反 应	备 注
<p>1996.1 台大学生代表选举时，部份候选人被黑函强迫曝光。台大学生代表选举中，两名候选人（同额竞选），在无落选压力的情况下，以「让我们在阳光下做朋友—请同性恋朋友走出黑暗」，「让我向你说不抱歉，爱人同志」等文宣，选名曝光部份候选人，认为同志要任公职，必须先公布个人性取向，以示对选民负责。</p>	<p>在校内引起热烈讨论。同性恋社团也发出「我们早就在阳光下了，但是我们拒绝和政治野心家做朋友」，以及在电脑网路上也有许多正反意见（详见「台大曝</p>	<p>堪称为「台大麦卡锡事件」，为近年校园内对同性恋最暴力的「血腥事件」。（美国在 50 年代麦卡锡政府当权时，为同性恋者的白色恐怖时期）</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光事件调查报告」)。	
女人 100 行动		
事件内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1996.3.8</p> <p>为庆祝妇女节以及因应三月总统大选,「同阵」加盟妇女团体所举办的「女人一百大游行」,除提出关于保障同性恋权益之十项诉求外,并组成同志小队,参与游行队伍,负责带领游行终点新公园前的「破柜」行动:推倒两个标着「同性恋霸权」、「嫁男人、生男子」的纸箱,并带领大家高喊:我爱女生、我要结婚等口号。</p> <p>同阵提出的十项诉求:1. 福利政策不应以异性恋家庭为单位,单身者、同性恋家庭,以及其他非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皆应合理享受国家福利资源。2. 立法保障同性恋者之结婚权,使同性恋者有选择结婚的权利。3. 立法明订同性伴侣得享有保险、财产继承、配偶津贴等权利与福利。4. 外籍同性伴侣应享有合法居留权。5. 同性恋者不应被剥夺领养子女,争取儿女监护的权利。6. 修改现行性教育教材中歧视同性恋的部份,提供真正尊重多元性取向</p>	<p>媒体普遍报导,但大多集中于游行队伍投掷卫生棉的行动,以及妇女团体的诉求,并未认真对待同性恋的诉求。</p>	<p>在激烈的总统大选中,所有弱势议题几乎皆没有讨论空间,各组候选人并未积极争取弱势主体之选票。</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p>的性教育。7. 国小、国中教育应增加认同同性恋家庭的部份，改变基础教育中独尊异性恋，忽略同性恋及其他家庭形式的现况。8. 成立同志资讯中心，以公共资源建立同性恋者的交流网路，并促进社会对性取向多元的认知和尊重。9. 劳动法令应明订不因性取向而有差别待遇，以保障同性恋的工作权。10. 拟定无性取向歧视的医疗政策，建立对同性恋者友善的医疗环境。</p>		
<p>同光教会</p>		
事 件 内 容	教 会 反 应	备 注
<p>1996.5.5 台湾第一个同性恋教会「同光同志长老教会」采独立于台湾长老教会之外的方式成立，成员八成是大学生。创立人杨雅惠牧师表示：「活传统教义中，同志永远都有罪恶感」，因为在点脑网路中的「Motss」版和宗教版常可以看到讨论同性恋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异性恋者竟是这样轻易的就可以引用圣经来「定」同性恋的罪，并视其为病态，令人难过，他认为圣经是人写的，而且可能是异性恋者写的。</p>	<p>基督教浸信会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表示，在圣经中视反对同性恋的，但他个人没意见。至于「浸信会」会不会接纳同性恋，他说：大概不会。但他又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浸信会」说话。台湾长老教会总</p>	<p>同光教会的成立挑战了圣经的教义及上帝旨意的定义与诠释。杨雅惠在教会压力下，宣告退出长老教会，将从事翻译工作及同性恋运动。</p>

事 件 内 容	社 会 效 应	备 注
	会牧师徐信得和庄淑珍都认为教会应该关怀同性恋者，庄淑珍更指出：传统认为同性恋是罪，是病态，但事实并非如此。	

四、同性恋运动所面临的社会反挫

从这个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并非所有与同性恋有关的事件都会出现反挫言论，而在以下这些引起反挫的事件中可以归纳出几个重点，以及引起反挫之事件的特殊性。

1. 同性恋团体拒绝成为被强势媒体所消费、偷窥的题材，媒体不择手段将同性恋者曝光，作为惩罚。

1992年3月，女同性恋团体「我们之间」于妇女团体主办之「我爱女人」园游会上首次以不现身方式亮相。媒体争相向妇女团体询问、打探，要求采访「我们之间」，均被拒。

1992年3月，「台视新闻世界报导」记者璩美凤(现任台北市议员)逕行潜入女同性恋酒吧偷拍，于播出时将女同性恋者曝光并加上负面的旁白。

2. 涉及权力结构的改变与资源重新分配

1993年12月28日，在「促进同性恋人权公听会」上，发言人

之一的何春蕤教授强调，异性恋霸权是历史性的产物，是可以被消灭的；异性恋的政治霸权应退出校园，应该把同性恋、双性恋纳入正规教育。之后，何教授接到黑函指责其为教育界败类（见〈促进同性恋人权公听会纪实〉）。

1995年11月，台大学生会举办「同性恋影展」，遭到校内部份学生抗议，认为：同性恋学生的福利被牺牲，学生会应该照顾多数人的福利。

1995年11月12日，台大学生会举办「椰林舞会」，学生会精心设计的「扮装舞会」，遭到部份校内学生反弹，他们认为：舞会不应该与同性恋扯上关系；因为同性恋是少数人，同性恋可以搞他们想搞的事，但请用自己的经费；这是多数人的意见，少数请尊重多数。

1996年2月，「同志空间行动阵线」针对台北市政府「首部核心区」的规划历史保存计划中，将新公园包括在内，在一连串的更新过程中，同性恋者将被迫离开新公园。「同阵」展开一连串行动，要求同性恋公共空间的使用权，以及参与公共资源分配。结果台北市政府都发处张景森处长不仅未给予善意回应，还将「同阵」的诉求矮化为：同性恋需要一个特定的聚会场所。并在媒体上片面透露「同阵」建议将位在西门的红楼戏院改建为同性恋俱乐部，引发红楼附近居民的反弹。

3. 涉及改变权力结构及校园内的学生公职选举

1995年12月，台大学代选举发生候选人被强迫曝光事件。两位政治性学生社团成员(并为工学院学代候选人)利用黑函攻讦部份学代候选人为男女同性恋者，并散发文宣。他们在文宣中以同性恋者自

居，要求学代候选人在竞选学生公职代表时，应该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同性恋者应走出黑暗与异性恋者在阳光下做朋友。

4. 同性恋教会的出现，挑战圣经教义及上帝旨意的定义与诠释

1996年5月5日，台湾第一个同性恋教会成立，掀起基督教教界的热烈讨论，长老教会一位牧师表示：圣经中确实谴责了男与男之间的性行为，长老教会是比较开放自由，但不管如何自由开放，仍然不能违反教义。有些同性恋教友质疑圣经是异性恋写的，对于这项质疑，绝大多数教友无法同意。

由上可见，这些事件之所以引发反挫，是因为这些事件所提出的具体诉求挑战了异性恋社会的资源分配，包括要求教育资源重新分配、同性恋主体进入学生政府、教会开放同性恋者空间、挑战基督教异性恋中心教义等。也因为如此，它们召唤出异性恋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歧视与恐惧，让同性恋恐惧症无法再隐身于「爱的教育」、「有教无类」、「民主、平等、尊重」等空洞的口号下，而不得不以反挫的姿态打压这些具体诉求。

五、没有出现社会反挫之结构原因

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追究下去：为什么其他的同性恋活动却未遭受社会反挫，其中甚至包括同性恋的第一次街头游行？其理由当然不是这些活动不具有同性恋色，也不是社会已经不再恐惧同性恋了（要不然为什么反挫在前段所述活动中具体发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活动产生不同的反应？在以下列举的活动和分析中，我们必须警觉，从这些未引发反挫的事件上所暴露

出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在深刻的程度上，是远远超过反挫本身的。

先举两个例子：

■1995年6月，台大同性恋社团举办「校园同性恋日」一整天的庆祝活动，共计有校内外人士一千多人参加，从义卖活动、剧场演出到座谈会等活动，场面热闹。在座谈会上及会后有一些同性恋者纷纷发出相同的疑问：为何同性恋学生并未成篇活动的主体，以及台湾同性恋者如何自我命名等议题。

■1996年2月，「同志空间行动阵线」发起，联合同性恋校园团体与社会团体（包括环保、妇运及其它社运团体）在新公园摆设摊位，共同参加「彩虹情人周活动」，共渡一个属于同性恋的情人节。

这两个活活动结束后，媒体皆大肆报导、频频示好，台大的校园同性恋日更被媒体拿来与台大A片事件相较，被誉为有格调而不低俗的文化活动。

以上这两个活动表现出以下的共通性：

1. 在形式上是庆典式嘉年华会，强调欢乐，走出悲情，比较没有撼动异性恋体制的态势。
2. 同性恋主体模糊。不引发异性恋社会的焦虑。
3. 没有抗争意图，没有明显的对立面，不具威胁性。

这么看来，社会对于同性恋做为一个「文化现象」似乎已完全接受。原因在于，当同性恋的活动是以表演或自我庆祝为主，而不涉及权力的争夺时，社会对同性恋活动的诠释就只停留在多元社会现象之一，把它看成一种文化表演。

虽然社会只把这些活动当作多元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现象而加以包容，但是这些活动并不是没有运动企图心的。快乐欢庆的活动是需要的，毕竟，它们可以扭转同性恋在主流文化中过分悲情的呈现。但是快乐是为了要孕育正面的运动主体、吸取动能、凝聚集体正面认同，进而转进边缘战场，是同性恋储备战力的练习。

可是，由于这些活动特意模糊主体，甚至异性恋也可轻易越界参与这一场表演，台湾社会于是好像展现它的多元风度，在文化上让出了一点点空间，任由同性恋者去挥洒——在固定时段、在固定场所；在另一个层次上，其实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视而不见。而在累积实力，凝聚认同上，主体的模糊也使得战力的储备松散失焦。

再看另两个例子：

■1996年3月25日，「同志工作坊」发起的「同志串连反歧视之约」游行，针对一份由卫生署委托研究者涂醒哲所进行的「男同性恋者流行病学研究报告」，对研究者不当的偷窥心态与充满歧视的问卷设计提出抗议。研究者面对游行队伍时，竟说因为他而促成同性恋者集体走上街头，他非常高兴。至于问卷数回收不足的问题，研究者辩称是因为不知道同性恋的母群体在哪里，并语带挑衅的质问在场有没有人是同性恋，先站出来再抗议。

这个事件之所以未造成社会讨论，形成社会议题，是因为爱滋政策的不当与对人权的侵害尚未成为公共性议题，而且爱滋议题在同性恋运动缺乏资源的情形下，并不是运动议程中的重要议题，于是面对公部门与研究者的敌意，甚至研究者利用研究同性恋获取研究经费等等不利局势，同性恋者都只能被动的反击。这种薄弱的运动能量——

对应掌握知识霸权的主流研究者——或许还不值得反挫的施力。

再提一个例子：

■1996年3月5日，女人100行动妇女公约公布，其中包含同性恋团体的诉求。在要求四组总统候选人圈选认同的诉求时，三组候选人在与妇女相关的部份都大有意见，但针对同性恋的诉求竟然照单全收！

3月7日女人100行动中，同性恋团体不仅喊出清楚的口号和诉求，如：打倒异性恋体制、拒嫁男人、拒生男子、同性恋要结婚权，却仍然引不起媒体讨论。终究淹没在总统大选的声浪中。

这样的现象似乎透露出同性恋尚未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政治人物自然敷衍了事。

以上这些现象，其实具体反映出歧视的另一种表现，那就是视而不见，主流文化使用它来否认同性恋的社会存在。这样的视而不见的另一个效应，对同性恋而言，造成了一种假象的安全，使同性恋以为歧视已不存在，或已减退。但是视而不见，代表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深沈恐惧，也代表目前异性恋的利益仍然十分巩固，丝毫不受到威胁。

六、同性恋运动政治化之必要

从遭受反挫的事例来看，当同性恋主体进入公共空间，抢夺权力与资源时，已成为具体的政治实体也因此对异性恋社会带来强大的威胁。如果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异性恋体制的压迫面貌也唯有透过运动的不断反抗过程加以导引揭露，才能将之改变、摧毁。

但是在目前的运动道路上，仍然有着许多障碍，许多同性恋主体、议题无法政治化。这些障碍非常复杂，包括社会常识、运动困境，以反个别同性恋者必须面对的焦虑：

1. 同性恋被视为属于个人床第之间的事。
 2. 个别同性恋者也许只会在私人网络内现身，但它也形成同性恋只是一种个人生活品味与生活形态的表现。
 3. 同性恋的可见度增加时，个别的、稍稍具有社会资源的同性恋者会害怕同性恋运动剥夺、伤害了他们目前的利益。
 4. 同性恋运动缺乏抗争历史的记录与整理。
 5. 现身（come out）对于个别的同性恋者，仍然是一道难以冲破的关卡，从事运动将丧失个人隐私权，甚至危及工作权，与家庭的关系。
 6. 缺乏常设性的运动组织与政治社群。
 7. 社会集体的恐同性恋情结，以及同性恋自身的同性恋恐惧。
- 显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参考书目

〈台大强迫曝光事件调查报告书〉，WALE 同志工作小组，1996 年 5 月 1 日

〈促进同性恋人权公听会纪实〉，同志工作坊，1993 年 12 月 28 日

《女朋友》双月刊，第五期，1995 年 6 月 10 日；第九期，1996 年 2 月 15 日；第十期，1996 年 4 月 15 日

《童言无忌》，第二期，同志工作坊，1996 年 4 月 15 日

《妇女新知》月刊

情欲的文化资本与身体驯训

——技职教育体系中青少年的性／情欲

古明君

一、前言

在 90 年代中期台湾特殊的消费资本主义与政治空间中，「青少年」诞生了；「新新人类」、「打造青少年空间」以及各政党竞相举办的「飙舞」、「青少年晚会」、「青少年高峰会议」、「全国青少年代表大会」……商品行销与政治论述以世代为分界标定出「青少年」主体。然而，在这些相关的论述中，「青少年」这样看似中性或无性的名词所指涉的经验和描摹的主体，往往只是「青少男」，而且其中并无阶级差异。少数凸显性别差异的，是与「青少年的性」相关的论述，在其中，青少年要不被说成是「无知而纯洁、需要保护的小孩」，就是被当作「性精力旺盛、性活动频繁、只要她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新新人类」。

自 1994 年性解放在台湾掀起论述的浪潮，女性作为性／情欲主体，性解放论述透过勾勒女性的性／情欲处境，建构着女性作为性解放运动主体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在这样的性／情欲论述中的女性情欲经验，包括了外遇以及不在婚姻关系中的性、性骚扰与童年性经验、老年女性的情欲人权……。但是由于缺乏青少年情欲经验，以及未将她们的性经验放回打工经验、家庭生活、情感与亲密关系中思考，台湾现阶层性解放论述存在着青少年情欲盲点。

本文由技职教育青少年的生活经验出发，跳开「清纯需保护 vs. 放荡待导正」式的青少女性论述，希望透过在年龄、阶级差异之中的女性情欲经验初探性的质化研究，分析她们的情欲处境，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性别与性的逻辑。

二、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

(一) 谁是技职教育下的青少年？

讨论技职教育里的青少女性／情欲经验之前，必须先面对一个长久以来讨论女性情欲时极易落入的死胡同：也就是假设台湾的情欲解放运动只适合「中产知识女性」，而处在政经及弱势的位置上的「基层劳动妇女」，是毫无物质基础来谈所谓的情欲解放的。基本上，这样的思考方式建基在以阶级（而且往往是经济阶级）一刀两分的将女性二元对立化为两种女人，并伴随将所谓的「基层劳动妇女」情欲处境同质化与弱化，便绕过不再继续分析其中的性与性别逻辑，以及其性／情欲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透过访谈、成长团体及课堂小组讨论时直接面对这些尚在五专高职求学、未来将成篇「基层劳动妇女」的青少女时，她们的分殊与多样性彻底动摇了把「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同质化的可能性，所谓的「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有的乖乖念书想学一技之长、有的是白天工作七、八小时晚上来学校混一张文凭、有人没有男女朋友也有人已经结婚、有单纯涉世未深的、有跷家多次的、也有在社会版

上可以看到和她类似的故事的——我们无法假设有一种女人叫做「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然后来测量「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的性知识与性态度、或是来检定所谓的「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玩不玩得起性解放的游戏。

然而，访谈中看到的青少年的情欲经验仍然有其特殊性，与年纪更长的女性、升学体系中的青少年、以及技职体系中的青少年相比较后，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情欲处境特殊之处便彰显了出来。换言之，情欲处境并非真空的存在，讨论技职教育里的青少女性／情欲经验并非标示出某一特定群体来检验她们的性，而是将女性情欲处境的差异放回年龄、性别以及形塑劳动力的技职教育等诸多建构差异性的社会关系中来思考。

（二）技职教育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技职教育体系，指的是五专、高职、四技、二专、三专及其研究所组成，有别于高中、大学的独立体系；台湾的学制在高级中等教育安排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与课程分类：五专、高职、高中，使部分学生义务教育之后即进入以职业技术培养为教育目标的技职教育体系。

自民国四〇年代起，为配合达成不同时期台湾经济建设目标所拟定的人力资源政策，职业学校数目增加而普通高中相对冻结，同时职业学校持续扩张工业类科（谢小苓、张晋芬、黄淑玲，1995）；高中职的学生人数比例，由五十六年度的六比四，到六十年度的五比五，到 71 年度迄今的三比七，如果加上五专前三年学生数，最近十几年间技职教育学生人数一直占就学人口四分之三以上（林文瑛、王震

武，1995），技职教育青少年人数正是在国家强力主控下由教育部门执行人力资源政策的结果，作为国家达成经济目标的工具，技职教育即是劳动力驯训的过程：教育的效果是经由意识形态的灌输，生产技能的培养以及行为态度的驯化来达成。

作为个人取得文化资本的途径，不同阶级、种族、性别者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皆间接关系着社会关系复制或阶级流动，许多文献中都提到技职教育的升学管道狭窄，学生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谢小苓、张晋芬、黄淑玲，1995），根据观察，在经建人力规划下持续扩大的工业类科（如电子科、资讯科、电机科、机械科、汽车修护科）学生以男生居多，而女生较多科别则是商业类科（如商业经营科、资讯科、国际贸易科、广告设计科、会计事务科）、医事护理类科、家事类科（如幼保科、美容科、服装科、家政科），在报考与选填时就决定了技术训练阶段即开始的劳动力性别分化，加上作为象征性文化资本的文凭往往作为特定职务所设定的进入障碍，因此技职教育中培训的劳动身体是性别鲜明的。

三、青少年的身体驯训

（一）青少年、性别身体与情欲空间

在台湾，年龄以及结婚与否，对女性是否与父母同住，起了相当决定性的作用。

访谈中认识的五专和高职青少年，不是与家人同住，就是住在学

校宿舍或公司宿舍里，没有一位是单身租屋外住，当问到她们「为什么不搬出来住？」或「有没有想过要住在外租房子住？」时，有些人表示没想过，还反问「你们是怎么跟家里讲说要搬出来的？」，有些受访者明白的说因为父母不放心，因此在当初报考职业学校区域联招以及考后选填学校时，父母以非常主导性的意见或强制的方式，让她们念可以通勤或住宿的学校。多数的受访者学费、生活费都是由自己打工赚来的，经济上的考量应该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她们得找有提供宿舍的工作来半工半读，同时减省住宿的花费，或者因此非住家里不可。

住在家里的青少年们的时间、空间和身体不仅紧密的受到家庭的管束，同时也更赤裸的展现着家庭内部性别与亲子间的权力关系，比如某位受访者对她家里空间分配的描述：这个高职女孩由于妈妈离婚，所以是随外祖父母同住，他们家里一共三个房间，一间是给外祖父母住、一间套房是给舅舅住的，另一个房间里就挤了她、妹妹、妈妈、还有阿姨。另一个受访者则说：只要爸爸心情不好，就打她出气，而且有时候明明是弟弟犯错，她也会因此受罚。

由于亲子间的权力关系，青少年在家中的情欲空间与身体自主权压缩到几乎等于零。一个已经休学的受访者有个很要好的男朋友，在交往中她意外有怀孕了，因此父母帮她办了休学，并且每天钉着她的行动还有电话通话情形，后来因为妈妈跑进她的房间翻看日记，发现她仍然还有和男朋友联络，因此非常生气，扬言要告那个小男生。父母对子女监管的合法性，不仅是来自社会对家庭的观念，而且是由法律提供、具有强制性。包括与 14 岁以下少女发生性关系为准强奸

罪，可由父母提出告诉，或是家长可向收容跷家青少年者提出妨害家庭告诉。

父母对子女的情欲监管虽然展现的是亲子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其中还是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有一个受访者提到了她的同学与男朋友之间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

我们（女）同学有男朋友的，都没有跟家里讲，可是男生就相反，他们家里会知道他有女朋友；还有一个好夸张啊，他妈妈还跑到学校要来看他未来的媳妇长得怎样，一直问他儿子「是哪一个、哪一个啊？」……我另一个（女）同学，她常常去男朋友家过夜，她（跟我们）说她都去叫他帮她写作业，……她和他们家熟到他们家的狗都认识她了，他们家里好像都不会怎样，可是她家都不知道她有男朋友。

由于家庭对青少年情欲监管，受访青少年情欲活动或情欲关系全都是瞒着家里，除非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地步，是不会把男朋友带回家去，可是对于儿子带女友回家，听到的情况，父母的态度几乎都很宽松。

如果说，家庭对青少年进行着情欲身体的管训工作，那么，当部份女孩离家外住时，身体的管束权就交到学校或雇主的手上；然而，技职教育里的学校生活其实不仅是在进行情欲的管束控制，更重要的是，在驯训一个柔顺的劳动者身体。被访问的一个五专女生告诉我们，她的学校宿舍是六个人住一间，寝室里规定只能有四样电器（台灯、吹风整发器、收音机、电风扇）、白天去上课时寝室桌上不能摆着镜子、书要整理好，其他还包括：被套和床垫使用学校规定的样式、棉被有固定的折法（印有学校的校徽的那一面朝上、校徽一致朝

外、豆腐干型、折不好时还要出棉被操)以及固定的起床、就寝、上课、晚休的时间,宿舍门禁是十点半,十一点半后熄灯。规矩清楚、严格执行;由于住校,交了男女朋友的同学除了校园以外也没别的地方约会,所以情欲的管制就由教官来执行;受访者说:教官会在上课时以道德教化兼嘲讽的语气对大家讲:有些同学躲在草丛里亲热,害他常常要拿着手电筒去巡逻,还要同学们不要在校园里抱得那么紧。另一个高职学校由于以商科为主,成为一个女生居多的学校,因此,学校还会要学生把地板用牙刷刷到发亮,来保持一个女生应有的明亮干净的形象。

这两所学校是在职业学校中入学成绩比较高的学校,也是将来当学生要就业时,雇主比较欢迎的学校之一,而在学校生活中,透过要学生学习服从、柔顺的接受身体的制式安排,以及情欲的管训,来进行这些劳动者的性别身体、情欲身体和劳动身体的管束与训练。

和这两所明星职业学校不同的另一所私立高职夜间部,由于学生处于技职教育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夏乐祥,1995),劳动身体的管束与驯训不是经由学校内部对学生身体的直接操练与摆置来进行;夜间部校园行政主管援引「社会控制」说,认为「夜校的存在,至少使许多原本在晚上无所是事的年轻人,不会在街上游荡,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相当正面的助益」(夏乐祥,1995)。每天晚上,上了一天班的学生进入夹杂在烦吵的台北街头巷弄的校园,开始学生身分;在我们对几个班上的学生做的问卷里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白天都在工作,少数目前没有工作的也不是不须工作,而是处于临时的失业状态,为了一张文凭,每天来这里坐个四小时。学校对夜间部学生只进

行最基本的身体规约。包括点名、校门口服装仪容检查、卸下大哥大BBcall，至于学生的劳动身体，早已在劳动市场中驯训。相较于升学导向的高中对于女学生进行去性欲特质的身体管训，该校夜间部对这些已经上班的女学生的身体，除了要求着制服得以分辨谁是学生之外，几乎完全没有其他规训。这些青少年劳动身体的性别与性欲特质，早已在劳动市场中进行，因此在教室里可以看到在休闲服务业打工的青少年们，身上除了皮包、小钱包外，还有化妆包，随时掏出小镜子补个妆，或拿出小剪刀修剪分叉的头发，略带风尘味地进行高度女性化的身体操弄。

（二）打工：劳动身体的性与性别

技职教育的分科与教育内容似乎在培养基层的技术人力，然而，就全女联青少年计画访问技职教育中的女孩们的打工经验看到的是，她们所能找到的工作几乎都是底层的服务业，包括 KTV、保龄球馆指导员、三温暖服务生、7-11、麦当劳，或是底层粉领族，如贸易公司小妹、总机。

为什么要去打工？男学生和女学生的差异似乎并不大。在私立高职夜间部的学生回答的问卷里，有一个选项是每一个人都勾选了的：如果不去工作，生活费、学费会没有着落。其次是不去打工父母会唠叨，再其次则是想有工作及社会经验。基本上，夜间部的学生一天几乎都工作 6 到 8 小时，所以有学生直接说：我不是打工，我都做全职工作。

打工经验中最大的差别，是男学生和女学生做过的工作。女生多

了像电动游乐场开分员、公司小妹、总机等工作，而男生比女生则多了一些工作：各种学徒（泥水、装潢、厨师）、在自己家里的生意帮忙学习（卡车司机、会计事务）。

打工的内容呈显出性别分化，而且与所念的科别全都无关，当问到「打工的工作可以学以致用吗？」时，只有非常少的同学回答「多少有点关系」。

访问另一个学校日间部的女学生时，也有同样的回答：打工的工作内容和学校教的，没什么有关的。这个受访者念的是资料处理科，学校教的包括 DOS 指令或文书处理等商用软体的使用操作，受访者使用特定的软体并把环境设定好时 key in 速度很快，但是当换使用 Word 时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技职教育技术训练的，是一种手脑二分、当下即用、无法面对产业环境改变的所谓「一技之长」。

大多数的受访者不停地换工作，许多受访者同时表示毕业后也不会继续现在的工作，由于所学与打工无关，打工市场里的年轻女孩提供的是用后即丢可抛弃型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性劳动力，私立高职夜间部受访的青少年们所能找到的，几乎都是一天六到八个小时、工作酬劳月薪一万六千元到一万八千元，局限于基层服务业、低技术的工作，或者是和性服务界限模糊的工作，像是 KTV 公主、酒店公关等。

在我接触的高职青少年里，有好几个因为受不了家庭气氛（「他们就是什么都要管」）或单调而无趣的学校生活（「我就是不想念」、「我想早一点独立」）而试图逃离这样的生活，她们采取的方法是跷家。在跷家之前，这几位女孩其实都用过一些方式来表达自己

的不满与不快乐，包括和家人抗议无效而引发的争执和火爆场面甚至数次自杀，因此，她们离家出走的过程并不像媒体上往往出现的「交了坏朋友成了跷家坏女孩、最后沦落声色场所」主流的跷家青少年论述。由于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跷家女孩往往先寻求同学朋友短暂的收留，而后立刻必须开始自行谋生。在年龄与文凭限制下，跷家女孩在市场上所能找到的工作非常有限。一个最近才刚跷家的受访者说，她在西门町找了几十份工作，内容全都是服务业（7-11、售货小姐），可是由于还没有年满十八岁，没有人要请她；而另一个和妹妹一起跷家的女孩则是打两份工，白天在提供住处的 KTV 打工、晚上去便利超商工作，才能勉强养活自己。其实，跷家之后的青少年，为了谋生，立刻面临到劳动力市场上青少年劳力位置中最赤裸的现实逻辑：在年龄、文凭、性别的限制下，为了谋生，所能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都是最底层的服务业、还有性服务业与色情产业。

四、高度性活力与低度情欲文化资本

当全女联在某高职夜间部带小组讨论「婚前性行为」时，我们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在同侪中讨论「性」的话题时，男生较常用夸耀的言词来吹嘘性关系。而女生则几乎不发表清楚的意见，往往以提问题的方式来表示意见，或者强烈地以睡觉或作出不屑的表情动作来抵制这样的话题。

而对「性」话题的吹嘘性言辞，常常不一定直接反应这些男同学在真实生活中的状况，课堂上有男同学表示，对他们谈婚前性行为其实并不合适，因为「都还是暗恋、不敢去追，没什么经验」，而且还

说「像我们老师这样的男生，女生才会喜欢，而像他们（班上的同学们）这样的男生，女生不会喜欢」，因为「（老师）长得斯文、有学历、成熟……」。在这样的说法中：性行为 and 爱情是分不开的，而爱情，是有一种市场关系在其中，不管说法和理由是什么，他们都明显的知道自己在爱情竞争关系中的弱势位置，只是未必说明得清楚爱情市场的逻辑以及自己在爱情市场中掌握的资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些技职教育里的青少年只是以夸耀性言辞、吹嘘自己的性经验来建立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建立男生之间相互关系最现成的方法，就是去践踏女性和强调自己的（男）性雄风。

相对于男同学夸耀式地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女学生之间即使是私交很好的几个朋友自发形成的谈心小团体里，也不谈「性心情」，青少年男女间不同的情欲文化资源网络展现为同侪小团体间的次文化，而且文化商品的消费形式亦不会改变女同学所处的性资讯封闭的个人状态。受访女同学性幻想的素材最主要就是罗曼史，也有的是电视、电影的情节，也有一些女同学偶尔经由电视第四台看到 A 片，而且表示第一次看到 A 片时心情「很震惊」，只有极少数的女同学阅读将性解放论述商品化与通俗化的都会女性杂志。

在课堂上，全女联的同学发了一份小问卷，想知道他们对「豪爽女人」、「真爱运动」、「情欲人权」、「安全的性」等性论述的看法，相较于问卷的其他题目的回答状况，这几个名词的作答，甚至不是不同意或反挫，回答的内容透露出来所有的同学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名词。比如说：问到对「豪爽女人」的想法，有人认为是「对朋

友很好、重义气的女人」「大嗓子、酒量大」，或者有人回答「真爱运动」是「作爱」，回答「安全的性」是「婚前没有性行为」「避孕」，对这些白天忙上班晚上混文凭的夜校同学们、或是访谈中说自己从不看影剧版和生活版以外的报纸版面的青少女们，无论是透过人际网络或是文化消费，无论是解放的情欲论述、或是保守的性道德运动，她们的可及度都非常低。关于性与情欲的论述空间与他们并无交迭。

所以，当把「真爱运动」出成考题：「『因为真爱，从现在起，不试婚，不同居，婚前没有性行为，婚后没有婚外情。』这是台湾部份基督教和医界发起的『真爱运动』中的『真爱宣言』；真爱运动呼吁社会大众成为『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同时对『性与婚姻』要有更多的承诺。请问你／妳是否认同这项活动？为什么？」，女同学的回答中，几乎全都认同这个活动。同时反应了最主流的性／情欲思考模式，和性欲与性别逻辑。

比如说：女性对性的务实逻辑，认为性行为需要由婚姻做保障、不在婚姻中的性将受「社会歧视」。

我认同，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每个人都很好，因为在婚前性行为的话，不但没有保障，而且还会遭到别人的指指点点。(女同学的回答)

.....有些人未曾想过后果为何，等做后，才知后悔莫及！（女同学的回答）

认同，当一对情人在还没有结婚就同居的话，过了一段时间，感情就不会比在一起好几年而不同居的人好。因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多，摩擦也就越多，而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到了真的要结婚时，你也会考虑是不是应该结婚。结婚是双方所选择好了才作出的决定，既然双方都同意就不应该有婚外情。(女同学的回答)

性与婚姻的紧密相关，也反映在一些女同学同意「试婚」这样对婚前性行为的修正式说法，在这些回答中，同居试婚和婚前性行为最大的不同在于：性可以在婚前发生，可是在「将来可能结婚」的前提下进行，而且有助于认识未来的婚姻伴侣、减低离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是为了促成持久的婚姻。男同学的答案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属于这一类的回答。

我认为先试婚与同居也没什么关系，但应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因为先和对方同居，才可更了解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有什么不合还可即时挽救，不要说结了婚后，才发现不和才离婚。（女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不太认同，因为不试婚怎知是不是好太太，如果婚前和婚后不一样那大有理由试婚。（男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试婚是必要的，因为试婚跟结婚差不多，而且可以从相处中知道双方到底能不能包容对方缺失，不行就分开，就不会发生离婚，所以不赞成这活动。（男同学的回答）

认同也不认同，因为，不在先前试试看怎么知道婚后「合不合」得来，但又由于现今青少年太爱试了，所以造就了太多不幸家庭、无辜小孩、和医生许多 A 钱机会，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or 多存点钱以防万一。（男同学的回答）

也有相当多女同学的回答，将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与怀孕、与未婚妈妈、与社会问题连上等号：

我当然同意，婚前没有性行为比较好，现在的男女讲求速食爱情，像速食面一样，一冲即可，「情不自禁」使得青少年在对于婚前性行为有很大的好奇，未婚的妈妈是越来越多了，婚后应忠于自己所爱的人，不可有婚外情，既然当初你决定和他共度一生，就不要再和别人有任何瓜葛。现在的「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几乎没有了，将来社会出现了「乱伦」可

就天下大乱了。(女同学的回答)

我是认同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实在太乱了，未婚妈妈一大堆，生下的孩子又没人管，造成社会的负担，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很乱，因此这个可以让社会变好的活动，这有何不好的。(女同学的回答)

我完全认同，因为我周遭的同事、朋友，发生过很多婚前性关系而造成婚姻的不美满，成天打闹、充满暴力，影响下一代的身心，虽然随着社会的繁荣、开放，造成多件不幸的事件。应反对婚前同居……等事项(女同学的回答)

而回答不认同的女同学，大多数是在真爱的定义上打转，这些回答反映着女同学对于爱情的浪漫期待。相较之下，几乎没有男同学在回答中描写他们认为「真爱是什么？」，他们即使不认同真爱运动，反映的也是对性的真实需要。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认同或不认同，因为有些是情势无法自己决定的，只是你用什么心态去做，其实一生中或许有很多交男女朋友的机会。但自己真心所爱的确不多，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无悔那一切顺其自然。

(男同学的回答)

……很难实现，真的能做到婚前没有性行为活动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果真能做到那我很佩服他，至于承诺，讲多了会成谎言，做得到才是最重要的。(男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真爱的定义并不是试婚、同居、外遇的问题，对另一半有责任，和真心的包容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互相着想、体贴，相信真爱不是一简单的运动所能唤起的。(女同学的回答)

在描述「真爱为何」这一类的回答中，不仅爱和性是分开的，也去性欲化的谈论对爱情的高度憧憬、以及爱情与婚姻的高度关连。所以另一个赞成这个活动的女同学说：

……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是一项好的活动，而且你爱他才会嫁给他，……

在所有同学的回答里，只有一个女生的答案特别有趣，她是这样说的：

我本人没什么太大的意见，因为我觉得，狗教得不好，这一定和主人本身有关，所以不能怪别人，而且苦苓说过一则故事，如果宪法改为不准离婚及试婚及婚前性行为，连睡觉时都不可以做春梦，都要服用卫生所开出的「不会做梦的药」，如犯下以上大错，将判刑不然就罚金，半夜也不准外出闲逛，如果真的这样，我相信新好父母及新好青年这一代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了，但太可怕了，如果我是婴儿就没差了。（女同学的回答）

在所有的回答中，这是唯一一个从性控制的角度来谈真爱运动，而被她引为支持的基础。既不是性解放论述、也不是情欲与身体自主的女性主义，而是苦苓的论点。

有些受访者提到上课无聊时会玩的一些身体游戏，多是青少年同侪之间自发性发展出的某种透过身体进行人际互动的方式，这些身体游戏显露着青少年们对性与身体的高度兴趣。然而，青少年高度的性活力，相应着的却是起因于情欲文化资本的贫瘠而对性的保守态度、或是起因于情欲活动品质的低劣而生的悲观低调的性心情，在访谈中，一直有交男朋友的受访者有些怀疑而无奈地说她和男友之间的性活动「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

生活在另类情欲论述可及性低的人际网络与文化消费方式中，最保守的性逻辑继续在她们身上运行，包括深化的处女情结、或是认为「性应该建立在爱之上，那些随便就和别人发生关系的女人，就像公

厕一样」、「小孩是无辜的。不赞成堕胎」，即便已经有身体经验，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感觉、快感、欲望……基本上是悲观的，而对部分有同性情欲经验的青少年，由于同性恋的污名，以及 A 片等粗糙的情欲文化素材将女女性爱中性化，加上由同性恋主体出发的文化商品在形式与可及度上仍属小众，青少年们往往在「我这样算同性恋吗？」的问题里打转。

五、结语：差异的性政治——阶级、年龄与性别

台湾的情欲解放论述被不少人批评过于中产取向，然而将经济资本视为情欲解放的决定性物质基础是非常荒谬的论点。不同的女性的情欲处境当然有差异性，然而这些差异并不必然是单向由经济阶级属性决定，往往是建基于异性恋父权体制中的性／情欲逻辑与其他社会关系交互渗透之中。

讨论技职教育青少年的情欲处境时，社会关系建构所展现的差异性包括年龄、以及既是劳动力身体养成又是取得象征性文化资本（文凭）的技职教育。对青少年来说：我们无法抽空现实地思考青少年是否足以累积身体经验为情欲资本；家庭的强制性监管，青少年具有年纪、性别、性欲特质的劳动身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摆置的位置，以及同济之间的身体次文化——青少年的身体经验是在这诸种社会空间中构筑出来。

性政治权力关系的施行绝不仅仅简单是剥夺与控制的对立关系，相关于性的各式论述并非外在于青少年。以压抑、限制来规整青少年的性状态；医疗与性学教育、性解放论述、情欲与身体自主的女性主

义、同性恋论述、性道德重整的新右派，……这些相关于性的各式论述相互竞逐，而成果即是性欲主体成为论述的道成肉身，以该论述的逻辑来述说「性」。各式性论述的行进方向与方式编织着情欲文化资源网络，而由不同的性欲主体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关系着情欲文化资本取得方式与内容。技职教育青少年情欲处境与其处在情欲资源网络边缘位置有相当大的关系，另类情欲资本的可及性低，可以取得用以表现身体互动情欲传达的形式单一，在她们身上运行的往往是最保守的性逻辑。

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差异性，不仅使男性与女性之间情欲的身体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质与量不同，不同的年龄、阶层生活经验、婚姻状态的女性情欲处境也存在着差异，站在这样的差异上才得以继续分析女人身体的情欲经验、不同的情欲文化资本的可及度与女人之间情欲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及去思考不同的情欲位置上的女人情欲解放的基础及可能性。

（本文中对技职教育体系中的青少年观察访谈的资料来自作者参与的全国大专女学生行动联盟青少年计画。特别感谢自始至终参与计画的辅大女研社、文化女研社、东吴城区部黑水沟社同学，和毕业于各女研社的刘慧君、赖俞蓉、石秀娟、范雅竹的共同访调与讨论，以及佐苗夏乐祥提供的协助。）

参考书目

台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

1996 1996 台北市中学生性态度问卷调查报告

江福清

1993 高职学生性别角色取向、生活角色重要性与生计成熟之相关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研究所硕士论文

何春蕤

1995 由清欲沙文主义到情欲正义，《中国时报》，民 84 年 4 月 12 日

林文瑛、王震武

1995 分流教育的社会效果，发表于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分流教育」学术研讨会

林芳玫

1994 美丽「性」世界？，《中国时报》，民 83 年 10 月 13 日

夏乐祥

1995 今夜星光是否依旧灿烂？从东方工商夜间部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看高职教育改革的问题与前景，佐苗记事，未出版

郭力昕

1995 (1) 谁能玩性——压抑与解放之间的杂音，《中国时报》，民 84 年 2 月 13-14 日

1995 (2) 二元对立又一章——对何、张二文的几点意见，《中国时报》，民 84 年 4 月 4 日

傅大为

1994 风声与耳语，《当代》104期，民83年12月

张娟芬

1995 《豪爽女人》谁不爽，《中国时报》，民84年3月8-11日

谢小琴、张晋芬、黄淑玲

1995 政策与职业学校的运作，发表于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分流教育」学术研讨会

魏慧美

1993 高中学生性格及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对其性教育需求之调查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

反性骚扰运动的骚动主体

王苹

- 一、反性骚扰运动大事记／女人抗暴实例
- 二、社会反挫结构分析
- 三、反性骚扰运动策略
- 四、反性骚扰运动与父权结构的辩证关系
- 五、结论

一、反性骚扰运动大事记

这是一篇讨论运动和运动者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以一个运动参与者的身分，试图整理反性骚扰运动，以期为运动提出另一个思考方向（注 1）。这里所谈及的反性骚扰运动，仅指目前已发生的公共行动，应该仍有更多的抗争火苗在其他位置上燃烧着。反性骚扰运动只代表一种妇运的一个面向；谈论它，亦是意图以它为起点，做为妇运对话的开始。毕竟，妇运不只是「一种女人」的妇运，妇运必须不断的自我发现扩大之必要性，而扩大的意义就是让原本性别压迫机制中隐讳、看不见的东西能够被呈现。

对妇运而言，从来女人的经验即是运动的基础，女人被骚扰的经验就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理论基础。可是，女人没有安全感是有其结构原因的，女人在社会中存在恐惧、害怕，正是父权社会女人无权的例证。

大野狼、景美之狼、社后之狼：既是特殊也是典型的例子。当狼

出现时，女人的害怕被凸显、被集中，并被鼓励将害怕再次练习、强化。

所以女人对抗狼——正是对抗害怕的一个起点。

以下以妇女基金会出版之妇运刊物《妇女新知》月刊为主要参考资料，整理出历年性骚扰事件及反性骚扰运动大事纪：

1989 年——高雄某船务公司徐姓经理性骚扰会计罗玉娥案

1990 年——清大女研社发起小红帽运动、台大女研社发起小红帽运动、新竹远东纺织新埔织衣厂女工彭菊英因抗拒性骚扰被解雇案

1991 年——竹东镇员工消费合作社雇员陈瑞贞拒绝主管性骚扰被解雇案、华航空姐遭航医中心主任何邦立性骚扰案、台大护士集体抗议骨科医师性骚扰案

1992 年——台大社会系老师于课堂上以言语性骚扰女学生案、兰屿国中校长性骚扰女学生案、中兴大学夜间部学生遭老师强吻案、东海大学夜间部体育老师性骚扰女学生案

1993 年——女秘书被强暴案、中原大学英听老师性骚扰学生案、中兴纺织主管性骚扰外籍女工案

1994 年——师大女学生被黎姓教授强暴案、中正大学历史所雷姓教授对女学生性骚扰案、彰化东湖国小老师强暴女学生案、东吴大学商学院夜间部老师性骚扰女学生案、台北市某私立诊所院长性骚扰女病患案、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李璇控告胡瓜强暴案、文化大学艺研所梁姓所长性骚扰助教及学生案

1995 年——台北电台台长鞞榕生性骚扰女职员案、女消费者于钱柜 KTV 女厕所被偷窥案、七海旅运社陈姓主管性骚扰邹姓女职员案、立法院立委魏镛至女厕所偷窥案、台大商研所学生吕安妮控告洪姓老师案、成渊国中男学生集体性骚扰女学生案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一次又一次的性骚扰事件及反性骚扰运动出现下，反性骚扰的运动主体似乎已然建立，妇女对于身处性别歧视社会中所遭受不公平对待，已能主动予以还击。在 1984 年，顾燕翎曾指出：「老祖宗们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竟敢开座谈会、写文章，公然讨论（性骚扰）此事。」（注 2）

这些运动主体包括工作职场上反抗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女性劳动者，校园中、课堂上反抗性骚扰的女学生、女助理，医疗场所内反抗性骚扰的护理人员、女病患，以及消费场所中的女消费者，她们正以反抗性骚扰行动逐步成为公共空间中的主体。

二、社会反挫结构分析

时序进入 1990 年代，性骚扰的概念已逐渐被社会接受，女人反性骚扰主体也越来越清楚。但是父权社会并未就此罢手，反而以更直接的手段反制起而抗争的妇女，试图阻止、打压反性骚扰主体之出现。各种父权社会反挫行动伴随着女人反抗性骚扰于焉展开。以下依时间先后顺序列出个别性骚扰事件其遭受之社会反挫行动及事件最后发展：

案 件	社 会 反 挫 行 动	事 件 发 展
罗玉娥案	公司不予受理 司法判决：性骚扰案证据不足	徐某被判无罪
华航空姐案	利益团体背后操控 有心人蓄意报复	以「双方各说各话，缺乏客观证据」裁定性骚扰案不成立
女秘书案	女秘书应对自己工作范围有正确认知 立委为妇女选票而介入	方某被定以轻罪，其它涉案人未被判刑
师大案	发生多次性行为，不算强暴 女学生向老师勒索不成的报复行为 黎教授太太控告女学生「妨害家庭」 法院以「发生多次性行为」为由，将女学生起诉	「妨害家庭」官司仍在进行中
中正大学案	对肢体语言的认知不同，非性骚扰 学校内部学术权利斗争	行政当局指出「被申诉教授在行为上有性骚扰的倾向」

案 件	社 会 反 挫 行 动	事 件 发 展
胡瓜李璇案	李女借此打知名度进入 演艺圈 演艺圈内斗，欲消灭胡 瓜势力	证据不足，胡瓜获不起 诉处分
文大梁教授案	西方文化肢体语言不同 梁教授控告学校及指控 之学生和助教「诽谤」	校方解雇梁教授 「诽谤罪」获不起诉
台北电台案	政治阴谋	监察院通过对靳某之弹 劾案靳某被惩处休职二 年
钱柜 KTV 案	此为顾客之间的事，应 由顾客自行处理 店内为公共场所，无从 防范	钱柜致函消费者道歉， 并承诺改善
七海旅运社案	公司不予受理 陈姓主管控告邹女士 「诽谤」	劳工局裁定「性骚扰申 诉案」成立 「诽谤」官司仍在进行 中
立法院女厕偷 窥案	此为政治事件，有心人 恶意抹黑以影响国民党 党内初选	不了了之

案 件	社 会 反 挫 行 动	事 件 发 展
台大商研所案	吕女利用王某权势、财势 吕女利用媒体累积资源 进入王某家族 学术圈内斗争 台塑集团内部权利斗争	台大调查委员会报告指口试过程略有瑕疵，堪称公平，对性骚扰一事指其飞委员会职责

(资料来源：妇女新知基金会)

在这些事件中，清楚可见的是父权反挫势力的庞大以及其与日俱增的对应技巧。其中除了台北电台案、七海旅运社案因公权力强力介入，得以确立性骚扰属实；钱柜 KTV 案因消费者诉诸媒体，商家顾及营业形象给予回应之外，其他各案都是不了了之。而社会反挫行动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反控被骚扰者「诽谤」。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能够谈论性骚扰的基础条件是劳动人权之成立，而在没有劳动人权的社会里，性骚扰的议题很容易被污名为诽谤。

在 1995 年「谁在帮助性骚扰——检视性骚扰事件的社会反扑」公听会上，邱晃泉律师由法律观点就提出：「对于遭受性骚扰的一方，当她提出控诉时所面对的层层阻碍包括：法律规范不够周延，法院能力不足、诚意不够，因此现行法律制度已变成性骚扰的共犯。」(注 3) 没错，父权正是以旧道德和现行法律为工具，一面怀疑被骚扰者的动机，一面将被骚扰者控以「诽谤」之罪名，以扩大骚扰者的权力面，进一步扩张父权。被骚扰者在被控「诽谤」的压力下，被迫噤声

不语，无法为自己发言，恐怕诽谤会因而成立；骚扰者则理直气壮的大声否认骚扰罪行，还要求法律「还他清白」。

反挫之力使我们对反性骚扰运动的复杂权力抗衡更敏锐思考观察。当反性骚扰运动在个别的妇女及妇女团体发动之后，不只是已被骚扰或潜在会被骚扰的主体召唤出来；清楚可见的是，在同时，骚扰者及潜在骚扰者的主体也即时的被建构出来，形成了针对性骚扰议题的各种「主体说法」。

在师大案中可见清楚之例证：当妇运团体提出包括：支持女人、调整师生两性关系、要求成立防治性侵犯专责机构、专业辅导人员、校园安全等诉求时，另一股更大的声音则来自于维护教授利益的师大校方及教育部，透过媒体炒作，形成了社会舆论。这些反挫说法包括：师生恋非性骚扰、女学生挟怨报复、学术恩怨、性骚扰无法界定、如果查证不实要写海报女学生负法律责任、校园被性骚扰骚扰了。换言之，父权社会运用其既有之强势在抢夺解释权，进行对性骚扰之定义；同时，对被骚扰主体作负面诠释，以扩大骚扰主体的正当性。在反性骚扰的议题上，妇运进行的正是一场和父权社会争夺诠释性骚扰之角力战。

三、反性骚扰运动策略

这种解释权之争夺战，促使我们对运动策略也必须有细致的分析。在不同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社会空间之改变，妇运面对性骚扰议题所采行的运动策略、产生的论述以及对抗行动亦有不同，由历史来看可分——前期（定义性骚扰、个案揭露）、中期（要求制度性保

障)、近期(妇运内部差异之呈现、运动之多元化)。

前期：1980年代初，妇运者开始为性骚扰命名，定义性骚扰(发问卷、做调查报告、出小手册)，并鼓励女人说出性骚扰经验，勇于揭发性骚扰。但是对于个案的想像则是一个纯粹、绝对的受害者，她在父权的压迫下无能／力反抗。根据1982年至1984年出版的《妇女新知》月刊上的记录，当时所提出对于性骚扰的论点包括：要研究和防范那些强凌弱的性问题；妇女有权要求社会建立一个法则，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要协助受害者面对自己内心所受的伤害；唤起民众加强性教育工作；鼓励被害人面对事实提起告诉；倡导两性互相尊重，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行为规范。此阶段，对于性骚扰的定义并不明确，只略提到如吃豆腐、毛手毛脚、性侵害等，基本上是以救援角度出发的人道关怀。甚至对性骚扰本身触及的较少，大多谈到的是性侵害或是强暴。

这个时期，为了广纳社会资源，参与性骚扰议题讨论的人士，除了妇运界外，尚包括支持妇运的男性专家学者，如：晏涵文、詹益宏、柴松林等人。他们带有指导性的言论甚至出现与妇运者唱反调之处，例如：要学会写自己的性行为负责；走上美满家庭，必能减少不健全的、病态的人来危害社会；性骚扰与妇女衣着暴露是否相关；女性要别人尊重，要从敬重自己作起；男女在生理上性荷尔蒙不同，性冲动、欲望、行为模式也不同，使得男性具侵略性、冲动强，这种原始的欲望有时克制不住。(注4)

此阶段运动策略基本上是在扩大社会对性骚扰议题的认同，被性骚扰妇女被塑造为「受害者」，以期社会重视其人权被剥夺之事实。这些充满人道关怀的说法，是在确立妇运的发言权，借曲性骚扰议题确立妇运本身的正当性。但是问题是，停留在人道关怀的运动策略上，将无法改变、动摇父权的权力结构。

中期：至 1990 年，由清大、台大校园内女研社所发起的「小红帽运动」，算是第一次女性集体反性骚扰行动的出现。1992 年，妇运团体将工作场所、校园性骚扰个案集结起来，举办了第一次被骚扰者现身的控诉公听会，也是女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交换性骚扰经验。1994 年 5 月 22 日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是妇运第一次将性骚扰议题带上街头，妇运在此阶段的策略开始强调行动，挑战权力，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明确化，确立性骚扰就是性别歧视的想法，同时反驳各式性骚扰迷思，以具体行动争取权益：包括工作权、受教权，检讨现行体制并要求制定相关法令，记录性骚扰大事纪以建立女人反抗历史，讨论女人身体自主权。

反性骚扰行动出现，对于性骚扰的各种反挫说法、行动也随之而生，妇运开始对抗性骚扰迷思，使得反性骚扰运动论述开始细致化。针对社会强大的反扑力量，妇运内部面对运动策略的挑战。对于种种父权的烟雾弹，妇运面临到其介入的不只是性骚扰的诠释权争夺战，而是更根本的、对性的诠释争夺战，以及权力的争夺战。性自主权、身体自主权首次成为反性骚扰运动中的口号。但是此时，为了聚合更多的潜在受害主体，以壮大妇运力量，女人仍是单一、同质的受害

者，并未讨论女人的个别主体性与女人内部差异的关系。

近期：在反性骚扰大游行的激情之后，更多性骚扰事件爆发。在这些事件当中，一些与妇运想像不同的性骚扰案，包括李璇控告胡瓜案、吕安妮控告洪姓教授案，使得妇运不得不开始面对女人之间的差异以及伴随而来的内部压迫。

在运动上，妇运面临的挑战是：对于「道德不正确」的女人被骚扰，妇运有没有能力为其揭发性骚扰行动背书？换句话说，在社会反控力量的壮大下，面对被控以「诽谤」、「妨害家庭」罪名的压力，为了要获得社会认同，女人就必须成为绝对的无辜受害者，不能有道德上的污点。可是，如果妇运认为女人在性上只能是「单一、同质的受害者」位置时，任何女人性主动的行为将被禁止，于是女人被分类，女人的行为被定义，同时女人在性上的弱势地位再度确立。在李璇控告胡瓜案之中，女性主义阵营曾为了没有具体声援行动有过内部讨论（注 5），显现妇运对于这个议题尚未长出还击的力量。妇运没有能力介入、支持「这种不同于既有妇运」的女人抗争策略，造成的结果是确立了父权分化女人为好女人／坏女人的分类，使得父权得以继续施展两面策略，一边扮演好男人收揽好女人，一边继续进行对女人的各种骚扰，而这也是父权社会从妇运前阶段所学到的对抗策略：强化（分化）女人的道德分类，以掩饰体制与骚扰歧视的共谋，并确保其不被揭露。妇运必须看穿这一点，并将此伎俩揪指出来。否则，如果不这样做，妇运等于弃守了运动空间，自陷于父权分化女人的伎俩中，在效果上，妇运不但没帮到女人，反倒还帮了父权社会背书。

妇运不可能只面对没有争议的运动，只选择争议性较少的「受害者」声援。每一件性骚扰事件都不仅是单纯的是非问题，而是夹杂着性与权力的纠葛运作。

四、反性骚扰运动与父权结构的辩证关系

运动是一个不断转进的过程，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性骚扰为社会接受的程度提高，相对反挫力量也更细致化，反反性骚扰主体早已建立，妇运必须要有新的运动策略，来面对更大的挑战。在运动上，我们已面临着种种的课题，需要更进一步、更细致的运动思考：

1. 如何面对女人之间的差异（反映在性骚扰上，特别凸显出女人在性主体上的差异），以便不让父权将女人分化。

妇运必须面对女人在物质基础上存在着差异，并且是极大的差异。妇运的目的不是要权力、要资源，要到之后据为己用，而是要分配到最基进、最边缘的女人身上。没有任何妇运是代表「女人全体」。宣称自己是「女人全体」，不过是以「女人全体」之名，进行统治者之划分，将夺取之权力只服务、回馈自己的阶级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女人是歇斯底里的、是过度反应的、是性压抑的，因为我们都是父权文化下的产物。妇运必须认清自己的社会建构部份，怀疑／不信任其他女人，可能反映出妇运的女性主义立场站的不稳，也反映出作为女人，作为附属之第二性的烙印。而这个烙印带入妇运，表现为怀疑女人，也正是恨女人、恨自己（身为女人）的表

现。若是伪装在怀疑其他女人的面具下，成为唯一的、理性的、已然解放的女人，这种单一标准、单一主体正是法西斯与独裁的表现。

2. 如何介入、改变权力结构，不让道德规范搪塞女人的要求。

现阶段的运动策略之一是要求设立申诉管道，但是如果将运动目的只停止于建立申诉管道，而不更进一步去改变申诉管道的权力结构，其结果将是徒劳无功。

(以下摘录自 84 年 10 月 4 日中国时报 16 版)

政大由学务处和辅导处合作，如果学生觉得遭受性骚扰，可以到学生辅导中心填表格提起申诉，学校会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依结果提出报告及处理原则。学务处并表示于性骚扰新闻出现期间，师生关系会变得敏感，学务处会与老师沟通，建议学生与老师独处时，研究室大门最好开着。

师大订定了一套学生申诉办法，于办法中列有「校园伦理相关问题特别办法」，学生可在保密情况下向学务处提出申诉。学务长另表示由于校园曾发生过性骚扰案，大家都很有警惕心，到目前为止未再接获性骚扰方面之申诉。

清大学务长表示虽未对性骚扰问题订定特别办法，但校方有一套处理原则。校内已设有谘商中心，处理学生生活上可能过到的情绪困扰，性骚扰问题也可能在其中，谘商中心包括一位专业医师、两位专任辅导老师以及六至九位兼任老师。学务长认为谘商中心可能发挥了预防功能，因此至今还没有遇到学生提出性骚扰申诉。

我们从以上的报导摘录可以得见，在原有权力结构下所设立的申诉管道，只是复制了原有的权力结构，是无法发挥功能的。这些制定出来的规范终将成为「道德良心要求」，只是父权社会搪塞女人要求的手段。对反性骚扰运动而言，妇运必须介入制度的建立，改变制度本身。

3. 如何不让运动成为父权社会之共谋

在运动主体之间存在之差异，透过运动之进行，将开始出现各种不同之组合关系，当运动升高至某些运动主体不能接受之程度时，将会出现运动主体与运动的反对者，在某个程度上结成合盟（共谋）的危险。

我们必须面对像李璇、吕安妮这种旧道德定义下的坏女人、非道德女人主体，否则就是跟旧道德、法律体制共谋。我们必须面对未成年少女性主体，必须记得从来父权就在将女人「幼儿化」，如果妇运突然站在「成人」位置，扮演起传统父权定义下的妈妈角色，那就是彻底的与父权共谋。我们必须面对并处理在真实面、在理想面上的「豪爽女人」性主体，否则就是与父权性压抑体制共谋。我们更必须认识到女同性恋主体，承认女同性恋与女性主义的共生关系，否则就是与异性恋体制共谋。

五、结论

在反性骚扰运动中，妇运应掌握女人身体与情欲再定义的权力，不落入道德重整之陷阱，更避免以阳具为中心来定义女体欲望（注6）。如果性骚扰是一个妇运议题，妇运就要介入定义性骚扰、定义性、定义身体，认清女人之间的差异，认识到反性骚扰不是只有一种主体。

妇运是一个过程，妇运面对父权结构绝不能脱开反挫势力去思考。妇运的困境及其因应反挫行动是相连的，反挫从来都在进行，妇运当然不能只停留在肯定策略上，必须看到策略问题之上，策略是因

应反挫的。

我们必须看到运动的停滞不前是运动的困境；运动的停滞正代表运动的消失。当运动开始展开也略有成果时，对于守护运动成果的小心是表现另一种的害怕不安，而这种害怕不安甚至可以强过害怕强暴、性骚扰的恐惧。紧守成果将造成运动的退败，将牺牲其他女人的利益。

反性骚扰运动是一种妇运立场的历史转进过程，在实际参与的历程里，在认同妇运道路上，希望她能继续转进。

注释

(注 1) 作为一个参与运动的人，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从运动的位置上来思考运动，这个思考并不是对运动的指导或批判，而是一个想法的呈现，一个对运动有强烈认同的自省。由于我讨论的对象不可避免的是我从事妇运工作的地点——妇女新知基金会——而不是任何其他妇运团体，这并不表示我有意「诋毁」或「夸耀」妇女新知的妇运历史，或是有意「忽略」其他妇运组织的运动成果以及内部矛盾。借由妇女新知作为妇运场域，并借血性骚扰议题来讨论一个妇运的可能思考，当然是会有很多局限性以及问题，例如：对「我」未曾参与妇女新知历史过程的「解释」，因为资料的不足，将可能导致疏漏以及错误；对于其他妇运团体从事运动的「忽略」也是可能的事实。我只希望这样一篇文章能足够作为讨论各式妇运议题其中的一个运动性的想法。

(注 2) 《妇女新知》，第 25 期，1984 年 3 月 10 日

(注 3) 《妇女新知》，第 163 期，1995 年 12 月 5 日

(注 4) 《妇女新知》，第 11 期，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 26 期，1984 年 4 月 10 日；第 27 期，1984 年 5 月 10 日

(注 5) 《妇女新知》，第 148 期，1994 年 9 月 1 日；第 149 期，1994 年 10 月 5 日

(注 6) 《妇女新知》，第 157 期，1995 年 6 月 5 日

参考书目

- 〈一样性骚扰、两样对待；支援空姐反对性骚扰——妇女团体要求重视妇女医疗权益〉，《妇女新知》第 114 期，1991 年 11 月 1 日
- 女人连线反性骚扰专刊，《妇女新知》第 145 期，1994 年 6 月 1 日
- 小红帽工作群，《小红帽随身包》，1994。
- 王淑珍，《匍匐前进：昂首对抗性骚扰》，台北：书泉，1993。
- 〈再也不能忍受了！——台大社会系性骚扰事件记实〉，《妇女新知》第 122 期，1992 年 7 月 1 日
- 何春蕤，〈性骚扰与性歧视〉，《妇女新知》第 162 期。1995 年 11 月 5 日
- 何春蕤、卡维波，《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台北：方智，1990。
- 吴小莉，〈正视性骚扰与性强暴问题〉，《妇女新知》第 8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 吴玲珠，〈为女性工作权抗争——陈瑞贞事件始末〉；陈瑞贞，〈要工作不要性骚扰——给长官的一封信〉；陈素香，〈向父权的劳动法令挑战——从彭、陈事件谈起〉，《妇女新知》第 111 期，1991 年 8 月 1 日
- 吕宝静，〈性骚扰之违宪审查经过——美国篇〉，《妇女新知》第 119 期，1992 年 4 月 1 日
- 「我们要说出那不可说的性骚扰专题」：邱晃泉，〈从法律观点看性骚扰申诉权与诽谤罪之关连〉；黄昭元，〈从公法观点看性骚扰申诉权与诽谤罪之关连〉；纪欣，〈妇女团体主动出击消灭工作场所性骚扰〉，《妇女新知》第 163 期，1995 年 12 月 5 日

- 李清如，〈历年工作场所性骚扰大事记〉；〈女人被迫选择——离开或是继续忍受？〉；纪欣，〈反工作场所性骚扰条款之说明与解释〉，《妇女新知》第 160 期，1995 年 9 月 5 日
- 李丰，〈性骚扰面面观〉；顾燕翎，〈「性骚扰」的争议性〉；曹爱兰，〈妇女性骚扰问卷调查初步报告〉；李元贞，〈性强暴的社会分析，往事不堪回首——也谈性骚扰〉；尤美女，〈法律对性骚扰的制裁〉，《妇女新知》第 25 期，1984 年 3 月 10 日
- 「性骚扰及性暴力专题：女学生反性暴力联合出击」：还我清白工作权——从彭菊英解雇案谈女性劳工的工作保障座谈会记实，《妇女新知》第 105 期，1991 年 2 月 1 日
- 「性与骚扰专题」：〈向性暴力的恐怖统治者宣战〉；〈支持宣战读者投书〉；〈反性骚扰日志〉，《妇女新知》第 144 期。1994 年 5 月 1 日
- 「性骚扰专题」：李清如，〈台长放开你的手〉；陈怡璇，〈当女学生碰上性骚扰〉；倪家珍，〈社会对性骚扰的漠视〉；张娟芬，〈公共安全不只是防火〉；何春蕤，〈自重自抑保证不了女人的安全〉；大宽，〈有礼貌的野狼还是野狼〉；孙瑞穗，〈在性骚扰事件中骚动的性别身体〉，《妇女新知》第 157 期，1995 年 6 月 5 日
- 「性骚扰座谈会报导一」：黄玛丽、李元贞，〈从性骚扰到性强暴的社会分析〉，《妇女新知》第 9 期，1982 年 10 月 10 日
- 「性骚扰座谈会报导二」：杨庸一，〈性骚扰与性变态的关系〉；陈饒，〈被强暴者的心理反应和处理过程说明〉，《妇女新知》第 10 期，1982 年 11 月 10 日

- 「性骚扰座谈会报导三」：林永丰，〈妇产科医师谈女性被强暴后的措施〉；晏涵文，〈性教育是否可以降低性骚扰〉；尤美女，〈法律对性骚扰的保护程度〉，《妇女新知》第 11 期，1982 年 12 月 10 日
- 「性骚扰与性教育座谈会报导」：吕胜瑛，〈从心理学观点谈性骚扰〉；詹益宏，〈代替所有的亚当向夏娃说抱歉〉，《妇女新知》第 27 期，1984 年 5 月 10 日
- 阿兔，〈清大「小红帽」反性骚扰运动笔记〉，《妇女新知》第 121 期，1992 年 6 月 1 日
- 〈耍赖贱女人、神力女超人——七嘴八舌谈李璇及强暴案〉，第 148 期，1994 年 9 月 1 日；《妇女新知》第 149 期，1994 年 10 月 5 日
- 〈要尊严，不要性骚扰——座谈会实况转播〉，《妇女新知》第 123 期，1992 年 8 月 1 日
- 柴松林，〈性骚扰问卷调查评析〉；《妇女新知》第 26 期，1984 年 4 月 10 日
- 〈妇女团体对彭菊英遭无故解雇的抗议声明〉，《妇女新知》第 104 期，1991 年 1 月 1 日
- 梁锦琳，〈走出性骚扰的阴影——办公室性骚扰的经济面与社会面〉，第 89 期，1989 年 10 月 1 日
- 凯瑟琳·麦金侬，《性骚扰与性别歧视》，台北：时报出版，1993。
- 郑美里，〈女人连结反抗性骚扰——参加「华航工会记者会」有感〉，《妇女新知》第 115 期，1991 年 12 月 1 日
- 医疗性骚扰专题：做梦也会怀孕；古明君，〈燃烧自己的白衣天使〉；

陈文龙，〈医疗性骚扰个案的分析与预防——一个医师的观点〉，
尤美女，〈从法律观点看医疗性骚扰〉；胡锦媛，〈医疗战场〉，
《妇女新知》第 137 期，1993 年 10 月 1 日

「同性恋的政治」座谈会

主 持：陈光兴

引言人：丁乃非、黄道明、倪家珍、谢佩娟

陈光兴（以下简称陈）：这一场题为「同性恋的政治座谈会」，虽然没有书面的论文，可是根据我的理解，几位参与座谈的朋友，都做了相当细密的准备，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有发言稿，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最多二十分钟的报告时间，第一位发言人是丁乃非教授，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成员，她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鬼魅魍魉同性恋」，请丁乃非开始。

丁乃非（以下简称丁）：我先谢谢主办单位逼迫我想出这个话题，谢谢我平日身体旁边的很多「鬼魅魍魉」，谢谢这一年课程中很多同学的鬼魅魍魉。让我开始引一些文字，先是陈雪〈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这一篇短篇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十二岁的青少女，她说：「我的同学们是那样年轻单纯，而我在十二岁那一年就已经老了。」另外一段也是来自陈雪〈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我想起阿苏所说的，在某个地方，答案一定在那儿，在什么地方呢？我必须找到它，我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方法，但我知道有个声音在呼唤我，我正逐渐逼近它，赫然我发现，自己来到一座坟场、坟墓，原来我寻找的是一个坟墓。」许佑生的《男婚男嫁》——「我十三岁那年就翘辫子了，你知道的，我的意思就是指死了，因为在那一年，我确定了自

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者。」回到陈雪〈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当我第一眼看到阿苏的时候，就确定她和我是同一类的，我们都是遗失了翅膀的天使，眼睛仰望着自由飞翔才能到达的高度，赤足走在坚硬的土地上，却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方向，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方向。」

我今天想借用——其实是非常粗暴地要重说、改换——一个女人与鬼、女人见鬼的故事，来带出一种同性恋政治的说法，是一种寓言体的吧！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 Henry James，他在将近一百年前写定这篇作品，中文题目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诡异，《碧庐冤孽》(*Turn of the Screw*)，说的是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某一个僻静的乡村豪宅的故事。一个保姆或女家庭教师 (Governess) 受小说中不在场的男主人之托，教养两名出身不明的孤儿，一男一女。有一天这位极尽责、非常尽责安份的家庭教师在花园里散步，想着该万分感激她那个不在的主人，托付她照顾小孩的主人，却就在此刻，在此夜幕低垂的时刻，她遇见了鬼。

所以，我重复一下，她想着她欲望的主人，就正巧遇见了鬼，结果当然她见到的是色鬼，是男主人原来非常亲近的贴身男仆，更可怕的是这名年轻、好看的男仆色鬼所欲望对象竟是极鲜美年少的小主人，也就是小男孩，就是她要照顾的小男孩。后来，过不久女教师发现这个家园里头还有一名女鬼，女鬼的对象当然就是另外那个小女孩。女教师一个人对付两名色鬼，怎么斗得过？她心神耗竭。小女孩好像到后来挽救不了了，才那么小的女孩就已经显出老态，女教师将小女孩遣走，全力挽救她心爱的小男孩。而小男孩最后死在她怀

里。

或许，我会说小男孩的死就是许佑生所说的「翘辫子」，或者是陈雪说的「恢复天使身份」吧！引用陈雪跟许佑生的说法，好让 Henry James 原本充满同性恋恐惧的故事得以连接到台湾目前「鬼化」同性恋、也就是将同性恋身份与生活「鬼魂化」的一种情境。这个女人见鬼的故事其实浓缩了现在许多关于家庭、女人与同性恋的权力关系，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思考的起点。在这个故事里头，我觉得其实结合了一种异性恋父权对于同性恋的「恐怖化」想像、「恐惧化」想像，其实也就是男同性恋文学里头一种初期的「柜子里头的男同性恋文学」的同性恋主体。怎么说呢？

男主人暂时不在，不在那个家园中，女教师代理掌权。在这样子的一个资产地主阶级父权家园中，小说所呈现的、所再现的同性恋是鬼魂，是色欲横流，出身下层阶级、图谋不轨、诱拐青少年男女。可是，既然他们是鬼魂，他们就不一定在柜子里乖乖待着，而是更可怕的四处流窜，孤魂野鬼横死沟渠，没有家可归。同性恋就是父权异性恋家庭这个家园容不下、又必然视为恶魔的一种性主体，所以说是「色鬼」。这个家庭同时深信这种性主体必定是（譬如说）出身不良啊、家教不好啊、图谋不轨啊等等。相对而言，那个有资源的异性恋父权家庭是个禁欲、抑欲，讲求压抑之美的所在。有趣的是，这个禁欲的主体不是那名不在的「父」或主人，他可以不受家园戒律的约束，他根本不需要出现在故事的脉络里头，他是不是同性恋、双性恋都无关紧要，因为他根本不会碰到那个家园的结构，他仍可以远走高飞。这个故事中的禁欲主体是那个以父之名，负责教养小孩成为正

当、正常家园接班继承者的女教师，因此女教师成为禁欲而又非常有资源的异性恋父权小王国的捍卫者。

可是，这个女教师很好玩，她觉得她有一种法器，她有一只无所不见的阴阳眼。其实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父权家园中的女性主义者、妇运者，她有一只无所不见的阴阳眼，阴阳眼是女人在对己不利的结构脉络中长出来的肉身秘密武器。阴阳眼的作用在于透视一切日常生活最琐碎细微的人际互动、社会关系中，那层附着于所谓「做人的道理」之下，微观的性别政治跟性政治。如果没有阴阳眼，女教师或许只能或者只知道循既成的社会权力布局来阅读自己的处境及可能的出路，也就是也许参加「真爱运动」吧！也许媳妇只能变婆婆，或者女教师只向往变成女主人（譬如说像「简爱」吧！）但是有了阴阳眼，女教师才看见自己与管家、与前任已经死了的女教师、与小女孩的共通性／别宿命，也看到了家园做为禁锢女人、小孩与鬼魂的一种既「去性」又「性欲化」的一个场域。可是，阴阳眼难道魔力只止于此吗？什么东西会妨碍阴阳眼长出其他的魔力？

女人跟小孩至少在家园中是所谓的人类，至少是处在稳稳进阶成篇成人或人类，可以争取某一种平权的一份子的康庄大道上，公领域的大社会还不时提醒他们：女人跟小孩只要守好家园的藩篱，将来必定受到最好的眷顾与奖赏。

至于那两个鬼魂呢？那两个同性恋鬼魂呢？

「我们都是遗失了翅膀的天使，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方向」。在禁欲家园中，因为承载一切禁忌的性欢愉而幻化成为（比如说）Henry James 里头的色魔、陈雪的天使或者洪凌的吸血鬼的同性恋鬼魂，似

乎只能流浪，偶尔现身吓死禁欲的女教师，但与小孩早已经结成了另类家庭和社群。

原来在这个空间里头，只有小孩清楚记得同性恋色魔是因为性违规、不服惩戒而被宣判永远消失于此人界，如果出现，就只得非人状态或非人姿态。从某一个观点，我们甚至于可以更进一步的说，小孩是向往鬼魂界的同性恋小孩。禁欲而以性为无欢愉的「传夫宗，接父代」之法的异性恋父权家庭建制，是人／鬼、异／同二分的一个结构体。不论是柜中或出柜现身的同性恋文学中，处处可以读见。譬如说「我是天使」、「吸血鬼」、「色欲魔鬼」、「色欲厉鬼」，已然死亡于此（异性欲的）人界；一旦死亡就只得像怪兽一样，一切重新学过，活在人鬼界之间狭隘危险的各种缝隙中。而这份本体认识论的一种流动、不定性、在缝隙中存活，代价非常高昂，不管是天使或者色鬼，常常处于四处奔波、改妆易面、极于精疲力竭的状态。

这样子的一种转喻，文化文学的转喻，将同性恋幻化成界外之民，有的时候恐怖、悲壮，也有可爱的性欢愉主体，这绝不是偶然。在此刻家园的权力分配与关系图中，我们是鬼，很难看见。即使被看见，多数「人」仍采视而不见的安全策略，当然为的是自保。

让我们回到女教师的阴阳眼。女教师如果看见、见鬼、见色鬼、见同性恋色鬼，这意味着禁欲的一种崩解，那一刻中崩解，意味着可能的奠基于自身「鬼化」(phantom) 经验的一种勾连牵动，进而产生认同 (Fuss: identification invokes phantoms)，也就是「鬼魅魍魉化」。那家园的摧毁或至少搬石打墙另行打造，转机可能就在此吧！就当下台湾转型中的父权家庭建制，好不容易长出阴阳欲望法眼的女

「性」主体、妇运主体，如果不「人与鬼交」，让阴阳眼不仅能够识破家园中的性／别政治、性／别权利关系，也让阴阳眼成为偷窥相中勾搭同性或其他不法鬼魂对象的色欲之眼，那么她将势单力薄，运转不出足够的力量来撼动或改变既成的家园结构权力配置关系网络，那更不要说摧毁了。

同性恋是色欲鬼魂，这很清楚的是禁欲资产阶级建制的禁欲投射，同时我会说他是当下性学、医学专家的一种「问题主体」，所以在下一个星期第四届亚洲性学会议中，同性恋、性骚扰跟性变态三个主题是并列的，摆在三个「有问题性」而必须要由专家讨论的三个场次。同性恋是色欲鬼魂，这很清楚的是禁欲资产阶级建制跟它所有的附属机构的禁欲投射。同性恋是宗法制度下不合律法的「性」主体。极权统治者帝王、或者不存在的主人、或者鬼魂，都可能是同性恋，但是只有帝王或者不存在的主人才可能因为资源和阶级，而得以过「人间鬼」的半快乐生活吧！真正的鬼魂则因为资源贫瘠，必然从偶尔现身吓人到流窜四处，抢夺空间生存，到最后或许可以外鬼通内神（禁欲的女老师），或许可以打垮家园建构。

陈：谢谢丁乃非，下面我介绍黄道明，黄道明现在在英国的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文系的「性别异议与文化变迁」研究所念书，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请黄道明。

黄道明（以下简称黄）：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谢谢旁边同台的几位朋友。我刚回来台湾没几天，他们以很快的速度帮我这个机器充了电，顿时间好像作战能力升高了很多，而且，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我透过和一些朋友讨论以及观察近年台湾社会的转变所作的思

考，这点是想要先跟大家说明的。

「同志」这个词从 1992 年香港来的林奕华带进台湾之后，经过这几年的散播与男女同志的耕耘，好像已经逐渐渗透到大众文化的论述语言里面。这个新的身份认同，以正面光明面，像伟大国父的革命号召一般，但是又加了一点邪念的意像，来呼召一直被主流异性恋体制排挤、压迫、控制或加以病理化的性主体，也就是同性恋。

于是同志团体不再沉默，夺回命名权，拒绝被定义，要求做为台湾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资源分配，以及他们所欲望对象的正当性。前一阵子发生的台北新公园重新规划事件中诞生了「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相信大家如果关心的话，他们所做的一连串行动抗争是同志开始以集体的力量展现其主体与欲望的政治化。

同志喊出「同志走出悲情」、走出「黑暗的衣柜」的呼声好像音量愈来愈大，但在这个呼声喊出来之后，我觉得马上要问的问题是同志所要面对相当大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说：走出衣柜、站出来之后，同志要怎么面对压迫他们的那个强制异性恋的霸权？

要对这个霸权和颜欢笑说：除了那么一点点跟你们不一样，同性恋跟异性恋其实没有差别，因为我们都是人，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是一种说法。

还是你就骄傲，然后不甩别人的评价，很扁地对他说：这个霸权以同性恋为压迫的对象，这个霸权是以社会的不公及暴力来做为它支撑然后存活的一个机制。

这两种态度当然是非常不同的政治。第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同化政治，第二种可以说是一种分化政治。

在极欲宣称自己欲望的正当性的同时，同化政治很容易倾向于极力地替既有的体制背书，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除去「同性恋一直在被这个社会压迫」的基本结构性。在其他国家的一些脉络里面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所谓叫 D-GAY「去同性恋化」的这种趋势，尤其在面对爱滋病的媒体呈现上更是这个样子。因此，同化政治常常会说：「同性恋跟异性恋都是一样啊，同性恋也不滥交，同性恋对对方都是相当忠诚的，我们跟爱滋病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极欲摆脱「同性恋爱」、「同性滥交」的污名。

我觉得在台湾这个现况里面，「同志」这个名字实在真好用。你可以不要用「同性恋」这三个字，而改用新的、很有趣的「同志」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政治性出发的、给自己取的一个新名字，可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就被「去同性恋化」了；这个新名词不但流行又好用，又可以躲避掉以前一直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污名，所以异性恋霸权在同性恋身体上所烙下的伤痕、创伤，在那刹那间就完全升华为人性爱，升华为强权对弱势者施予恩惠。

施予恩惠，让弱势者感动，陶醉在强权者的温柔怀抱里——这种同化政治在全球同性恋，也就是同性欲望商品化的资本主义逻辑运作之下，以及台湾最近几年来政治生态的改变、民主多元意识形态正盛之时，似乎很容易奏效。也无怪乎近乎法西斯心态的新党以及和国民党一般父权心态的民进党，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同志」；我在这边指的是说他们在《G&L》热爱杂志创刊号上面所登的广告，他们都说同志也要有人权。同化政治也许能够改变被压迫者的生活状态，却很难质疑现有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它自然化的建构性。但是我要强

调，我并不是说平权运动不重要；相反的，同志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绝对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只是，这个平权的运动是生存的一个基本要件，是你能够在这个强权之下存活的一个很基本条件。可是去质疑、去挑战这个体制，是为了——让我套用一句国民党的台词——「明天会更好」。

所以，我认为追求平权和继续革命应该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必须要同时进行。因为，你没有声音没、有办法跟主流对话时，必须要跟它妥协，在用它的语言跟它交换条件的过程中去得到某种合法性与正当性。可是在此同时，必须要更批判性的去指出，这个体制运作的逻辑和它所压迫的，也就是它的压制性。所以，同志如果移动了体制的某一个疆界而不再继续往下移动，不再往前展望，那就真的是在跟这个体制共谋，在巩固这个体制，在替这个体制背书，让它更壮大。

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最近出现的所谓学院派的同志论述。学院派的同志论述做为一种批判的演练，不能不做，甚至会有某种的道德或义务责任，去试图解析这些压迫性的点、线、面的结构政治问题，急迫的政治问题。这些理论当然很大部分是从美国、从英国进口的，在台湾发展到现在其实有点像是新宠儿，可是它们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脉络，也就是它们是从有同性恋解放运动 **GAY Liberation**、然后女权运动，这样一直推展来的。可是放到台湾的脉络里，同志理论进口之后，台湾的同志政治主体并没有长得很好，或者根本还在襁褓中。在社会资本薄弱的情况之下，做为台湾学院建制内的所谓知识分子，如果规避这些关键的政治问题，不去开拓同志更大的论述空间，也就

是运用学院里面你已经有的资源，甚至传统中国或是在台湾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占有的权力位置，如果不运用这个权力位置去替同志开拓更大的论述空间，那就是对同志们的再度压迫跟压榨。我的意思是说，同志如果无法在这个描述他们及他们欲望的论述中得到滋养、成长和增加他们的主体力量，那么，要这套论述有何用处？

进口的同志论述大量使用了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来解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对立和它里面的一些结构性，然后强调欲望流动的不定性，很直接的挑战异性恋不变的那个本质主义立场。可是在强调欲望是流动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去质疑，为什么欲望总是流向一方（主流的、异性恋的），而不是多方？而同性恋的欲望为什么总是被压迫？同志论述——就我自己的了解——它当然是在指出这个二元划分的僵滞性与不定性，可是它的批判不是说：让我们就瘫痪在这二元对立之中。而是让我们看清楚，异性恋其实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纤维与心理机制来进行，它对同性恋施展什么样的排斥与暴力，然后我们如何能在这二元之中，不断的依这二元所在的不同文化场域及国家机器的建制，来做批判跟抗争。

换句话说，让我引用一位学院派，可是也是一位运动健将 Michael Warner 的话来说，在这个庞大的体制内，我们必须质问我们每天生活所处在的不同社会建制（就是家、学校、国家这些东西）里面的权力运作，它对性的控制与污名化，它在性别、阶级、种族的轴线上对性的压抑，这样才会知道同志在这个文化的异议里面的定义，和它的位置在哪里？也唯有如此，才能替它的革命来定位。所以国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要问的是，我们革

谁的命？革命的主体在哪里？要怎么样努力才能进行革命？

在不违背解构的精神之下，在运动的场合中，特别在台湾的脉络里面，有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对同性恋同志而言，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一定要去问，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欲望，特别对同性的欲望和爱意，是禁忌？而且需要被压抑或升华，转换成社会认可的某一种情欲形态？为什么我们的欲望没办法到处流窜？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另外，大家现在大概也很习惯所谓「异性恋霸权」，可是，强制性的异性恋霸权到底在台湾的脉络里面是什么意思？是透过什么样子的社会建制（婚姻、家庭等）来展现它的具体权力运作，展现它对同志所施行的白色恐怖？

我觉得同志大概都有这种经验——怕被家里发现。如果有哪一个同志被家里发现，你就会开始担心：他会不会追到我这边来？如果他爸妈查到我这里来，怎么办？我也会受迫害。这种感觉，不叫白色恐怖，叫什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抵抗、颠覆这个对同志身心加以残害的体制呢？大家都要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例子，昨天晚上才有朋友告诉我，国父孙中山先生居然有一个同性恋的弟弟！他说：「革命才刚开始，同志你在哪里？」革命才刚开始，同志你在哪里？

在台湾，异性恋白色恐怖仍然弥漫，异性恋所加诸的白色恐怖气氛，仍然弥漫在台湾的社会中，在这种状态之下，同志要如何透过对体制的思考、质问和介入，来凝聚力量，透过社会运动来改变现有的社会体质。除了说能够站在阳光下接受洗礼，进行某种形态的「光合

作用」之外，必须还能够透过一种抗拒力来去除这个白色恐怖，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陈：谢谢黄道明。在台湾做左派，基本上不太敢谈革命，可是现在好像被逼得要重新思考革命是什么？我下面介绍倪家珍，倪家珍是台湾的爱滋运动工作者，她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性恋如何介入家庭改造运动」。

倪家珍（以下简称倪）：题目听起来很大，我想要呼应刚刚丁乃非的发言。我在看《男婚男嫁》那本书，或者是刚刚听丁乃非讲的那个故事时都可以看到，在现在这样的家庭状况之下，很多同性恋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和生活，也就是说，你很多成长过程里面的生命历史是没有办法跟你原生家庭分享的——除了极少数的人。有时候常常听到朋友说，难道在台湾只有孤儿才能 Come Out 吗？在台湾常常说家庭幸福，家庭是温暖的地方，但是好像只有孤儿才能 Come Out，因为家庭政治实在是太可怕了。大陆用的方式是逼着你游街示众，台湾其实是透过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的父母可能呼天抢地，捶胸顿足说「我做了什么孽？」类似这种状况。（其实他们当然什么都没做，他们只不过「做」了你啊！）那一种因为自己的自我伤害或者极度感受到社会压力的状态，而向父母亲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分的人，压力反而是比较沉重的。「同性恋」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负面的，我想父母那样子的反应绝对是这种状况的社会效应。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一个爱滋病带原者，他也是台湾第一个现身的同性恋，他曾说过，他之所以能够现身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母亲先过世，后来他父亲也过世了，于是他才能够站出来，对社会说

话。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其实不是偶然，也就是说它们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

家庭，做为一种制度或者这个社会最小的一个人的生活单位，是不容许同性恋存在的。其实就像刚刚丁乃非讲的那个寓言，同性恋要嘛就是不存在；如果你要存在的话，你只能像鬼魂一般的存在。这也就让我想到，难怪西方很多电影中有关同性恋的暗喻都跟吸血鬼深深的分不开，吸血鬼所代表的鬼魂化身和性的欢愉，是人界所不能容忍和想像的。西方叫做吸血鬼，台湾就叫做妖孽。（难怪父母会说：「我做了什么孽」？）

从这个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在我整理的那个表格里面，可以看到同性恋团体也曾经提出质疑。现有既定的法律制度，也就是民法亲属篇，它具体规范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妇女团体在许多个别的女人身上也认识到，它是一个迫害女人的制度，需要加以修正，但是，在修正的过程里面，它忽略了同性恋的利益和需求。同性恋团体指出，现在既有的家庭制度只容许一男一女的结合，他们之间的性还必须服务这个体制，也就是必须是具有生殖力的。像在丁乃非所说的寓言中，同性恋者被排除在庄园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鬼魂」怎么可以生产后代？鬼魂那种带有欢愉的性，与既有家庭中那么强制、为爱为道德背书的性，两相比较，多么具有诱惑力！难怪异性恋家庭那么惧怕那种欢愉的性，我觉得也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同性恋团体提出对既有婚姻制度的质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切入点。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事实上它也在质疑现在的家庭结构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此刻对于性的想像跟描述是有高下阶层分

野的，异性恋的性，特别是能够生殖的性，而且「生男」的性是最好的，在这之外的性当然都被说是不太好的，那更不要说，同性恋还是一个不具有服务父权体制与生殖功能的性。

在黄道明介入讨论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他在提出一个新观点，叫做「改变家庭结构」，也就是说，民法现在就压迫到女人，这些女人在修改民法的过程当中就在改变家庭结构。现在也有些人谈「另类家庭」，在这样的家庭再造运动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同性恋者是可以介入的，甚至我觉得还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例如，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家庭？如果再造新的另类家庭，可以是哪一些什么样的「家庭」？国外开始有一些同性恋的社群出现，这个前景在台湾是否可能？在这个再造过程里面需要援引哪一些资源？以及联结哪一些社会力量？甚至是采取哪一些策略？我觉得这些思考都是介入「家庭」再造运动的方式。

另外一个需要同性恋者回应的，是由宗教人士发起的「真爱运动」。这个运动提出的同时，同光教会正要成立，我记得当时真爱运动的提倡者之一就出来说：「我们也非常欢迎同性恋者，因为我们相信同性恋者也有真爱，而且会互相守贞，最重要的是，大概透过这个方式，也许能够让他们改变成为异性恋者。」这人讲得这么恳切跟清楚，也蛮好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在变动恐慌之余，不但害怕女人情欲拓荒，也害怕同性恋的情欲得到正当性，因此要赶快收编，我觉得现在正是介入的一个很好的时刻。我就讲到这里。

陈：谢谢倪家珍，我下面介绍小毛，谢佩娟，她的所属单位是台大城乡所，也是城乡基金会的规划工作者，她要谈的是「同性恋运动

反控的新解读」，可能跟新公园有关系。好，请。

谢佩娟（以下简称谢）：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个座谈会，我想我就试着丢出一些问题，或者可以在这个场子上，大家有机会聊一聊。刚刚从丁乃非到道明到家珍，一路这样过来，从鬼魂一直到家，我觉得如果把家里面的鬼魂放大社会的话，这些同性恋者就是在社会上，一直都在，而且可能一直呈现半人半鬼状态的、飘流不定的鬼魂。当这些鬼魂开始意识到自己这个半人半鬼状态好像不大好，想要变成人，去争取人该有的权利的时候，它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奇奇怪怪、杂七杂八的声音。他可能透过一个组织化的过程，有些时候也透过一个非组织化的过程来抵抗这些杂音。

这一年多来，整个所谓同志运动或同志论述这个部分的反控，我试着很粗略的用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我称它为立场清楚、相互对立、各立山头的谩骂型。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比较容易应付，对方的立场非常清楚，他说同性恋是一种变态的行为，他们的做法非常的恶心。我觉得这种立场比较容易处理，或比较容易对待，因为起码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跟他谩骂的空间，你起码可以跟他辩论，你起码可以说，「好嘛！那我不理你，怎么样……」这当然是一种形式。

另外一种反控就是像今年台大发生的恶意曝光事件。我觉得在这个曝光事件中，对待同性恋的办法又多加了比较细致的政治手段，也就是把同性恋身份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手段来威胁你的政治资源的运用，但是在措词上又好像非常的同情同性恋。他会说：「我们是异性恋者，我们在阳光下，我们邀请同性恋的朋友来阳光下和我们做朋友。」你看看这个话听起来多动人啊！可是骨子里是什么，大概我不

用讲，大家心里也都很清楚。

我觉得这种两种反挫的型态，前者是容易应付的，它有一个焦点，有一个议题可以面对面的作战，也就是说，战场的开辟或者战场的开展，其实是有那个空间的。可是对我来讲。最难应付或者最模糊不清，甚至是没有这样子的运动经验的部分，就是另外那第二型的反挫。这种型的反挫就是：看似支持、看似赞成，然后又很同情的态度跟立场，可是在这样子的态度跟立场的背后又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家珍早上的论文里面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之一：如果你所提出来的诉求没有危及到结构，没有让他意识到你在跟他分这块大饼，那么他当然会说「好啊！反正我也赞成，也很支持啊！没问题，你们都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下一步呢？运动的下一步是什么？要走到哪里去？

我觉得除了早上家珍讲的，结构没有被撼动的那个部分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份，那就是已经长了这么久的异性恋体制架构，和这整个国家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百般武器，几乎是滴水不漏，而且有各种策略，在恰当的时候让你闭嘴，或者让你突然自动消失。这套过程，这套技俩，他们已经太熟悉，而且太会用了，可是同性恋个人或同性恋团体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好的基础，或者没有那么强壮的背景，可以让他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很精通，来跟这个过程打架。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称为所谓「新国家」或者「新政府」，或者是「市民城市」，在对抗所谓「异质团体」或「异类团体」，或者是「弱势团体」时的政治手段的新模型。在抗争新公园使用权这整个事

件里面，有一个部分我很想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非常的困惑，不晓得怎么处理。

新公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所谓的开明政府，就是台北市政府，好像在空间上做了一些善意回应，可是它也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在无意中暴露了它那个父权的意识型态，也就是它扮演了一个所谓开明的新好男人式的好爸爸，然后这个好爸爸就说：「我没有不给你们啊！我给你们另一个空间，你们就去那个特定区，四点到六点你们用。六点到八点别人用」等等。他对资源控制的方式就是：我看到你们弱势团体的存在，可是我还是要拥有资源分配的权力。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同性恋主体其实是不存在的。他还用了很多的说词，譬如，他会说：「我是希望红楼的空间你们可以使用啊！可是红楼的居民不同意啊！」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他们的不对，是红楼的居民不对。然后又说：「新公园的改变，或者同性恋可能以后没有办法使用新公园，不是市政府的错，是捷运局的错。」我听了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当他这种态度出现的时候，我有一种很直接的感觉，就像要在社子岛上设特种营业区一样，他在用惯用的手段矮化女性也矮化同性恋者。

另外，在这个事情之后，他又用了另外一套工具，那套工具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媒体工具。这套媒体的工具，他就直接将它交给了所谓的新开明政府里面的一支非常强而有力的部队，就是控制传播媒体的新闻处，而新闻处用了一些空中泡沫式的媒体策略，交换掉同志团体对空间的一些实质要求。也就是说，市政府没有把事情交给具体掌管空间事务的单位，反而把所有的焦点模糊掉，把这件事情整个转到

所谓新闻处当成文宣资讯处理。

这给我的感觉就是，国家机器这么庞大而且那么精密的操作，大概已不太像以前黄大洲市长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他根本不想看见你，拒绝跟你谈到这个问题，拒绝承认你存在，所以你也别梦想和他谈任何资源的问题。现在这个时候，新的市长反而用了一套看似很开明的方法，移花接木，让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完全管不下，然后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协商时代，不是一个抗争的时代，你们应该来跟我们协商……」。好像新协商时代的来临就是「大家都不要批判，事情到这里，这样就可以。」面对这些新的收编手段，新的敷衍方式，甚至新的间接迫害，同志们恐怕得重新想想如何因应了。好，我的报告先简单到此。

陈光兴：我们还有 1 个小时 10 分钟开放讨论。有一些游戏规则，第一个，请举手发言，没有举手的请不要擅自发言，谢谢。第二个，每次发言以 3 分钟为限。第三个，我们分成几个阶段来进行，前面 15 分钟先发言完再统筹回应，然后由尚未发言过的人先发言，开始第二回合。请。

听众甲：关于小毛（谢佩娟）提的那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或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同性恋者的需要被拿到整个城市全体公民的层面去处理的话，一定会被处理掉，因此有些问题可能要诉诸 **Group Difference**（群体差异）。你可能要去说服这个「新好政府」，不能把这个议题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处理，红楼的住民不是同性恋，他当然反对同性恋的利益。或许我们应该从同性恋这个 **Group**（群体）出发，去确定它的需求是

一个 **Right**，是一个权利。也就是说，比较少数族群、少数人的一个问题，不能拿给多数人去公决，不然它一定被解决掉。我们去为少数人的权益抗争的时候、争取的时候，做这种诉求可能会是一个有利的诉求。

柯乃荧：我是来自高雄，今天整个早上包括我自己下午坐在这边，我都常常会处在一个错乱的状况，似乎高雄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同性恋政治，我觉得可能南部来的朋友或许应该要集结起来。我们最近就在高雄医学院办一系列的讲座，还有经验分享。

不过，在我过去的田野经验里面，常常发现到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在南部的同性恋朋友们，他们比较在意的是怎么去寻找伴侣。我觉得 **have fun, have sex**（性和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一个力量的来源，但是，我觉得蛮难过的是，谈到面对整个体制上的困难的时候，在南部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同性恋集体出现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我不觉得是同性恋人口还不够，而是集体的时机没有到。我们需要思考的可能不只是城乡差异、南北的资源分配，也包括比方说，对同一个议题，在台湾那么一个小岛，居然会有那么大的、异质的状况存在。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针对道明和家珍的。我的回应是，像《男婚男嫁》，我想这是一部还不错的小说，起码它呈现了男同性恋的感情生活，蛮真实的，可是它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常常在无形当中还是落入一个情境，一个诡谲，觉得同性恋应该遵循所谓的「一夫一妻制」或是「一对一」的对应状态，我认为家庭的结构是需要重新再建立的，可是性关系的复杂化、多元化和可能的演变，也是我们必须重新

架构的。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想同性恋政治不可避免的一定牵扯到某些同性的问题，像最近提到的「第三性公关」。大家都知道，「第三性公关」是在南部成立的，为什么会成立？很简单，因为这些族群在同性恋社区里面是被排斥的，是被封锁起来的，所以后来他们另外寻求他们的空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时，我不知道台上的运动者该怎么去回应？谢谢。

听众乙：我想我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是同光教会的发言人，今天早上有一些论文提到教会的问题，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欢迎大家跟我谈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我有些问题可能要请教道明或家珍，或者是小毛，就是我本身在参与同志运动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学校团体，包括现在的教会——我发现特别是现在年轻的这一代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相当的好了，有许多的空间可以利用，于是对于政治议题、对于自己的权益，年轻的这一代似乎比较不会去注意。甚至现在校园里面或许已经有一些好老师愿意为同志说话，可是有许多隐藏的老师，他们自己本身有志愿，或者本身就是同志，可是却不敢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意见。我现在想要问的是，到底我们该如何将我们这样的理念、我们这样子的目标，贯彻实践到包括刚才提到的南北差距的问题。我相信同志本身大概都是先从一个自身的认同，到后来才能够面对政治方面的事，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该怎么样去分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该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理念贯彻到更深的层面上面？

陈：我们就请各位引言人先回答好不好？

黄：很高兴听到那位朋友的回应，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要怎么样去思考同志在这个社会里的位置。很多人去 Funky 酒吧，去三温暖，里面洗澡的结婚的男人一大堆，他们已经占有资源，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已有的资源，然后跟你来和主流社会做对抗？所以我要问：同志在哪里？也就是说希望集结同志。

通常男同志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政治性，也就是男同志对于政治的敏感度，比女同志迟钝很多，或甚至一点政治意识都没有的，大有人在，那其实是非常让人心寒的一件事。有些男同志以为他欲望的对象是男的，因此就和女的不用有什么瓜葛，他以为他根本不用去处理跟女性有关的议题。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说，同志政治是怎么透过一个认同的过程来集结，我觉得政治本来就是一种认同的过程，或者也是一个不认同的过程：就是因为你不同意某一件事，所以你出来讲话，所以你很生气。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说，我想跟家珍、还有王莘、还有古明君做一个连结，其实他们三个在早上的或是下午的场子都有提到，像劳动阶级、青少年处在家庭中的位置，经常使她们在支援很少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去做某一种职业的选择，也因而受到歧视，现在连妇运也慢慢看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在同志被家庭这个霸权压得死死的这个过程中，在同志没有什么社会资本、资源的这个现况中，是不是能够跟女性主义或者妇女团体在这个议题上做连结，开拓一些更大的空间？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个方法。或是说跟其他的议题，像是爱滋运动做联络。

至于说要怎么找到同志？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人那么恋栈霸权、恋栈权势，不愿意放弃他自己的优越位置，就算他在性别对象的

这个位置上被压迫，可是他还能有在父权体制中占有的优越男性、或中产、或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他如果这么恋栈他的优越位置的话，那也没办法。也许大家有一些好的意见，怎么样能够动员让同志更清楚自己活在什么样子的文化脉络之中。谢谢。

倪：我先回应那位同光教会的朋友。其实有一些经验上面的借助很重要，我知道教会当初成立，有一个大家分享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经验交换和意识觉醒的过程。在妇运的早期是用成长团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譬如说女人或者是同性恋，其实是被这个制度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是非常分子化与单一化的，所以如何透过这种经验分享，找到朋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同志这个名词在内部凝聚正面的认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这个个人政治化的过程不会是自己产生的，而总是要透过一些有共同经验的人物的分享，了解到其实我们共有这样的经验，进而能够共同讨论在这样的基础点上我们想要做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是，譬如说面对教会这样的一个系统，同志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和教义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不同的群体还可以有一些它特定的活动，譬如说透过你们自己的读经会来重读圣经，可是是从自己的观点或是说透过经验分享的观点来重读圣经，甚至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纪录下来，我觉得文字能够留下来是一个蛮重要的工作。进一步做完了以后，共同参与的这些人可以再想，接下去我们还再做什么？同志教会的基础能够稳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彼此情感的互相滋养，也就是说所谓彼此扶持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那个城乡差异的问题。我觉得台北看起来这么的蓬

勃，或是说这么的政治化，其实是和这个城市、这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非常有关。台北这个城市拥有非常多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非常的流通，高雄的情形绝对跟台北不同，可是我们一直也在说一个「在地」的观念，也就是说目前台北的在地同志在台北做了小小一点点事情，其实它的一个作用是想勾引出其他地方的同志。我觉得校园里面的同性恋团体已经起了这样的扩散作用，可是台北的同性恋运动能够起一些效应的基础，在于那个地方有人想要推动同志运动。即使台北的同志运动非常蓬勃，或是甚至这样的运动资源和经验可以转化跟分享，可是如果别的地方没有人想要搞社会运动，或是说不觉得这是一个急迫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它会很难形成。所以我觉得，运动资源就是要相互分享的，如果在下同的地方有人觉得想要搞运动的话。我觉得就像当初其他的同性恋团体成立的过程一样，事实上是可以透过例如电台和电脑的网路，这一些资源是可以使用的。

谢：我想我试着回应一下那位来自高雄的朋友的问题。我想在台北大概还可以当个半人半鬼，出了台北以后，大概真的就是鬼了，因为当鬼的机率比当人的机率多很多。我有很长一段日子待在宜兰，在宜兰，鬼还是蛮可怜的鬼，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很难出现在那样的地方。我自己在那里做一种东西，是国家极力打造的，叫做「社区总体营造」，很可怕吧！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很害怕当这个所谓的社区或者所谓国家打造的社区总体营造成型了，那么这个鬼除了在家内被控制以外，他搞不好在社区里都要被控制，就算他走出家门口，他也永无翻身之日。这和我现在在社区中观察的女性的位置其实是很雷同的，只是女性的问题在宜兰已经开始可以被

谈，但是同性恋的问题在宜兰，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没有迹象可以谈的。可是我知道在宜兰有非常非常多同性恋的朋友，可是这个问题居然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被谈，这和高雄的问题是一样的。顺便回应那个所谓「第三性公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她们还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她们的自主性很够，就报纸上的报导来看，她们对于媒体或对于警察这种强力的干预或者对他们的侮辱，公关们的回应方式令我觉得非常佩服，应该要给她们一点鼓励。

陈：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二阶段的互动，请哪位先发问？

胡淑雯：我是妇女新知胡淑雯，刚刚小毛提到，「同阵」（同志空间阵线）和「都发处」（都市发展处）抗争，最后换回来的是新闻处给的那个泡沫式的媒体回馈。但是我会觉得在这过程中，可能聪明的市政府给了同志团体一个替代性的满足，就是说，也许我们不给你新公园的规划权，不让你们这样的主体介入，可是我们给你们一个电台，然后由新闻处处长罗文嘉和同志团体合开记者会公告这件事情，俨然也成为同志运动的拥戴者。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替代性的满足，不过在一个层次上，这也是同志运动抢到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新闻处给了一个替代性的泡沫式的满足，但是我觉得同志团体在抢过来的过程中还是可以把它拿来用，我们可以拿这个主流社会给我们的东西，用自己的方法来使用它。而且我们也不必去爱给了我们这些东西的人，不用听他们的话，就把这个空中的电台当做一个重要的战场，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同志的力量也才可能再集结，然后再出发，再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我也想回应一下上午王浩威提的那个问题。王浩威以一个精神

科医师的身分，提到他目前做为一个医疗者的困境，那个困境是说当他在碰到想要变性的案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样的建议。可是我觉得当时王浩威是把这个问题抛给家珍，然后要家珍以一个妇运者的立场去谈：如果妇运者想要和这样的力量结盟的话，可以做些什么？家珍当时并没有回答，但是我觉得家珍的这个没有回答是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这些男性不应该再把问题抛回到妇运团体里头，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个别的男性因为自己位置上面的便利，可以看到目前同志团体或妇运团体没有集结到的人，或是其他的主体（比如说今天上午一直不断谈到的，在经济跟社会阶层比较底层的人），那我觉得这些男性在问：「妇运者，你们想要怎么样？同志运动者，你们觉得这个现象我应该要怎么办？给我一个解答」之前，好像应该先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准备要从事运动，有没有想要去把这股力量还有这些欲望动员起来。我觉得也只有在这个前提确立时，谈结盟政治才有意义。另外回应一下黄道明，黄道明提到，他希望同志运动不只是同化运动而已，我先前感觉到现场有一点沉醉在一种想要当人的欲望里头，就是说不想当鬼，想要当人。我觉得其实黄道明说「不要同化政治」的意思，应该是说不不但不要当人，而且可能还要积极去当鬼。

李元贞：我是李元贞，其实我自己在高中就有过同性恋的经验，但是很悲惨的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文化薰陶，我觉得我完全被这个父权异性恋的机制控制得死死的，因此我是以一个异性恋的经验去经验我的同性恋经验。所以同志运动我只能站在一边支持，我只是觉得我没有资格。我到现在拚命想，那时机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办法

做同性恋呢？我非常痛苦，的确我被制约得很厉害，我很爱女人，可是就没有办法，那个爱欲就没有了。那岂不是说，我就是被阉割了吗？这样，我又如何代同性恋讲话呢？所以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我觉得我当然就是：随时同性恋要我干什么，我就去支持。

孙瑞穗：我现在要站在一个很奇怪的发言位子，因为我本身对男同性恋有矛盾的情结，我蛮容易喜欢上男同性恋的男人，可是就只是精神上或是摸摸手而已，可是今天我觉得我要帮一个男同性恋者或是帮很多不知名的男同性恋者表达一个困境。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是同性恋，昨天他跟我讲他弟弟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当兵，在军队里面被人家发现他是同性恋，然后就被一群异性恋男人当做是轮暴的对象。使他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焦虑的状态，一直有人要找他发泄。他的好朋友劝他如何如何去处理，他都没有办法，因为在军队生活里面，他感觉到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处于一个几乎没有办法处理的状态。我猜他在四、五年之内如果没有精神分裂，大概就是奇迹了。我知道每年当兵，精神出状况的人很多，男同性恋是不是能够幸活下来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最起码他在军队里面，爱情的自由是被剥夺的。今天他们没有办法出席这个会议，而今天在场有很多在正统医疗界被承认的学者，也有很多学术战斗力很强的异性恋男人，比如说陈光兴啊、卡维波啊、王浩威啊！我不晓得你们这几位面对一个这么好的战场，而且你们对国家机器也是恨之入骨，这个战场又是非常的名正言顺，大家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我觉得他们是处于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因为不只是工作权，或者是感情上的伤害而已，而是他很基本的心理的安全状况都没有办法维系。这种状

况，很多男同性恋朋友或许会想，「啊！那我就在军队里面禁欲就好了，然后我不要让人家发现」。可是万一你被发现，怎么办呢？我听过这种例子，我也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因为他们不能来。所以我只好代言。

陈：好，这个问题等一下请王浩威回答，现在我们再开放两、三个问题以后再请台上的回答。

苏哲安：我还没整理好思绪，但是想先发言的欲望太强了。我想我要说的可以分为两种反应，一个是知识生产上的考量，另外一个是对制度的抗争。第一个，我认为无论是谈到鬼魂，或是同志主体，或是所谓媒体工具，这三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部还是在所谓的视觉逻辑这样的脉络里面发展出来的。我们也都知道，视觉在我们现代情境里面是一个霸权的论述结构，而且刚好和目前台湾官场文化所谓台面下台面上的二分法，刚好有一种特殊的恶性循环关系。所以我想，这里就是一个瓶颈：如何在视觉逻辑霸权的脉络里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们常常听说同志如何如何被发现或是自己发现自己。其实这个主体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也有一个具体的历史可以追溯。搞不好我们现在用的语言也是属于视觉霸权的语言，所以早就有一些既有的回答，这些也都被建构出来了，所以听到被发现或自我发现的故事时的各种情绪反应，我觉得很需要检讨一下，可能这里面有一个突破口。

另外就是运动上的实践，我想可以联盟的主体还很多。比方说长久以来大家都很关心的民法亲属篇，不管是女性或是我自己，都会关心像我这个外国男人就好像无法入籍，因此民法亲属篇的修正也会受

到我的关心。我想这一些都一再地告诉我们，同志论述与别的运动论述的逻辑可以结合起来，然后要针对四个主要的制度，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军警，另外一个黑道，我们需要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关系，再来一齐对抗。

陈：谢谢假台湾人苏哲安，请。

司马拓荒：同性恋政治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这个第一届的四性国际研讨会来争取同性恋的合法权益。大家知道在我们所有的法律当中有一个「残障福利法」，其中第四条规定残障同胞的人格权及合法权予以保障，我们需要督促我们那些立法委员，要求他们在制定隐私权法的时候，特别要制定的是同性恋者的隐私权及合法权予以保障，其中包含了民法亲属篇要明文制定，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我们知道在美国加州的牧师可以公开的为同性恋者证婚，为什么台湾这么落伍？希望有一天台湾的牧师、台湾的神父、台湾的星云法师能够为我们同性恋者证婚，因为心理学的研究显示有百分之的人是天生的同性恋者，跟道德没有关系。谢谢。

陈：王浩威先生。

王浩威：我倒不是要回答胡淑雯的问题，不过这也和她提的有点类似。我刚刚在听丁乃非讲鬼故事觉得蛮好玩，后来慢慢就随着道明、家珍、小毛的谈话觉得好像越来越悲壮，那种气氛觉得很怪。我不晓得怎么讲，你看道明那么漂亮的身体，虽然是痛苦的控诉，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嗯！道明讲一句就顿一下，啊！觉得到底是很痛苦还是欲仙欲死啊！有些时候也搞不太清楚。

我要讲的是。有些时候鬼想要变成人，然后成家，成社群。我隐

隐约约感觉到：到底要变成什么人，好像没有人能够想像；可是可以想像的人是比方说，资本主义下的、中产阶级的，其实是一一对一的；换句话说，总是在现有条件之下的。其实刚刚家珍讲「另类家庭」，可是还听不出另类在哪里。比方说两个同性恋者住在一起，真的就是另类家庭吗？比方说传统的家庭里面的家庭暴力，就不会在同性恋的家庭里面出现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是一个鬼的时候，你是永远处在一种自我放逐的状态。但是一旦你有成为人的欲望，一旦你想成家，一旦你想成社群，或者说你的运动想要代代相传，这个时候，刚刚很多人提到的「运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时候好像很多人的困扰又同样复制出来了。于是一方面感觉到有一种悲愤的状态，比方说像刚刚小毛讲的新好政府那样的情况，好像只要接近非我类者，就有一种鬼的感情又出来。我的意思是说，鬼其实不是吓人鬼，是在被人吓的，也就是好像任何的善意都有问题，不可能没有问题的非道中人的接近。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接近的时候，又好像感觉到鬼的那种孤零、悲壮、悲情。我只是很想知道，当一个外在的既得利益者不主动接近你时，你到底要不要设法用他？如果你需要用他的话，你要怎么用？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刚刚有人问我，像我们这种文化论述遇到国家机器时会怎样？老实讲，我并不一定只是跟国家机器对抗，我有时候他很想跟它做爱。也许有人怀疑这个「我」能不能大到可以跟国家机器做爱？当然这或许是有我个人的妄想在里面，但是回过来讲，我说不定真的不止跟他对抗，我有时候真的可以跟他做爱。而且这个做爱也许是 S

M，而且有些时候我可能是 S，有些时候可能是 M 之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似乎还有很多可能性。我大概讲的很含糊，但正我觉得这个问题大概也不可能讲的很绝对。谢谢。

黄：我想短短地回应一下。刚刚有人提到同性恋人权在军队里面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果你生下来是男的，你就注定要当兵，这是你的义务。可是在国外，譬如说美国或英国，对同志来说，为国家军队服役是一种谋生赚钱的方式，因为他们是志愿役的，不像我们这边是征兵制的，可惜当美国在吵同性恋能不能进入军队服役的时候，在条件根本不同的台湾似乎没有被谈得很清楚。套句刚才王浩威说的问题：当一个个体那么单薄的力量的时候，你怎么跟整个庞大的机器对抗，或是说要不要跟它抵抗？我觉得现阶段一个比较立即的做法，当然就是同志团体必须开始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尤其男同志团体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看连新党跟民进党都已经宣告很欢迎这些所谓另类的同志，也许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谈谈，既然他们宣称尊重人权，那我们要求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改变同志在军中的待遇，假如他们没有办法实践承诺的话，那显然就是他们讲的一切都是假的，可能就要靠同志们自己去抗争了。

但是我觉得这还牵扯到一个更大的结构问题：为什么男同性恋会在军队——一个完全阳刚的环境——里面倍受迫害？这个其实牵扯到男性对他自己以及这个文化对于阳刚、对于性别的定义。因此我刚刚才会说，谈同性恋不能不谈女人。男同性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谈个人就牵扯到整个家庭制度、整个

教育体制，以及对于性别划分、性别欲望的规范，男的应该怎么当？女的应该怎么当？男的和男的做就是男不男吗？或是说用肛门，做肛交就是变态，就是不正常？这些都牵扯到传统父权体制下的男性对自己的定位，他碰到异类时产生的恐惧则转变成为一种迫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对同志们要和谁结盟，大家需要去想更多更远一点。

谢：我想回应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淑雯那个问题。当然我也很赞同以新公园来交换同志的电台节目的利益的那个理念，因为它至少争取到了一个所谓公共的资源。可是我的焦虑在于：我觉得是拿一个真实的空间换成一个虚幻的空间，而且那个空间的掌握者其实还是市政府，当它不爽听同志的节目的时候，他还是随时可以停掉。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权上，我相信市政府没有那个权利，也就是他不能说因为不爽你，所以同性恋和狗就不可以进入新公园。所以我会觉得在淑雯所说的交换上面，我们还是损失了。

再来回应王浩威。我可能没听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悲情啊！而且我其实有一点反对把「人」跟「鬼」本质化的去看待。鬼不一定是变成人最好，搞不好人变成鬼可能比较好喔！至于刚刚你提醒，对待国家机器有各种方式，包括可以跟它玩 SM 做爱等等，这些我都相信在想像力的开发或者是在 idea 的提供上会有很大的帮忙，可是真实的作战过程里面，可能很难跟国家机器做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达成，可能想到做爱就会觉得很恶心，哈哈！

倪：嗯！我也对王浩威作点回应。好奇怪喔！为什么讲话稍微大声一点、激动一点，人家就说你悲壮？这是蛮奇怪的！不过我倒

觉得还好，没什么悲壮。

我觉得其实结婚、不结婚，婚姻制度是什么？家庭是什么？本来就是提出来给参与座谈会的人来想的。现在异性恋的婚姻制度在慢慢改变，事实上也引发了很多人（譬如女性主义者）的讨论，除了思考到底婚姻制度的存在是好还是不好？同时也思考在这样一个腐败的制度里面，其实是谁在受压迫？可是，我比较觉得有趣的是，好像只有异性恋者才有权先反省异性恋婚姻制度的压迫，别人要是想在婚姻福利上分一杯羹，就没有权利反省婚姻制度了。于是在同性恋者要求有基本的结婚权的同时，就有人质疑同性恋者怎么也在要求一对一。

这个问题不是不值得探讨，在现存状况之下，大家都在同一个社会里面生活，婚姻、家庭都勾连到社会制度、社会资源的分配，在对于核心家庭给予这么大甜头的状况之下，很多走得很辛苦的人怎么会不向往？不过我觉得运动的目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很多事情有清楚的讨论。我不认为建立另外一个合法的同性恋婚姻就是婚姻制度的终点。对运动者来说，它只是做为讨论的一个手段。

陈：张医生，请。

张尚文：我想问一个问题，但不是以一个医生的立场来问。刚刚丁乃非提到用一个阴阳眼去破解整个家庭的结构，我想就我所了解的，异性恋对同性恋的压迫主要是出于害怕，因为同性恋拒绝担负养育子女、生育家庭结构这些责任，所以整个中产阶级、异性恋的霸权很恐惧同性恋会颠覆了异性恋的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像最近台湾对离婚率的焦虑啊，或甚至真爱运动的产生，或者是对外遇的这种恐惧啊，都是这种心理。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几年前昆德拉《生命中无法承受的轻》小说里面，对性欢愉有一种无限的、但不是放纵的承认，一种无限的接受；甚至前一阵子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对性爱不带价值判断的接受。在台湾这样的政治现况中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吗？你要去颠覆所谓的霸权体制的时候，能够接受把性当做是无，接受何春蕤所谓的豪爽女人吗？所谓的「性的欢愉」是可以无尽的去享用，然后我们可以无视于家庭的建制、家庭的价值观吗？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同性恋政治与其他运动结盟的时候，可能要问：家庭的体制在哪里？那阴阳眼要照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的家庭建制是怎么样？事实上我们看到离婚率的焦虑后面，很多人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不快乐的，但是我们看到离婚率上升的时候，大家还是很焦虑，离婚率下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社会还是安定的。到底婚姻制度这个东西、男女关系这个东西、性爱这个东西，你能够怎么样去看待它？我们一方面一再地想要去重述同志恋政治，想要去拓展这些势力，另一方面我们很多人带着恐惧：万一我的男朋友背叛我，万一我的谁谁谁外遇了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到底要建造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婚姻制度？

陈：中央英文系许经田老师，请。

许经田：首先我要声明我对各位谈的这些很深入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很有了解，我只是讲一点我的感想。从听到张小虹教授刚才和某些人的辩论以后，我才理解到在妇女运动里好像也可以对某一种事情，例如「性」，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我发现同性恋运动者的期望好像也可能有两种，有人希望有所谓「人」的生活，我就把它简化

叫做真爱吧！另外有人希望有「鬼」的生活，我就把它解释成自由流动的那种生活，好像也不见得那种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本质。

可是整个早上到现在，我感觉我们到场的人好像有一种倾向，历史的理由使我们比较倾向反抗，「造反有理」的那种理直气壮，比较倾向于像张小虹教授所谓妇女运动里面的那种 Imperialism（帝国主义心态）。我讲这句话很可怕，我当然知道是因为历史的理由，让不管是妇女或是同性恋者受到极端的压迫；可是当大家围在一起自己谈话的时候，又显示出一种排他心态。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讲「性骚扰」的时候，大家几乎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男对女的骚扰，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别种性骚扰，包括也可以是女对男吧！或者还是女对女？要是有人提出其他可能，那么马上就引来反应，好像会造成很严酷的伤害。我觉得这种理所当然的不作区分，就是一种帝国主义心态。同样的，刚才在讲的过程中，大家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同性恋要追求的就是要从「鬼」变「人」，我的建议是，何不把它仔细分出来？假如你自己是相信真爱的，你不管同性恋运动，这个时候，你就忘记你的同性恋身分，去参加真爱运动。你假如赞成的是当「鬼」的，你也暂时忘记你的同性恋，你就参加我们何教授的那种豪爽女人的运动。这是我的建议。

陈：王莘，请。

王莘：我不是要讲什么大论述，我只想讲一个好笑的比喻。刚刚谢佩娟提到同性恋和狗不能进入新公园，她用的这个比喻刚好勾动了我的生命中的一个记忆，一个妇运里面的姐妹，在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曾经提了这么一句话，她说：「是狗，就不要学说人话。」这句

话提醒了我，狗有狗的自尊，狗才不屑当人，于是让我蛮快乐地当一个母狗，活了好多年。既然讲了同性恋和狗不能进入，我觉得这个比喻也蛮恰当的。今天如果女性主义者或是妇运者是狗，同性恋是鬼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像丁乃非前面讲的鬼魅魍魉之类的。我从来不觉得做狗不好，今天做为一个母狗也很好，现在我觉得做为一个女鬼也蛮好的。这就是我的欲望流动。

孙瑞穗：其实我刚才就一直很想发言，可是因为受了蛮多刺激，所以想讲的东西有点一团在脑子里面，现在还是一团，不过就让我慢慢地把它理出点头绪吧！

前面小毛提到所谓「开明」的地方政府的两手政策，我们也看到它在策略上的反应非常细致。当一个弱势团体在运动上遇到的问题被开明政府踢出来以后，早先毓秀也谈到，或许不应该那么快的把地方政府当成一个所谓的敌对对象，而可能那个关键的策略是在于我们要去正当化同性恋者的所谓「市民权利」。或者另外有些人，比如像王浩威，他会提出来讲，或许我们有可能想像去跟所谓的国家机器做爱，他指的是有可能在体制内做一个所谓的「改革」。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是面对这个运动开展以后的一个策略思考。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或许真正站在一个运动主体的角度来讲，要跟地方政府或国家机器做爱，并不是这么的容易，至少那个付出的代价，做为运动主体应该非常清楚。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代价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做「人」，或者你是不是喜欢做「鬼」，但是你被逼迫一定要说一种所谓的「人话」。譬如说，你面对地方政府时候就要开口说，「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权利。」

我觉得运动要拓展它的公共空间或是拓展它的资源，而去面对这个地方政府的时候，他好像被逼迫一定要透过一种在资源分配中被正当化的主体语言来说话，也就是说「人话」。这个时候失去的就是这个运动内部的差异性，因为运动里头可能有人当「鬼」当的很快乐，或者有人就只想当「鬼」而已。我觉得我自己的立场是，一个弱势运动想要拓展它的资源，在目前的阶段似乎无可避免的要面对这样子的政治，或许小毛刚刚的提醒可以让我们用一个复杂的眼光，去看一个弱势团体要面对国家机器，或者当他要扩展自己的资源的时候，他所面临到的一个双重的政治性：一方面他要被逼迫说主流媒体或者是主流的社会要他说的话，然而另外一方面他必须刻意地去压抑内部不同的声音。我觉得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复杂的眼光，去看待这样子的运动，或许我们的政治会更有趣。

徐淑婷：我是高医精神科的医师徐淑婷，是第三个精神科医师在这边讲话，但是我想我并不是以一个精神科医师的身份来讲话。我们有很多同志朋友，他们在军中有一些遭遇，的确有一些人在这当中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包括轮暴。我想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性恋到底能不能当兵？两年前国防部规定同性恋一定要当兵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同志，他很快乐地去了当了兵，也当完了兵。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说同性恋在军队里面遭受到压迫，而是进入军队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的同志朋友之所以无法拒绝当兵的义务，是因为我们社会有一个「不当兵就不是男人」的错误观念。在军队里面，我们会发现一

些同志有一些求援的讯号到我们心理卫生特别门诊来，当中有些人比较难适应军队生活，有一些同志是被一般人认为没那么阳刚。但是我想同志、男同性恋到军队里头当兵，他看男生，跟一般异性恋的男生看男生的那种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当中他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情。比方说一起洗澡，因为那个本来的对待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在这当中会有很多差异。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有相当多的陈述是这些不适应的状况。我想关键是在这样一个不适应的情形中，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才好。刚刚也谈到很多国家机器的问题，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属于个人处理个人问题的层面，所以我大概也没有办法说出什么比较好的方式，但是我想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地方，例如有军队里面的军医或是一个求助的管道，应该有帮助。

过去有很多人提出对军方的控诉，我想要重新再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同志也好，或是妇女运动也好，这都是人跟人重新对待的问题，我想，同志在改写这个部分，妇女运动也在改写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面临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谈这样的「关系多元化」，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取得合法的地位。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要跟国家做爱这问题，我想是很复杂的。

卡维波：我们既然谈婚姻家庭，而这个国家法律认可的婚姻和家庭是异性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那其实我想提醒一下同志运动在结盟方面可以连结和抗争的对象。首先，其实左派一直都有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个攻击和颠覆，从 19 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才有早上何春蕤讲的赖希的传统，这是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婚姻家庭，它在形式上有三个坚持，一个是一对一，也就是反对多重性伴

侣；另一个是男对女，所以他反对同性恋；还有一个是排他的性关系，所以对内是反对家人恋（我们俗称的乱伦，也就是乱掉这个父权异性恋的伦理），对外是反对通奸。我们应该从这几条路来思考盟友和抗争对象，关键是你怎么样去对抗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比方我们刚刚谈到结婚权的问题，有一种焦虑是说结婚权的议题会变成个人的政治，也就是变成一个同化的倾向，结果同性恋会被纳入体制，在不改变整个婚姻家庭的大结构上，松动一点点它的异性恋结构，让同性恋进入这个一夫一妻的、排他的性关系的婚姻，因此有人对结婚权的争取有所保留。我觉得这个看来有问题的策略可以被另外一个策略补偿，我们可以在提倡结婚权、婚姻权的同时，也提倡通奸权，也就是两权并举。我想这个同志结婚策略就比较能针对现有的婚姻家庭制度。

汪英达：台大人类系汪英达，我没什么大不了的意見，只是简单回应王浩威以及前面几位不知名的先生。刚刚王浩威先生质疑同志婚姻。怀疑另类婚姻是不是真的能算是另类婚姻，还是另一种一对一；他并且提出前面讲的另类婚姻可只能只是一种一般性的婚姻的再复制，里面是存在很多不平等。另外，孙瑞穗也为我们再度指出了同志运动中同志的多样性、异质性，以及把它单一化的危险。我要讲的是，以上两点都极其重要，而且都是极其有意义，在运动者来说，必须要考虑，必须要深切反省。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球不在异性恋这边，而是在同志这一边。需要达到的是，同志他应该做一个主体，每一个个别的同志都应该有选择做为「人」，或者是选择做为「鬼」、或者是选择有时做人做鬼、或是同时为人为鬼的权利。

洪凌：刚开始我想听到的都是很可爱的鬼话，既然我是最后一个，我就再讲一些鬼话。刚才王浩威请到可以和国家机器——或者在结构、或者在体制之内——做爱。我倒觉得这个做爱的讲法其实是太温和而愉悦。真正有可能的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可能就是去名正言顺的当一个上位的主体，偶尔间歇地去 fuck 这个国家机器，或许你会大到可以跟体制同化，我想王浩威所讲的愉悦可能是在这里。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必须指出，比如说身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作者或论述者，我常常被人家以为是一个长了獠牙的非人或是怪物什么的，然后以为我是一个有饱满的攻击能量的主体，可是实际上却是相反。可是，当这个制度要呈现我的时候，它的确是用一个危险的所谓的我啦！但是实际上这个吸血鬼是一个被剥夺的猎物，也不太可能吸到什么东西，反而是一个不断地在媒体以及影像上被吸食的对象。所以到底是谁跟谁做爱，其实也许不太重要，倒是要说谁是在被强迫做爱。有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光是同志现象在最早期被当做奇观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看似狰狞有趣鬼模鬼样，可是实际上充满了被强奸的一种体制性的愉悦吧！

第二点可能是一个更个人的感觉。刚才常常会提到所谓同志跟女人，女人跟同志，但是我却想问，其实同志当中必然有女人和男人，为什么我们要讲成同志跟女人，难道女人不也是同志吗？

陈：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请各位引言者提出一些回应。

丁：洪凌其实好像说了我本来想要说的。跟国家机器做爱的妄想，我觉得在不同的位置会有非常非常不同的下场，她讲的很清楚，有的人会被榨干，她被榨干之后可能真的被关进疯人院里面，可是其

他另一些人可能活的好好的，而那个妄想永远也不会被识穿。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妄想有非常不同后果，跟你的位置等等一切都非常有关系，当然跟性欲也会很有关系。另外，当然同性恋也是女人，可是我那个故事只是为了说那个故事方便，所以就把女人挑出来说，那个女教师，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可以强调她是一个女教师的位置，甚至于我简称她为教师而不是女人，可是我其实也想说她有那个女人的部分。附带一点，这个女教师原本有和国家机器做爱的妄想，她长了阴阳眼之后，这个妄想就消失了，也许这个是救了她的原因吧！还有，同性恋当然是有男有女，可是也许这「男」「女」的意义再也没有办法维持女教师那个「女」的意义吧！所以同样的，也许至少有「鬼」的状态，会让「人」再也无法类似原来的人。

黄：我想非常短地回应一下。对，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要「同化」或是要「异化」、当「人」或是当「鬼」，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所要提出来的一种政治策略就是说，在同化的那个过程中，你觉得你想要过安稳的日子，你不要放弃你既有的权利的时候，那好，你可以很安稳地过日子，你觉得同性恋不须要政治化。但是，譬如说当同性恋在争取平权，或是说婚姻权的同时，这个动作可能是和异性恋体制共谋，而这个共谋正压迫了一些不合于这个体制、或是一直被这个体制排除及压抑的主体，譬如说性对象多过一个的主体。所以我提出「异化」政治的意思是说，不是否定「同化」政治的那个时效性和必要性，而是不要让同化政治形成另一种霸权。

倪：我好像没有太多话想说，因为今天好像讨论了太多东西，而且好像抽象的国家机器和进步官僚是很被讨论的重点。可是我觉得刚

刚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事实上大家都看得见，现在的、现存的这个婚姻制度或是家庭制度，已经引发了一些人有一些焦虑，因为它在改变当中。那它为什么会被改变，或说它为什么还能产生一些焦虑？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今天大家在谈论要改变它。所以我觉得好像讨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谢佩娟：我刚刚对于王浩威的问题一直在想怎么样回答比较好，我想我趁最后这个机会说一下我的感觉。刚刚王浩威想问我们希望或者是同性恋者希望新好政府做什么？或者我们在跟新好政府对立的过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整个所谓的新公园运动过程里面也被新政府回应过一句话，那个感觉非常地接近：「那你们同性恋到底要什么嘛？你们的空间到底跟异性恋有什么不一样嘛？」对我来请。我觉得能够讲这句话的人是在权力位置的人，他才有资格、他才有能力说：「你要什么，你说啊！我给你啊！」可是我觉得在那个父权的意识型态上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点是我对这两个相似的感觉所做的回应。

陈光兴：好，谢谢大家参与这场研讨会，谢谢大家。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台灣學術界，迴應著由於台灣婦女解放運動而風起雲湧的女性情慾解放運動和同性情慾解放運動，形成一個以性(情慾)為焦點，並且針對性別、階級、種族、年齡…等社會差別的跨學科研究領域，也就是「性／別」(sexualities) 研究。

性／別研究的首次正式學術研討會就是1996年7月召開的第一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暱稱為「四性研討會」)，本論文集即是研討會論文的原撰稿者經過一整年的沈澱改寫修訂後的結晶，並且包括了研討會中兩場座談的全部實錄。

作為首度集結發誓的性／別研究專書，本書論文篇篇都是開疆闢土之作；兩場精彩的座談會更是直指此刻同性戀政治以及性教育政治的核心焦點。這將是一本在台灣性／別研究發展中至為重要的論文集。

ISBN 957-8399-47-2



9 789578 399471

00250



元尊文化

S5037

NT\$250